

顾问委员会

总顾问 曾培炎

顾 问 董建华 蒋正华 唐家璇 徐匡迪

资深专家委员会

中国专家（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春正	王伟光	王洛林	厉以宁	宁吉喆	冯国经	卢中原
许宪春	刘遵义	刘世锦	刘克崮	刘 伟	朱 民	李毅中
李德水	李若谷	吴敬琏	张国宝	张晓强	张研农	张大卫
张 祥	张卓元	陈 元	林毅夫	林兆木	周文重	高尚全
海 闻	钱颖一	郭树清	辜胜阻	聂振邦	楼继伟	樊 纲
魏建国	戴相龙					

国际专家

亨利·基辛格 / Henry Kissinger
傅强恩 / John Frisbie
欧伦斯 / Stephen A. Orlins
约翰·桑顿 / John Thornton
郑永年

康睿哲 / Richard Constant
约翰·奈斯比特 / John Naisbitt
杰弗里·萨克斯 / Jeffrey Sachs
马克·乌赞 / Marc Uzan

编委会

主 任 魏礼群

副主任 郑新立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一鸣	王晓红	牛铁航	吕 政	谷源洋	朱晓明	李晓西
李向阳	陈永杰	张宇燕	张燕生	张蕴岭	杨圣明	冼国明
施子海	隆国强	常修泽	徐洪才	裴长洪	霍建国	

主 编：郑新立

副主编：王晓红 牛铁航

• 本刊专论 •

- 新形势下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思考 蔡 武(005)
- 增强宏观调控能力 加快经济转型升级 郑新立(013)

• 宏观经济 •

- 关于未来中国财政形势的分析与预测
- 高培勇 杨志勇 汪德华 蒋 震(021)
- 加强我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能力建设 王冠群(033)
- 论打造“质量安全型”经济升级版 徐明焕(042)
- 沙漠化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
- 各国要协力防治沙漠蔓延 李长久(052)

• 国际经济 •

- 世界经济进入全球价值链时代 中国对外开放面临新选择 王子先(061)
- 双边投资协定:加强中美经济关系之道
- 丹尼尔·普莱斯 迈克尔·斯马特(072)
- 自由贸易园区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沈家文 刘中伟(079)
- 由“生产型”趋向“消费型”
-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2013 年回顾与 2014 年展望 王碧珺(090)

• 调研报告 •

关于美丽乡村建设的调研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课题组(098)

• 案例研究 •

徐工:向世界级企业迈进 张志平(108)

• 权威观点 •

国际权威机构观点综述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117)

• 国际统计数据 •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122)

• 新书推介 •

《农村中小企业转型发展论》评介 苑 鹏(130)

• 英文摘要(ABSTRACTS) •

(132)

“铁的新四军”红色记忆·经典美术作品展征稿通知 (136)

欢迎订阅《红旗文摘》 (封二)

CONTENTS

Thinking on How to Inherit and Carry Forward Our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ulture under New Situation	<i>Cai Wu</i> (005)
Enhance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Ability, Accelerate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Upgrading	<i>Zheng Xinli</i> (013)
An Analysis and Forecast on China's Fiscal Situation in the Future	<i>Gao Peiyong, Yang Zhiyong, Wang Dehua, and Jiang Zhen</i> (021)
Actively Strengthen China's Global Financial Governance Capability	<i>Wang Guanqun</i> (033)
Construct a Quality Safety Economic Upgraded Version	<i>Xu Minghuan</i> (042)
Desertification Threatens Human's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Countries Should Work Together to Prevent and Cure Deserts Spread	<i>Li Changjiu</i> (052)
World Economy Enters GVC Era, China's Opening-up Faces New Choices	<i>Wang Zixian</i> (061)
BIT by BIT: A Path to Strengthen US-China Economic Relations	<i>Daniel Price and Michael Smart</i> (072)
Comparison on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of Free Trade Zones and Some Enlightenment	<i>Shen Jiawen and Liu Zhongwei</i> (079)
Gradually Turning from Productive to Consumptive: Review of 2013 Chin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2014 Outlook	<i>Wang Bijun</i> (090)
An Investigation Report on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Villages	<i>Research Group of Chin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xchanges</i> (098)
XCMG Is Going Towards a World-class Enterprise	<i>Zhang Zhiping</i> (108)
Opinions of International Authoritative Institutes	(117)
Main Indicators of World Economy	(122)
A Review of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SMEs	<i>Yuan Peng</i> (130)

新形势下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思考

蔡 武

摘要：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我国正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它是中华民族的血脉，是中国人民共同的精神家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深深扎根的沃土，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支撑，对于人类社会文明进步也具有独特的价值。我们必须倍加珍惜，理直气壮地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努力实现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实现“中国梦”的强大正能量，积极推动不同文明对话，使中华文化不断发扬光大。

关键词：优秀 传统文化 保护 弘扬

作者简介：蔡 武，文化部党组书记、部长。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国政治、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我国进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经济发展不断跨上新台阶，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发展。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如何认识中华文化的价值，保持中华文化的特色，保护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提供有力支撑，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传统文化

的保护和弘扬，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战略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表明了我们党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倡导者和发展者的鲜明立场，同时也彰显了一个拥有五千年灿烂文明并正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大国领导人的豪迈气概。我们必须认真学习领会总书记讲话精神，全面认识中华文化的时代精神和当代价值，深刻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类社会和平发展的战略地位和深远意义，扎实推动中华文化的保护和弘扬。

一、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血脉，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是我国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我们必须倍加珍惜

中华文化绵延数千年从未间断，凝聚着中华民族在长期繁衍和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理性认识和现实感受，是祖先智慧的结晶、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它凝结着过去，联系着未来，决定了我们是谁，告诉我们从哪里来，又昭示我们到哪里去。正如总书记所说，“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可谓在思想上有大智，在科学上有大真，在伦理上有大善，在艺术上有大美。我们祖先所流传下来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浩如烟海，灿若星河。据普查，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有近 77 万处，非物质文化遗产总量近 87 万项。目前，我国拥有世界遗产 45 项，位居世界第二，38 项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关名录，位列世界第一。这些都足以令炎黄子孙感到骄傲和自豪。

在中华民族艰难而辉煌的发展历程中，中华文化薪火相传、历久弥新，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灿烂的新阶段。许多极有意义和超越时空的优秀传统文化，体现在我们的举手投足间，渗透在我们的思维方式里，融化在我们的灵魂最深处，始终为国人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汶川地震后中国人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大爱无疆精神，央视评选的最美乡村教师、最美乡村医生等最美系列人物身上体现的敬业、奉献、诚信的品格，都传播着优秀传统道德的力量。春节、端午等民族节日连接着所有中国人的情感，凝聚着中华民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因此，我们说，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身份和独特个性的象征，是中华民族割舍不断的精神命脉，是中国人民赖以栖息的精神家园。

近代以来，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中华传统文化受到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五四时期，学术界、思想界对我国传统文化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判。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传统文化遭到灭顶之灾，产生断裂，其影响至今依然可以深深感受到。上世纪 80 年代，经济全球化迈入加快发展的新阶段，我国也开始全面实施改革开放政策。随着经济发展和国际贸易的迅猛增长，文化交流与合作的不断扩大，各种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文

化的影响开始深入到社会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文化结构和文化模式再一次带来猛烈冲击。我国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也给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带来了不少问题和挑战。大量古建筑和街区在城市建设过程中被毁，许多具有文化价值的传统村落消失。据调查，2000年-2010年，仅10年时间我国自然村总数就从363万个锐减为271万个，平均每天至少消失100个村落，传统村落从2005年的5000个，锐减为如今的不足3000个。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消失。例如，1999年出版的《中国戏曲志》收集了各地、各民族剧种374种（木偶、皮影不包含在内），到2013年，全国现存剧种286种，15年间消亡了88种。可以说，我们传统文化的生存和发展还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面对这种现状，我们必须在全社会树立一种对历史文化遗产“敬畏”的理念。敬它，是因为历史文化遗产是祖先智慧的结晶，是民族的文化基因和血脉；畏它，是因为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只有百般呵护，才能光彩永存。要以对民族、对历史、对后人高度负责的精神，把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更好地用优秀传统文化滋养民族生命力、激发民族创造力、铸造民族凝聚力，建设好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留住我们的根。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深深扎根的沃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支撑，我们必须努力把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实现“中国梦”的强大正能量

近现代以来，许多西方人都有一种普世主义情结，认为能够给世界带来进步与统一的，非西方文明莫属。全球化进程的提速，高科技、市场经济和资本的跨国流动，增强了世界的同一性、整体性及各国人民之间的联系。文化越来越多地与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交织在一起，对世界发展产生着深刻影响。西方国家凭借其经济和科技优势，在输出产品的同时，也企图输出其制度和价值观念。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判断。

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不同国家的发展道路绝不只有一种模式。在道路和制度问题上，生搬硬套、削足适履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十分有害的。总书记指出，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其自己的特色。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模式，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这充分表明了我们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的 100 年间，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前仆后继，积极探索救国强国之路。经过了君主立宪制、多党制、总统制多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才找到了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既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又浸润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开放变革”这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彰显了中华民族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品格。我们针对国情，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是实事求是传统的体现；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和谐世界主张是“和合思想”的延伸；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则能够在“天人合一”思想中得到呼应。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大地上破土而出、茁壮成长，关键就在于我们党充分挖掘和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紧密结合中国实际，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我们站在 960 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成功发展道路，而且形成了一套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成功制度体系”，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和显著的优势。这足以说明，中华文化是我们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标识，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我们必须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切实把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增强制度优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正能量。

三、中华文化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是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重要基石，我们必须理 直气壮地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价值观是人的信念系统、精神支柱和行动向导，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选择。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其核心价值观，它蕴含着人们对世界、人生和社会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价值共识，是人们思想上精神上的灵魂旗帜，是一定社会形态社会性质的集中体现，决定着社会制度、社会运行的基本原则，制约着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世界上各种文化之争，本质上是价值观念之争。

基于国情不同，各国的核心价值观也不同。我国的核心价值观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06 年 10 月，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任务，提出了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在全社会树立起团结奋进的精神旗帜，有力地统一了思想，凝聚了社会共识。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

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进行了阐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既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又吸收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体现了国家、社会和个人价值追求的统一，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统一。它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想之舵，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之钙，是当代中国的兴国之魂，是我国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就源自我国深厚的传统文化。例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担当意识；“言必信，行必果”、“与人为善”、“百善孝为先”的为人处世之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个人追求，等等。蕴含着先人们对自然界、人类社会现象本质的思考，凝聚着中华民族普遍认同和广泛接受的道德规范、思想品格和价值取向，为中华民族提供了安身立命的原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恰恰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优秀内核，无论是国家层面的目标，还是社会层面的追求和个人层面的规范，都能从传统文化中得到阐释。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欧美等西方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政治、科技实力，抢占国际上的思想阵地和话语权。在这种背景下，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进的思想道德基础，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就显得更加紧迫。总书记指出，构建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国家长治久安。要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必须把解决好价值体系问题作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努力抢占价值体系的制高点。总书记还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理直气壮地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总书记的讲话，深刻阐述了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和凝聚作用，充分体现了我们党把握大势、着眼大局的战略眼光。

经过长期努力，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社会思想道德主流积极健康向上，人民群众展示出良好的精神风貌，涌现出许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范例。但是，仍然存在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一些社会成员人生观、价值观扭曲。我们必须深入贯彻总书记讲话精神，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原则，扬弃地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教育、宣传和弘扬，充分利用传统文化的优势，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信念，外化为人们的行动。

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突出优势，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我们必须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影响力和竞争力

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不仅体现在经济、军事力量等硬实力，而且体现在文化、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制度等软实力。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加快发展的今天，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影响更加凸显。这种软实力的竞争某种程度上比硬实力的渗透力更强，影响力更持久。可以说，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拥有了强大的文化软实力，谁就能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都把提高文化软实力，作为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战略。我国高度重视文化软实力建设，党的十七大做出了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战略部署，十七届六中全会和十八大都对文化软实力建设做出了全面部署。总书记多次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不仅关系我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而且关系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进一步从国际国内视角阐述了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战略意义。

总书记深刻分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文化软实力的关系，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突出优势，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团结奋进的重要精神支撑，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总书记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因为中华文化在历史实践中形成的哲学思维、价值取向、伦理观念，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具有深刻的内涵和独特的价值。对内而言，它是连接民族情感的纽带，是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创造力的基石；对外而言，也是与各国人民开展文化交流的桥梁和资源，是提升我国文化影响力和感召力的有效途径。

近年来，我国文物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力度不断加大，文化遗产宣传展示活动丰富多彩，社会各界公众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不断增强。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发展模式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认可，对外文化交流广泛深入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受外国人民喜爱。比如，儒家、道家思想为国际社会所认可和推崇，中国龙、中国红、长城、故宫成为中国的象征，学汉语、喝中国茶、练中国功夫在国外已经成为热门，可以说，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得到显著提升。但是，我国文化整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与我国经济、政治地位很不相称，与我国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资源大国身份也不相称，文化资源优势还没有转化为文化竞争优势，“西强我弱”的格局还没有完全扭转。国外民众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认知大多还停

留在功夫、美食、服饰等具象和器物层面，对中华文化思想观念和价值观等还不是特别了解，话语体系构建滞后于中国道路实践，文化产品的竞争力、吸引力、传播力还比较弱。应该说，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任务还很艰巨。

总书记指出，必须努力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注重塑造我国国家形象，提高国际话语权。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些都为我们开展具体工作提供了遵循。

贯彻落实总书记讲话精神，我们就要妥善处理好继承与创新、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关系，坚持内外兼修，找准重点，积小胜为大胜，不断扩大中华文化发扬光大和走出去的广度和深度，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一是要加大文化遗产保护力度，着力构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妥善处理好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关系，降下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虚火”。特别要注重城镇化过程中文化遗产的保护。加强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宣传，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梳理、精心萃取，深入挖掘和提炼有益的思想价值，促进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与世界文化发展趋势相符合。要处理好政府引导与群众广泛参与的关系，既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又要充分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让 13 亿人都成为传播中华美德、弘扬中华文化的主体。二是要不断提升中华文化的整体实力。充分挖掘传统文化资源，推出更好更多的文化产品，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提升国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三是加强对中华文化的传播。坚持“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对外文化交流和对外文化贸易并举，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两种资源，全面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把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开展对外文化贸易和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资源。推出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能与外国民众形成共鸣的文化产品，努力塑造文明大国、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社会主义大国的国家形象。

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内核，对于人类社会文明进步具有独特的价值，我们必须坚持开放包容，推动不同文明对话，使中华文化发扬光大

在全球化不断深入和全面对外开放的条件下，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任何一种文明或文化都不可能单独发展和独立存在。总书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总部发表的演讲中指出，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不论是中华文明，还是世界上存在的其他文明，都是人类文明创造的成果。各种人类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都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可以丰富人类文明的色彩，让各国人民享受更富内涵的精神生活、开创更有选择的未来。总书记的话生动形象，感人至深，充分表明了我国对不同文明互相尊重、和谐共处的鲜明态度，也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开放包容、求同存异、注重和谐和合的优秀内核。

几千年来，中华文化之所以绵延不绝、历久弥新，就是因为以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品格吸收借鉴世界优秀文明成果。早在两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认识到“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儒家主张“和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为贵”、“和而不同”等，推崇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往、吸收、融合，反对冲突和战争；强调“与人为善”、“见贤思齐”、“三省吾身”、“君子慎独”，推崇“仁爱”、“诚信”、“以德服人”等等，注重通过“修齐治平”的道德实践，实现个人品德提升以及内心和顺，讲求仁政、以德治国。道家倡导“道法自然、天人合一”，认为人和天地、自然组成了一个统一体，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人与自然的协调、人的道德理性与自然理性的一致。这些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塑造了中国人普遍持久的和平文化心理，而且成为我们与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和谐共生共长的经典诠释和处世准则，对于今天人类追求和平与发展以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和谐，仍具有重要启迪作用，是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所奉献的重要价值理念，有力地推进了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

面对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的国际局势，我们必须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必须认识到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独特优势，同时也要认识到中华文化的不足，找准中华文化的位置，坚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要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切实承担起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职责，大力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继续发扬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优势，尊重各国的文化差异，提倡不同文化的平等对话，推动不同文明间相互尊重、和谐共处，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要注意从国情出发，把民族文化独特性和世界文化多样性结合起来，既要以中华文化为主体，坚持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和自主性，传播中华文化的价值理念，保持和突出中华文化鲜明的民族特色、民族特性，又要兼容并蓄、博采众长，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使中华文化充满生机，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力量源泉。

责任编辑：李 蕊

增强宏观调控能力 加快经济转型升级

郑新立

摘要：我国目前面临经济转型升级的任务，需要选准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突破口，集中力量才能事半功倍。在这样一个特殊阶段，尤其需要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关键词：宏观调控 经济转型升级 政府作用

作者简介：郑新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

在经历了 36 年的快速增长之后，我国经济进入了转型升级阶段。完成这个阶段的历史任务，我们就能赢得新一轮的经济持续增长，从而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顺利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否则，各方面矛盾凸显，将延缓现代化进程。这是当前对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集中考验。在这个艰难的爬坡阶段，政府千万不能弱化自己的功能，而是要在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地发挥应有作用。要通过不断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增强宏观调控能力，尽快实现国民经济转型升级。

一、实现稳增长目标关键在于加快经济转型升级

改革以来经济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靠高投资、高消耗、高污染来实现的，

直接导致了目前产能过剩、污染严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局面。

我国投资率从“六五”时期的年均 33.9%一路攀升到“十一五”时期的 47.1%，提高了 13.2 个百分点。同期最终消费率则从 66.4%不断下降到 48.7%，降低了 17.7 个百分点；其中，居民消费率从 51.8%降为 35.4%，降低了 16.4 个百分点。投资与消费的比例是国民经济最基本的比例关系，这个比例出了问题，决定和影响经济全局，靠其他措施无法补救。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时曾经指出，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张和广大居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这个矛盾的演变，必然导致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这个危机必将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然而，由于西方发达国家政府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特别是北欧社会民主党执政，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弊端的批判中得到启示，通过发展福利社会和加强对经济的预测调控，扩大了居民消费需求，并按照对市场需求的预测，调控投资规模，使周期性生产过剩的矛盾逐步缓解。现在则走到了反面，过高的社会福利支出超过了财政承受能力，国民经济呈现出供给不足、需求过大的态势，欧债危机就是其集中表现。反观我国，提高最终消费率特别是居民消费率，降低投资率，从而化解产能过剩的难题，成为当前宏观调控所面临的突出任务。

物质消耗高增长与经济高增长相伴随，是过去 30 多年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特点。1978 年-2012 年的 34 年间，我国年能源消费总量由 5.7 亿吨标准煤增加到 36.2 亿吨，增长 5.3 倍，年均增长 8.0%，能源消费弹性系数高达 0.82；钢材产量由 2208 万吨增加到 95318 万吨，增长 42.2 倍，年均增长 17.0%，钢材消费弹性系数高达 1.74；原铝产量由 29.6 万吨增加到 1986 万吨，增长 66.1 倍，年均增长 19.2%，原铝消费弹性系数高达 1.96；水泥产量由 6524 万吨增加到 22.1 亿吨，增长 32.9 倍，年均增长 15.8%，水泥消费弹性系数高达 1.6。

随着能源、原材料消费的大幅度增长，污染物的排放量也大幅度增长。2012 年，我国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达 1911.7 万吨，工业烟（粉）尘排放量达 1029.3 万吨，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32.9 亿吨，工业废水排放量 221.6 亿吨。废水中化学需氧量（COD）排放量 2423.7 万吨，氨氮排放量 253.6 万吨。由于治理的速度赶不上排放的增长速度，导致大气污染、水污染情况越来越严重。去年冬季以来，华北、华东地区连续出现大面积严重雾霾天气，说明大气污染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程度。河流、湖泊、海洋被污染的情况也十分严重。大气污染和水污染已经威胁到人们的健康。

针对传统发展模式所带来的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战略，党的十八大报告又提出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经济发展的主线。只有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才能解决当前经济运行中面临的诸多难题，释放经济发展

新的潜力，克服经济下行压力，引导经济走向科学发展道路。当前转变发展方式的紧迫任务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要扩大居民消费。如果经过 3-5 年的大幅度调整，将居民消费率提高到接近“六五”时期的水平，提高 15 个百分点以上，每年将有 9 万亿元以上的商品由目前用于投资和出口转变为用于居民消费，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可提高 40% 以上。我们说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如果能够实现这一调控目标，就将对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最好的贯彻落实。要继续把改善居民住、行条件作为扩大消费的重点。这两个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级的商品，是其他任何商品无法替代的。要扩大公共服务，改变公共服务长期供给不足的状态。加快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采取优惠政策，鼓励扩大就业，增加居民收入。通过扩大居民消费，化解过剩产能，逐步使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越来越强大的动力。

二是加快发展第三产业。2013 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虽然已达 46%，超过了第二产业，但是应当看到，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仅为 36%。全世界的平均水平为 60%，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也在 50%。如果经过 5-10 年的努力，将我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提高到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提高 14 个百分点，就能新增 1.1 亿个就业岗位。这不仅能满足居民多层次的服务需求，降低企业的流通成本，而且能带动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从而带动消费水平提高。一年多来，“营改增”的试点已经取得明显成效，应加快在全国第三产业的各个领域全面推开，为第三产业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政策环境。只要改革到位，第三产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必将在未来十年内出现一个持续的井喷式增长，成为稳增长的重要支撑。

三是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继续鼓励企业、科研单位、大学增加科技研发投入，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成果带动产业升级，逐步提升我国产品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推动我国工业产品由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转变。目前，我国科技研发投入已占 GDP 的 2%，其中，企业研发投入已占全社会研发投入的 70% 以上，民营企业创造的技术专利已占全部专利申请量的 67%，在国内申请的发明专利数量已连续三年居全球第一位，国际专利申请量再有两三年也有可能赶上或超过美国，形势非常令人鼓舞。目前，国有企业和大学的科技研发潜力尚未充分发挥出来。要通过改革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和大学科研体制，建立技术创新激励机制，使国有企业和大学成为创造技术专利的重要基地。深圳市由于形成了鼓励创新的市场机制和社会环境，培育了一批创新型企业，每年创造的国际专利占全国的 47%。各个城市应当向深圳学习，特别是那些科技资源远远优于深圳的城市，更应抓紧建立创新激励机制，把 13 亿人中的创新潜能

激发出来，形成发展方式转变的强大推动力。

四是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我国农村人口尚有 6.4 亿人，农业劳动力尚有 2.6 亿人。实现现代化的过程，本质上就是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不断减少的过程，也是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的过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部署，为土地向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公司流转，发展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创造了体制条件。要加快新农村建设，推进整洁农村行动。通过建立城乡一体化发展制度，释放出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巨大发展潜力，使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

二、选准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突破口

推进经济转型升级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只有选准重点，集中力量予以突破，才能在有效克服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的同时，为经济的长远发展奠定良好基础，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

按照国家城镇化规划要求，我国城镇化将分为三个不同层次同步推进。一是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中心的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三大都市群。目前，这三大都市群的经济总量分别为 1.5、1.7、1.3 万亿美元，再经过十年的发展，经济总量均有可能达到 2 万亿美元以上，超过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两大都市群，即纽约都市群和东京都市群各 2 万亿美元的经济规模。三大都市群将成为带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三大引擎，对全球经济也将产生重要影响。二是以省会城市为中心、以周边地级市为节点的次区域城市群，在带动省域经济发展中将发挥重要作用。三是以新型农村社区、小城镇、县城关镇为依托，形成就地城镇化的格局。在县域经济发达的地区，农民在原地居住或适当集中，大部分在第二、三产业从业，农业实现了现代化、集约化经营。这三种类型的城镇化，都需要用高铁、高速公路把大大小小的城镇联结起来，形成半小时生活圈和一小时商务圈。这就是目前国际上通行的“TOD”模式，即交通引导生产力布局和经济发展模式。作为当前的抓手，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抓好“三个一个亿”：东部实现农民工市民化一个亿，中西部再吸纳一亿农民工进城，加快改造城市棚户区 and 城中村，解决一亿人住房困难。通过三个层面的城市化，每年城市化率提高一个百分点以上。经过十几年的时间，到 2030 年，使城市化率达到 70% 左右，人均 GDP 达到 1.7 万美元，城乡人口结构才会基本稳定下来。在此之前的 17 年，由于城市化的强大推动作用，在经济发展阶段上，都属于快速增长期，这是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了的。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省，都是在人均 GDP 达到 1.7

万美元之后，经济增速才明显下降，我们也应当能够做到。在 2030 年之前，经济增速达到 8%左右，是完全有条件的。

（二）使环保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向污染宣战，表达了国务院治理污染的决心。关键是要建立吸引社会资金投资环保产业的市场机制，这就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建立谁污染、谁付费和第三方治理制度，培育环保市场。为此需要破除三个认识上的误区：一是把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错误地认为推进环境保护妨碍经济发展。环保产业提供的产品是清洁的空气和干净的水，它们作为共享性公共产品，同样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应当建立这些产品的市场价值补偿机制，使投资环保产业照样能够盈利，把扩大这些产品的供给作为当前发展的重要内容。二是认为环境污染是经济发展必经的历史阶段。说伦敦雾霾治理用了 50 年，言外之意是我们也不必着急。这是没有看到我们具有后发优势。目前治理污染的技术是现成的，绝大部分设备国内都能制造，唯一缺的就是机制。只要措施到位，用 3-5 年时间取得明显成效是完全可能的。三是误以为煤电成本低。我国原煤消费量 2012 年已达 36.5 亿吨，煤炭在一次能源结构中占 67.1%，这是大气污染严重的主要原因。长期以来，在煤电成本中没有把环境损害成本和健康医疗成本计算进去，如果计入，煤电成本与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成本不相上下。如果说过去我们把煤电价格定得低一些，有利于加快发展，现在推广煤炭清洁燃烧技术已十分急迫，也具备了对较高煤电价格的承受力。

（三）加快城际高铁和城市轨道交通建设

高铁是国人的骄傲。我国人口众多，国土辽阔，资源分布不平衡。发展高铁，最符合国情，被称为绿色运输方式。加快高铁建设，尽快形成高铁网络，将使国民经济跨上一个新台阶，对促进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大意义。铁路作为长期发挥作用的基础设施，其投资具有长期稳定回报特点，应通过投资体制改革，建立适合铁路特点的长期融资机制。要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发行长期建设债券，允许将沿线土地商业开发与投资偿还结合起来。拥有 200 万以上人口的城市，都应当建设地铁。我国有 200 万以上人口城市 42 个，绝大部分尚无地铁。加快高铁、地铁建设，对拉动内需、促进增长将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四）扩大城乡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养老院、幼儿园、停车场等供给严重不足，群众反映强烈，成为公共服务领域亟待

解决的问题。在政府财力不足的情况下，应推行特许经营权的方式，吸引社会资金投入，尽快满足需要。在当前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中，各级政府应当把解决好这些问题作为整改的重要内容。

（五）积极发展新能源汽车和新材料

发展电动汽车、氢能源汽车，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新型汽车工业发展道路，是保护环境的需要。在这方面，我国同国外处于同一起跑线上，而且已经拥有较好基础，应当重点扶持，完善充电桩等配套设施。以各种高性能有机合成材料代替金属材料，能够节约能源 50%以上，具有广阔前景，应大力鼓励科技开发和推广应用。

（六）对有条件在国内生产的大宗进口物资实施以产顶进

目前，我国每年进口石油化工产品 2000 亿美元以上，进口各类芯片 2000 亿美元，进口大豆 5000 多万吨。2013 年仅进口对二甲苯（PX）700 吨，占国内需求的 62%。日本、韩国生产的 PX，80%用于对华出口。由于国内多年没有新建 PX 项目，进口量不断增加，国外供货商趁机抬价，在青岛设立拍卖市场，每月提价一次，整个石化产业链的利润向 PX 环节集中。对此，我们应果断决策，选择荒岛集中建设亿吨级石化基地，一举解决 PX 短缺问题，同时加大对进口高附加值化工产品的研发和国内投资力度，夺回国内市场。针对进口芯片，应组织国内科研、生产、使用单位联合攻关，建立产业联盟，研究成果共享。要大力推广高产优质茶油树种植，增加木本油料供应。积极到国外建立棕榈、橄榄、大豆等油料生产基地，满足国内不断增加的需求。对于这些现成的内需市场，不能拱手相让，应想办法挤占。

（七）积极培育新的区域经济增长极

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在不同发展时期，应选择不同区域作为经济增长极，以支撑国民经济持续发展。淮河经济带是目前最有条件成为新的增长极的地区。这一地区土地肥沃、雨量充沛、资源富集、人口稠密，由于雨季过度集中，至今仍遭受着洪涝、干旱交替发生的困扰，是豫皖苏三省发展的洼地。过去几十年淮河治理以防汛为主，现在需要调整思路，从发展的角度进行根治。应抓紧制定淮河经济带的整体规划，做到汛期蓄水、常年用水、科学调度，实现洪水资源化。要建成千公里河川式水库，万吨轮可从滨海行至蚌埠，万吨级船队可行至息县、周口。建成绿色食品基地、新型原材料基地、先进制造业基地和黄金旅游线，使之成为我国第三条出海黄金通道和第四增长极，成为新时期扩大内需的战略支点。

三、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必须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实现经济转型升级是一项艰巨的历史任务。纵观二战后的世界历史，多数国家失败了，只有少数国家成功了。靠引进资金、技术，利用低成本劳动力和资源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把人均 GDP 提升到 5000 美元左右，容易做到。但是，要攀上人均 1.2 万美元的台阶，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如果没有经济结构的根本转换，包括产业结构升级、城乡均衡发展，是不可能实现的。日本、韩国同巴西、墨西哥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经验。2013 年，我国人均 GDP 达到 6750 美元，正处于向高收入国家攀升的艰难爬坡阶段。近一年多来，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正是结构转换难度加大的反映。在这样一个特殊阶段，尤其需要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一）能否发挥好政府作用是“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的分水岭

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就是让价值规律充分发挥作用。在各个部门之间，通过价值规律作用，按照社会需求比例在各个部门间分配社会劳动，从而实现各部门供求的大体平衡。在一个部门内部，通过价值规律作用，把资源配置到最具发展潜力的企业，实现企业间的优胜劣汰。政府充当游戏规则制定者和监督者，不要干预企业经营决策。在实施经济转型、产业升级战略中，政府要制定明确的导向政策，包括鼓励类、限制类政策。在市场准入政策上，要制定负面清单，实行非禁即入原则。在要不要发挥政府作用以及如何发挥政府作用的问题上，东亚国家实行了与西方发达国家和拉美国家不同的模式，这也成为东亚一些国家能够成功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而许多拉美国家长期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我国在 30 多年改革发展中，一方面不断扩大市场作用，一方面逐步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宏观调控，创造了经济奇迹。我国与拉美国家经济体制的重要区别，就在于对政府作用的认识。以致有国外经济学家把两种经济现象概括为“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自由经济学派对市场作用的过度推崇和对政府作用的过度批判，已经误导了不少国家政府。作为自由经济学派发源地的美国政府，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对美国银行和房利美、房地美实施救助措施，美联储连续几年实施货币宽松政策，刺激企业投资和经济复苏，向国外转嫁危机。说明美国政府根本不相信自由经济学派的那一套理论。我国目前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刻，我们不仅不能使政府去功能化，而且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对经济实施必要的刺激措施，不是一个贬义词，而是一个积极的褒义词。一个负责任的经济学者，应当支持政府推出刺激经济的措施，而不能随意指责。

（二）三大调控杠杆要围绕促进转型升级形成调控合力

计划、财税、金融三大杠杆，是宏观调控的基本手段。三者之间既相互制衡，又相互协调，形成合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面对转型升级的任务，计划部门应制定转型升级的目标、重点、要求；财税部门应运用减税、贴息、资本金补助等措施，引导信贷和社会资金投向；金融部门应运用定向宽松的货币政策，包括点贷、重点建设债券等措施，引导信贷资金投向规划和财税政策引导的方向。特别是在目前通胀压力小的情况下，金融调控政策应适时从总量调控为主转变到以结构调控为主，运用强大的金融力量支持经济转型升级。

（三）制定产业结构调整政策要从选择型转变为功能型

长期以来，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往往对需要优先发展的产业实施一系列优惠政策。这种选择型政策的好处是，有利于少数产业的非均衡发展，但是其弊端也很明显，往往造成顾此失彼，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带来新的结构失衡。应当尽可能避免推出选择型产业政策，代之以功能型政策。即对符合经济转型升级方向的经济活动，不管属于哪个行业、哪类企业，都要给予鼓励，而对不符合转型升级方向的经济活动，一律采取惩罚性政策。比如节能减排、环境保护、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等，是转型升级鼓励的方向，对于所有行业、企业和生产、消费，凡是符合这些要求的，都应给予鼓励，反之则应予以惩罚。制定功能型产业政策，比之选择型政策，对于推动转型升级，将能发挥更大成效。

（四）适时选定并实施带动能力强的国家重大工程

集中力量建设国家重大工程，带动经济、科技发展，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在美国历史上，不同时期都提出和实施了带动全球科技、军工发展的重大工程。如曼哈顿工程带动了核弹、核电发展；星球大战计划带动了航天航空产业发展；信息高速公路工程带动了全球互联网发展；正在实施的新能源计划、出口倍增计划、再工业化计划等，对未来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也将产生重要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制定和实施的两弹一星工程、南水北调工程、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青藏铁路工程以及正在实施的大飞机项目等，也都具有重大带动意义。当前面临经济转型升级任务，应当选择和实施对全局具有带动意义的重大工程，如大规模集成电路工程、生物基因工程、新能源工程、根治淮河工程等，举全国之力攻克技术难关，对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增强经济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力，必将产生重大带动作用。

责任编辑：李 蕊

关于未来中国财政形势的分析与预测

高培勇 杨志勇 汪德华 蒋 震

摘要：本文立足于中国经济步入新阶段和改革步入深水区的宏观背景，从规模和结构两个视角分析了未来一个时期的财政收支形势。分析表明，在“稳定税负”战略和经济增长阶段因素的影响下，财政收入增速将明显放缓。与此同时，同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和人口老龄化关系极其密切的养老保障和医疗卫生支出，将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因此，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的财政收支两翼都将面临一定压力。

关键词：财政形势 财政收入 财政支出 财政预测

作者简介：高培勇，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

杨志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研究室主任；

汪德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审计研究室主任；

蒋 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税收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中国财政收支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速换挡和结构调整阵痛、前期刺激政策消化交织在一起。另一方面，随着改革步入深水区，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被定位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同时，财政也被定位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从而财税体制变革的目标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重合在一起。上述两个方面的变化，分别从发展和改革两个线索传递到财政收支，必然对未来财政收支的规模和结构产生深刻影响。

一、未来全口径财政收入形势

（一）影响未来全口径财政收入规模的主要因素

影响未来全口径财政收入规模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稳定税负”的战略判断，二是经济增长态势。

宏观税负是指一段时期内（通常为一年）政府全部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是衡量政府财政收入规模的重要相对指标。在当前的中国，它有不同类型的口径。^①全口径财政收入包括公共财政收入（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社会保险基金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等。在各类政府性基金收入中，根据对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的处理方式可分成不同类型口径，其中一个较为合理但有争议的口径是，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扣除征地拆迁补偿之后的余额计入政府财政收入。按此口径，2009 年-2012 年，中国宏观税负水平分别为 29.88%、33.85%、32.01%和 31.57%。这意味着，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宏观税负将稳定在 30%左右。^②

经济增长态势与宏观税负水平，共同决定了今后一个时期的财政收入总额的增长上限。经过 36 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人口红利逐步减少、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经济结构面临深度调整，GDP 增速将在较长时间内稳定在个位数增长阶段。1994 年财税改革以来长期保持的财政收入高速增长趋势将很难再现，财政收入增速相应下降，财政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将基本同步。

（二）2014 年全口径财政收入规模的判断

假设今后一段时期宏观税负与 2012 年保持一致，为 31.57%，并假设财政收入增速与 GDP 增速基本保持一致。

如果 2014 年的 GDP 增速有 7%、8%、9%、10%四种情形^③，那么，在这四种情形下，全口径财政收入规模将分别达到 192155.27 亿元、193951.12 亿元、195746.96 亿元和 197542.80 亿元。

①宏观税负有仅仅反映税收收入占 GDP 比重的狭义口径指标，也有只反映公共财政收入占 GDP 比重的中口径指标，还有反映政府掌握的全部收入占 GDP 比重的广义口径指标。

②之所以分析全口径财政收入，是因为考虑了在未来“稳定税负”只能在广义的意义上进行，考虑了未来部分费改税（如环境保护收费改税等）、政府性基金制度改革、国有资本分红比例上缴等多个因素。

③中国 2014 年将经济增长率定位在 7.5%左右。这样，理想的经济增长速度应该落在 7%和 8%这一区间。2014 年中国经济形势非常复杂，也不能排除世界经济形势变好或其他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因此，我们对 9%和 10%的经济增速对财政收入的影响也作了预测。

表 1 2014 年四种 GDP 增速下的财政收入增长情况

宏观税负(%)	GDP 和财政收入增速(%)	GDP(亿元)	全口径财政收入(亿元)
31.57	7	608664.15	192155.27
	8	614352.60	193951.12
	9	620041.05	195746.96
	10	625729.50	197542.80

注：2013 年国内生产总值按 568845 亿元计算。

（三）影响财政收入增长的结构因素

在上述判断基础上，还需特别注意如下结构性因素对财政收入增长的影响。

1. 税制结构对财政收入稳定性的影响。“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格局决定了一旦经济增速放缓，会导致财政收入更大幅度的下滑。这意味着，今后一个时期，随着经济增长的逐步放缓，实际财政收入规模可能会低于前面分析的结果。

2007 年-2013 年间税收收入增长弹性系数见表 2。之所以选择这一期间，是因为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后，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结构调整时期，税收收入也相应进入新增长调整期。在此期间，弹性系数平均值为 1.115。这意味着，今后一个时期内，如果 GDP 增长回落 1 个百分点，那么，中国税收收入增长率将回落 1.115 个百分点。

表 2 2007 年-2013 年税收收入弹性系数

年份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税收收入(亿元)	49449	54220	59515	70062	86524	100614	110497
GDP(亿元)	265810	314045	340903	401513	473104	518942	568845
弹性系数	-	0.532	1.142	0.998	1.318	1.681	1.0215

注：弹性系数=税收收入增长率/GDP 增长率。

数据来源：①税收收入：2007 年-2011 年数据来源于国家税务总局“税收收入统计”；2012 年数据来源于财政部“2012 年全国财政决算”；2013 年数据来源于财政部“2013 年财政收支情况”。②GDP：2007 年-2012 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3 年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2. 税制改革带来的减税效应。在税制改革的当前总体格局中，结构性减税成为其中重要内容，它意味着不同税制改革呈现“有增有减”的态势，但一些主体税种改革带来的减税效应非常深远，这主要是“营改增”等税制改革带来的减税效应。

从“营改增”试点来看，实际减税效应大于预期，将会加剧今后一段时期内财政收入增长的不确定性。例如，2012 年上海市首批纳入“营改增”试点，预期减税规模为 120 亿元，而实际减税规模却达到 250 亿元。随着“营改增”试点范围的逐步扩大，所引

发的实际减税规模会更大。截至 2013 年 6 月底，“营改增”试点企业达到 134 万户，减税规模超过 500 亿元。这些行业包括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按照《中国统计年鉴》的分类口径，涉及到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见表 3）。

表 3 2011 年建筑业和部分第三产业的增加值数据（单位：亿元）

产业类型	增加值
建筑业	31942.7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22432.8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9780.3
金融业	24958.3
房地产业	26783.9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9407.1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6965.8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3》。

2014 年 1 月 1 日起，已将铁路运输和邮政服务业纳入“营改增”试点。2015 年之前，如将“营改增”推进到不动产和建筑安装业、金融业，那么减税规模将更为惊人。按照上述减税规模粗略匡算，先期试点行业（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每年每亿元增加值减税规模为 0.0206 亿元^①。据此，如果将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纳入“营改增”，那么每年减税规模会在 1722.408 亿元。

不过，从更长的时间段来看，“营改增”的不断推进有利于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社会专业分工，增强第三产业的发展动力。它增强了税制中性，打通了第二、三产业之间的增值税抵扣链条，降低了主辅分离和服务外包成本，提升了社会分工协作的深度和广度。这又有利于扩大税基，带来税收收入的增长。

3. 房地产需求和消费升级将进一步带动税收收入增长。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大量劳动力转移至城市，同时，随着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不断增长，居民住房消费逐步升级，房地产需求仍在不断增加，从总体上看，房地产市场仍会是稳定的。^② 房地产行业的增长还会带来大量税费以及土地出让金收入。

① $0.0206=500 \times 2 / (\text{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 \text{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 \text{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text{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增加值})$

②房地产市场走向在某种意义上与中国经济是相同的。房地产价格与收入的不够合拍蕴含着房地产市场的风险。但对此更合理的处理办法应该是让房地产市场平稳着陆，让房地产价格相对稳定，或上涨速度慢于其他商品。

以 2013 年为例，全国营业税收入 17217 亿元，比上年增长 9.3%。其中，受全年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长 17.3%、销售额增长 26.3% 的拉动因素影响，房地产业营业税 5411 亿元，增长 33.6%。受固定资产投资较快增长拉动因素影响，建筑业营业税 4315 亿元，增长 16.5%；同年，房地产企业所得税 2850 亿元，增长 25.1%；财产转让个人所得税 664 亿元，增长 38%，主要受二手房市场交易活跃因素影响；受房地产成交量增加带动因素影响，契税 3844 亿元，增长 33.8%；土地增值税 3294 亿元，增长 21.1%；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41250 亿元，比上年增加 12732 亿元，增长 44.6%。

在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和适时推进改革的背景下，房地产领域现有税负水平将保持基本稳定。在现有房地产开发、交易、保有环节的税费归类、清理、整合之后，其税负将平移至房地产税之中。房地产税收入更多地体现为结构性变化，即开发、交易环节轻税，保有环节税负相应增加。短期内，房地产税改革对税收收入影响较小。但从长期看，随着房地产税基的扩大，房地产税收入会相应增加。随着居民收入的不断增长，税收征管水平的提高，个人所得税收入还将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①与此同时，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将加快，由此会带来企业所得税、消费税、车辆购置税等相关税收的大幅增长。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环节、税率，把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及部分高档消费品纳入征收范围，也将带来消费税收入的较多增加。

值得指出的是，伴随着房产税、个人所得税等直接税改革的进一步推进，税制结构不断发生转变，财政收入的整体稳定性在不断提高，财政收入增长将与经济增长之间更加趋于一致。

4. 工业领域产能过剩影响所得税收入。产能过剩表现出全面性和中长期性的新特点。产能过剩在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都已出现。2012 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船舶行业产能利用率分别仅为 72%、71.9%、73.7%、73.1% 和 75%，明显低于国际通常水平。2012 年，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行业企业亏损面分别为 28.2%、34.9%、27.8%、35.7%^②；多晶硅、风电装备、碳纤维、LED、云计算等部分新兴行业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产能过剩。2012 年中国多晶硅产能 15.8 万吨，产量 6.5 万吨；光伏组件产能 37 吉瓦，产量 22 吉瓦。^③这些产能超过了市场需求。

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消化产能过剩的过程可能较长。今后一个时期内，中

①即使适当下调税率，个人所得税收入仍将保持较快的增速。这种增长在税收征管水平改善过程中，在一定意义上是恢复性增长，因为过去经济增长的成果并没有在个人所得税上得到充分反映。

②数据来源于 2013 年 7 月 30 日中财网对时任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朱宏任的采访，<http://www.cfi.net.cn/p20130730000666.html>。

③乔标、栾群：《新兴产业过剩论调甚嚣尘上 为何会患上“旧疾”》，《经济日报》2013 年 5 月 28 日。

国工业企业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增速将维持一个较低水平。2013 年数据佐证了这一点，工业企业所得税 7422 亿元，仅比上年增长 1%。

5. 进出口因素。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迄今已有五年多。全球经济仍处于复苏中，但推动增长的力量在趋于好转。发达经济体逐渐从低迷中摆脱出来。美国截止到 2013 年三季度，已连续 10 个季度保持增长；欧元区经济逐步走出衰退，金融市场趋于稳定。全球经济复苏会助推中国货物与劳务出口增长，从而扩大出口退税规模，并推动原油、有色金属、铁矿砂等大宗商品价格的逐步上升，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和关税收入会相应增长。

6. 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有利于财政收入增长。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提高，将有利于全口径财政收入增长。根据财政部的数据资料，2012 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累计实现利润总额 21959.6 亿元。而同年，全国国有资本经营利润收入的决算数仅为 1154.02 亿元，纳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利润收入仅占利润总额的 5.26%。一旦提高至 30%，那么，按照 2012 年数据，国有资本经营收入中的利润收入将达到 6587.88 亿元。

二、未来财政支出形势

按照“量入为出”的基本原则，未来财政支出与收入规模应基本匹配。本部分主要预测教育、养老及医疗未来所需的相对财政支出规模。如按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为 32% 计算^①，不考虑延长退休年龄因素，财政在教育、养老、医疗的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 2020 年为 25.78%，2030 年达到 34.50%，2040 年达到 37.81%，2050 年达到 40.61%。

（一）教育相关财政支出的预测

影响教育财政支出的主要因素是入学人数和生均费用。按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年-2020 年）》提出的要求，到 2020 年学前教育基本普及、义务教育巩固提高、高中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90%、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40%。

根据联合国 2012 年版人口预测数据，估算 2010 年-2050 年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数量如图 1。各级教育的适龄人口数量将有个小高峰，幼儿园是 2016 年，小学是 2022 年，初中是 2025 年，高中是 2030 年，在小高峰之后绝对数均有明显下降。同时，结合上述《纲要》的目标，我们假设到 2030 年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高等教育适龄人口的覆盖率分别达到 95%、100%、100%、50%，其后维持这一比重。按照适龄人口和覆盖率的设定，2030 年前各级教育在校人数将有一定幅度的

^①根据前面部分宏观税负水平而得。根据财政部公开的 2012 年全国财政决算数据，2012 年全口径财政支出占当年 GDP 的比重计算结果基本与此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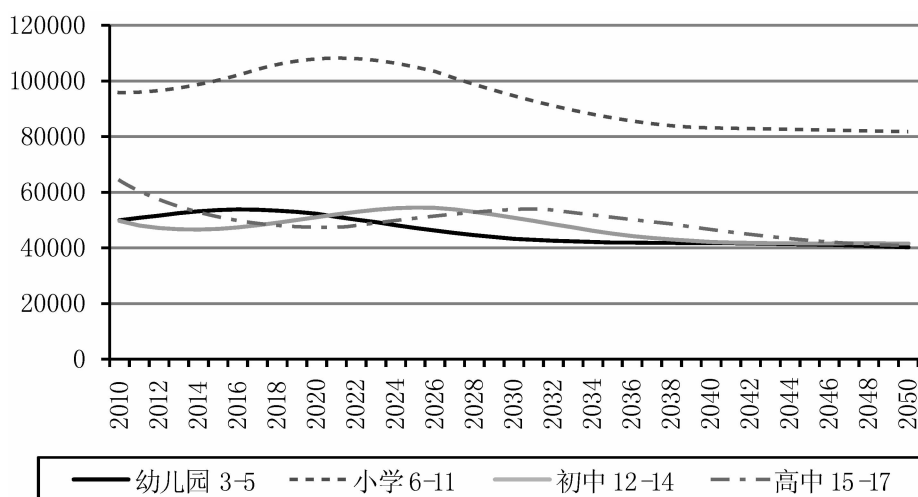


图 1 2010 年 -2050 年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适龄人口变化（单位：千人）

数据来源：根据联合国 2012 版人口预测数据测算，<http://esa.un.org/wpp/Excel-Data/population.htm>。

增长，在 2030 年之后均有明显下降。

教育财政支出的主体是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等在校教育支出（近三年均占教育财政支出的 90%以上）。表 4 所列的历史数据显示，近 10 年各级教育的生均财政教育经费增速较快，如小学教育和初中教育经费年均增速分别高达 23%和 24%。如此高的增速受化解义务教育债务、2012 年的“4%”达标问题等特殊因素影响。未来生均教育经费增长率无法维持如此高速。设定未来每年各级教育的生均经费增长率均与名义 GDP 增长率相同，即 2010 年 -2020 年为 9%，其后每 10 年下降 1 个百分点。

在给定各级教育的在校人数、生均经费增长情况之后，我们可估算出 2010 年 -2050 年在校生对应的财政教育支出。假定未来在校生财政教育支出占总体财政教育支出的比

表 4 2002 年 -2050 年生均财政教育经费历史数据和未来增长率

	2011 年生均 财政经费（元）	2002 年 -2011 年生均 教育经费年均增长率（%）	设定 2010 年 -2050 年 生均经费增长率
幼儿园	2488	12	同名义 GDP 增长率
小学教育	5063	23	同上
初中教育	6742	24	同上
高中教育	5032	13	同上
职业教育	6805	15	同上
高等教育	14442	17	同上

资料来源：根据各年《教育经费统计年鉴》计算所得，其中高等教育是 2005 年 -2011 年数据。

重维持为 91%，则可估算出 2010 年 -2050 年财政教育经费占当年 GDP 比重如表 5。按照估算结果，财政教育支出占 GDP 比重将在 2030 年之前快速上升，2030 年为高峰值达 5.31%，其后由于在校人数的下降而略有回落。假定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为 32%，相应地，财政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比重 2020 年、2030 年、2040 年和 2050 年则分别为 14.94%、16.60%、15.81%和 15.56%。

表 5 2010 年 -2050 年财政教育经费预测

	2010 年	2020 年	2030 年	2040 年	2050 年
财政教育经费占 GDP 比重(%)	3.66	4.78	5.31	5.06	4.98
财政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比重(%)		14.94	16.60	15.81	15.56

（二）养老相关财政支出的预测

财政的养老保障支出与养老保障的运行模式和具体政策密切相关。以高培勇、汪德华（2011）的测算方法为基础，按照当前政策走向，设定中国采取两种模式，到 2015 年实现养老保障全覆盖：一是针对就业人口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二是针对农民、城市居民等非正式就业人口的居民养老保险。^①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从基本制度安排上看，应是依靠企业和职工的缴费收入自我平衡养老金支出，政府承担兜底责任，即在出现支出大于缴费收入的资金缺口时，财政予以弥补。居民养老保险采取财政在缺口定额补贴的模式承担支出责任。总体上，养老保障对应的财政支出，包括政府对职工养老保险体系的兜底责任和对居民养老保险的缺口补贴责任。

两种养老保障模式都有具体参数选择问题。参数选择对于未来财政支出责任影响较大。我们假定职工养老保险的相对覆盖范围将不断扩大，从目前覆盖城市适龄人口 55%左右的比重提升到 2050 年的 80%。假定财政对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补贴，从当前相对于社会平均工资的 3.6%以下^②，到 2020 年达 5%，2030 年达 10%，以后维持这一水平。按 2012 年数据计算，职工养老保险的养老金替代率（人均养老金相对于上年社会平均工资）为 50%，参保职工缴费率（相对于当年社会平均工资）为 15.3%。假定未来职工养老保险收支两端将维持这一参数水平。按照现行退休政策，职工养老保险体系内的赡养比约为 3.1:1，如不调整退休政策，情况将进一步恶化。我们测算两种情况，一是维持现有退休年龄政

①高培勇、汪德华：《中国养老保障体系资金缺口分析与对策建议》，《比较》2011 年第 53 辑。

②数据来源：财政部网站。2012 年，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补助为 2527.3 亿元。同年，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城镇职工就业人员工资总额为 70914.2 亿元。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补助占城镇职工就人员工资总额的比例为 3.6%。

策不做调整，二是从 2015 年开始，按照两年提高 1 岁的力度，逐步将职工退休年龄推迟到 65 岁。

在设定以上参数之后，以联合国 2012 年版人口预测数据为基础，对职工养老保险和居民养老保险的未来所需财政补贴进行预测，具体结果如图 2 所示。自 2013 年开始，职工养老保险将出现缴费收入低于养老金支出的资金缺口，即需要财政予以补贴才能维持当年收支平衡。无论是否调整退休年龄，年度资金缺口将继续扩大。在不调整退休年龄政策情况下，2020 年年度资金缺口占 GDP 比重为 0.90%，2030 年为 2.08%，2050 年为 4.31%。如能在 2025 年前将法定退休年龄推迟到 65 岁，则到 2020 年年度资金缺口占 GDP 比重为 0.46%，2030 年 1.25%，2050 年 2.82%。两者比较，无论是否推迟退休年龄，自 2013 年开始，职工养老保险都需要财政补贴才能维持收支平衡，但推迟退休年龄能够显著降低未来年度资金缺口。图 2 也显示，居民养老保险所需的缺口财政补贴占 GDP 比重也将逐步攀升，到 2034 年前后达到顶峰，其后由于覆盖老年人口的比重下降而缓慢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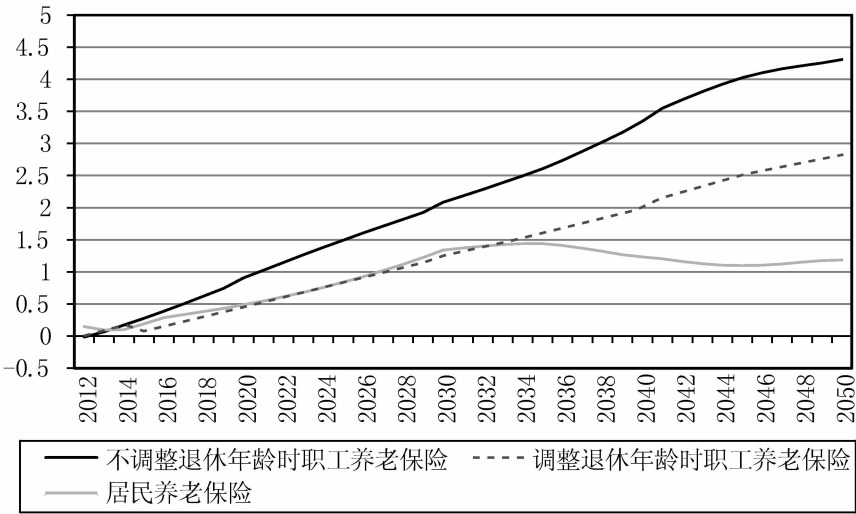


图 2 2012 年 -2050 年职工、居民养老保险的年度资金缺口占当年 GDP 比重

需指出的是，中国对职工养老保险的财政补贴已有多年的，2012 年达 2527.3 亿元。这种财政补贴主要解决的是，由于职工养老保险统筹层次不高而导致区域性收不抵支问题。按照预测结果，2013 年开始出现总体上的收不抵支，即在总量上需要财政补贴才能维持收支平衡，满足支付养老金的需要。当然，以财政补贴形成的现有资金结余，大致可以满足 2019 年之前的补贴之需。

2010 年 -2050 年职工和居民养老保险所需总体财政补贴占当年 GDP 比重的预测结果见表 6。如不调整职工退休年龄，则总体财政补贴占当年 GDP 比重将不断攀升，到 2050 年将达到 5.5%；如调整退休年龄，则到 2050 年将达到 4.01%，比前者低 1.5 个百分点。相应地，按照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为 32% 的假定，不调整职工养老保险退休年龄，养老保

险财政补贴占财政支出比重 2015 年、2020 年、2030 年、2040 年和 2050 年分别为 1.50%、4.38%、10.69%、14.31%和 17.19%；如调整职工养老保险退休年龄，养老保险财政补贴占财政支出比重 2015 年、2020 年、2030 年、2040 年和 2050 年分别为 0.91%、3.00%、8.09%、10.13%和 12.53%。

表 6 2015 年 -2050 年职工养老保险和居民养老保险所需财政补贴

年份	不调整职工养老保险退休年龄		调整职工养老保险退休年龄	
	财政补贴占 GDP 比重 (%)	财政补贴占财政支出比重 (%)	财政补贴占 GDP 比重 (%)	财政补贴占财政支出比重 (%)
2015	0.48	1.50	0.29	0.91
2020	1.40	4.38	0.96	3.00
2030	3.42	10.69	2.59	8.09
2040	4.58	14.31	3.24	10.13
2050	5.50	17.19	4.01	12.53

（三）医疗卫生相关财政支出的预测

医疗卫生总费用快速上涨，也将给财政支出带来较大压力。由于医疗卫生费用与财政的相关支出关系较为复杂，难以逐项分析作出合理预测。参照国际经验以及中国当前政策目标，医疗卫生总费用由财政支出、医保缴费支出、个人自负支出三部分构成，设定未来医疗卫生领域的财政支出将占医疗卫生总费用的 30%（与 2011 年的比重一致）。由此，可以通过预测未来中国医疗卫生总费用的增长趋势，来预测医疗卫生领域的财政支出增长趋势。

基于国际经验及学术研究成果，中国医疗卫生总费用将快速上涨的主要原因可归结为以下四点。一是人均收入水平增长将带来更多的医疗卫生支出，多数研究表明医疗卫生支出的收入弹性大于 1。二是人口老龄化，老龄人口组别的卫生支出远大于其他年龄人口组别的卫生费用。三是通过自主创新和引进吸收推动的医疗技术水平提升，新的医疗技术在改善医疗服务质量的同时也需要更高的成本。四是医疗保障范围和水平继续提升。其中，人口老龄化因素是目前全球范围内医疗卫生费用不断攀升的主要影响因素，也是预测中国医疗卫生总费用增长趋势需关注的重点。

借鉴马骏等（2012）的做法^①，对中国医疗卫生总费用的预测基本思路如下：利用分年龄组人口预测数据和卫生服务调查提供的分年龄组门诊率和住院率，估算出未来年

^①马骏、张晓蓉、李治国等：《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年版。

度门诊人次数和住院人次数；假定未来次均门诊费用和次均住院费用的增长率等于 CPI 和名义人均工资增长率的平均值；由各年门诊人次数、住院人次数、门诊次均费用、住院次均费用，可获得相应年度的门诊住院总费用；结合历史数据，假定未来门诊住院总费用占卫生总费用的 61%，则由预测的相应年度门诊住院总费用，可获得预测的医疗卫生总费用。^①按上述医疗卫生财政支出占医疗卫生总费用 30% 的设定，可获得医疗卫生财政支出占当年 GDP 的比重。

与马骏等（2012）的主要差别在于，我们直接采用联合国 2012 年版人口预测数据，其他参数和假定则同马骏等（2012）基本一致。相比较而言，联合国 2012 年版人口预测数据较马骏等（2012）的人口预测数据在年龄结构上相对年轻化，由此预测的医疗卫生总费用和相应财政支出略低（见表 7）。中国医疗卫生总费用占 GDP 比重将在 2010 年占 5% 的基础上不断递增，到 2050 年将达到 8.4%。如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占医疗卫生总费用比例维持在 30% 的水平上，则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占 GDP 比重到 2050 年将达到 2.52%。假定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为 32%，那么 2020 年、2030 年、2040 年和 2050 年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分别为 6.47%、7.22%、7.69% 和 7.88%。

表 7 2010 年 -2050 年医疗卫生总费用及财政医疗卫生支出预测结果

	2010 年	2020 年	2030 年	2040 年	2050 年
医疗卫生总费用占 GDP 比重（%）	5.00	6.90	7.70	8.20	8.40
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占 GDP 比重（%）	1.50	2.07	2.31	2.46	2.52
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		6.47	7.22	7.69	7.88

（四） 总体情况

表 8 显示教育、养老、医疗卫生所需财政支出的总体情况。三项支出的比重将逐步上升，如不调整职工养老保险退休年龄，则到 2050 年将达 13%；如调整退休年龄则到 2050 年将达到 11.51%。表 8 还显示，教育和医疗支出的比重较为稳定，而养老支出的比重上升较快。三项支出占 GDP 比重在 2030 年之前上升很快，大致每 10 年上升 3 个百分点（如调整退休年龄则为 2.5 个百分点），而 2030 年之后则大致每 10 年上升 1 个百分点（如调整退休年龄则为 0.5 个百分点）。

据此，如按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为 32% 计算，不考虑延长退休年龄，财政在教育、养老、医疗的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 2020 年为 25.78%，2030 年达到 34.50%，2040 年达到 37.81%，2050 年达到 40.61%。

^①根据近年来的《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有关数据计算而得。

表 8 2010 年 -2050 年教育、养老及医疗卫生财政支出

	2010 年	2020 年	2030 年	2040 年	2050 年
财政教育经费 (%)	3.66	4.78	5.31	5.06	4.98
财政养老补贴 (%)		1.40	3.42	4.58	5.50
推迟退休年龄 (%)		0.96	2.59	3.24	4.01
财政医疗卫生支出 (%)	1.50	2.07	2.31	2.46	2.52
不推迟退休年龄财政的教育、养老及医疗卫生支出占 GDP 比重 (%)	5.16	8.25	11.04	12.10	13.00
不推迟退休年龄财政的教育、养老及医疗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 (%)		25.78	34.50	37.81	40.61
推迟退休年龄下, 财政的教育、养老及医疗卫生支出占 GDP 比重合计 (%)	5.16	7.81	10.21	10.76	11.51
推迟退休年龄财政的教育、养老及医疗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 (%)		24.41	31.91	33.63	35.97

三、基本结论

本文在中国经济步入新阶段和改革步入深水区的宏观背景下, 对未来中国财政收支形势作了初步分析与预测。需要注意的是, 影响财政收支的因素很多。按照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 只要经济稳定增长, 财政收入相对规模 (表现为广义的宏观税负) 稳定的目标比较容易实现。但影响支出的因素, 特别是与人口老龄化相关的养老服务价格变化、医疗技术上升所带来的医疗支出规模扩大, 增添了财政支出压力的更多不确定性。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2013 年 11 月 12 日。
2. 高培勇: 《继续调控宏观经济 推行结构性减税》, 《经济日报》2012 年 12 月 5 日。
3. 高培勇: 《筑牢国家治理的财政基础和财政支柱》, 《光明日报》2013 年 11 月 15 日。
4. 高培勇、杨志勇主编: 《中国财政政策报告 2013/2014: 将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落到实处》,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4 年版。
5.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 《世界人口展望: 2012 年修订版》。
6. 杨志勇: 《税收经济学》,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7. 杨志勇: 《地方财政困难呼唤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 《东方早报》2013 年 6 月 27 日。

责任编辑: 李 蕊

加强我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能力建设

王冠群

摘要：新兴经济体崛起以及经济多边主义发展已对全球经济金融格局演化产生重要影响，随之对全球金融治理机制调整和变革产生压力。过去几十年中，在全球金融治理领域，我国从边缘化角色逐步转变为重要参与方与决策影响者。我国应合理确定参与全球金融治理阶段性目标，提高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能力，主要措施包括：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夯实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基础；加快金融改革，提高金融实力；加快金融机构“走出去”步伐；持续打造结构合理的国际化金融人才队伍；重点加强与周边、金砖国家等金融合作；创造条件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积极建立我国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等。

关键词：全球金融治理 国际金融机构 金融监管合作 国际货币体系 人民币国际化

作者简介：王冠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研究员。

全球金融治理是指在部分或全体主权国家超越主权的金融合作和共治，包括与之有关的行为、机制、机构和理念。其框架主要包含三部分：一是西方发达国家搭建并主导的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二是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构建的二十国集团（G20）；三是金砖国家组成的金砖国家合作机制（BRICS）。

一、全球金融治理简要回顾

二战后，国际金融体系基本框架由美国及其主导的西方国家构建，其运作机制反映了美国意志并为美国利益服务。IMF、WTO、WB 以及其后的 G7 基本上沿循了上述格局与利益导向。上述机制共同特点在于：决策权由美国及其主导的发达国家掌控，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处于被支配地位。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演化，新兴经济体实力不断增强，经济多边主义日益深化，国家间实力对比与原有权利结构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使后布雷顿森林体系调整与变革的必要性进一步强化。

G20 近年开启了全球金融治理，其未来作用仍有不确定性。较为严格意义的全球金融治理发轫于二十国集团非正式部长会议机制确立。1999 年 9 月，鉴于亚洲金融危机的深刻教训，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组成 G20，为有关国家围绕国际重大经济金融事务举行非正式对话提供了平台。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G20 在危机应对和促进世界经济复苏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际金融稳定与发展。从危机应对到经济金融治理转换，G20 在全球金融治理的作用效果并不显著。一方面，虽然 G20 在 IMF 和 WB 投票权改革上有所进展，但与中国等新兴国家合理要求仍有不小距离。另一方面，在发展中国家普遍期望的国际贸易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上，G20 发挥的积极作用较为有限。截至目前，G20 仍是一个具有非正式性、灵活性、宽松包容性、较为广泛代表性和不具约束力的全球性经济论坛，其未来发展、影响和作用还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既发挥了积极作用，也受到相应因素制约。2009 年，“金砖国家”组成金砖国家合作机制。2013 年 3 月，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在南非德班举行，会后发表的《德班宣言》决定设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外汇储备库等，在国际金融领域发挥积极作用。一方面，该机制形成之初就在国际社会积极发出自己的声音，在促进国际经济改革上采取了一系列实质性措施，在支持 G20 成为国际金融治理核心机制方面采取了积极态度，积极推动新兴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权提升，采取措施推动国际社会各方完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等。另一方面，地缘政治上的分歧、社会制度上的差异、国家力量之间的不对等以及其他经济合作体的影响，如 VISTA 五国、灵猫六国等，使得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发挥积极作用也面临一定制约。总体看，金砖国家整体实力仍相对较弱，金砖国家内部差异性和利益冲突降低了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合力效应，随着金砖国家经济发展的分化，其合作机制未来发展与作用仍有不确定性。

二、我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回顾与现状

（一）我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回顾

通过以往 30 多年对全球经济体系的参与，我国逐渐了解、认识和运用了国际经济与

金融体系的运作规则，为在此进程中主动深化参与全球经济事务和参与全球金融治理，逐步夯实了基础。从近年我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看，无论在较早的 G7、G8 机制，还是在 2005 年确立的 G8+5 机制中，我国在全球金融治理中基本处于较为次要和被动地位。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加之我国经济稳定和快速增长，凸显了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稳定和发展中的重要积极作用，我国在全球金融治理的地位与影响显著上升，成为全球金融治理的重要参与方与决策影响者。总体看，近年我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经历了一个从被动到主动的过程；经历了一个从引入和服从国际金融体系规则，到影响、参与和部分制定体系规则的过程；经历了一个从仅仅具有被领导权到参与次领导权的过程。其中，两个重要因素不容忽视，其一，是我国国力发展为更有效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奠定了物质基础。其二，是我国较好地关注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国际社会期望我国进一步发挥作用的积极因素在不断增长。上述两个基本因素，形成了我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发展空间不断上升的支撑性因素。

（二）我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现状

1. 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主要成绩

其一，我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机制中地位有所上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是成员国地位的重要象征，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力量的不断提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进行数轮改革，意在赋予新兴市场国家更多话语权。截至 2008 年 3 月生效的投票改革方案，我国在 IMF 的特备提款权（SDR）份额占 3.72%，投票权占 3.55%，仅次于美国、日本，跃居第三位。

其二，我国代表任国际金融机构高管的情况有所突破。2011 年，中国人民银行前副行长朱民被任命为国际货币基金副总裁。2012 年，中国籍雇员林建海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秘书长一职，负责操办 IMF 董事会的日常活动。同年，蔡金勇出任世行旗下国际金融公司的执行副总裁兼首席执行官（CEO）。中国籍高管在国际金融机构的履职显示我国在国际金融机构中受重视程度有所上升。

其三，我国借助 G20 发挥的作用不断扩大。自 G20 成立以来，我国参加了所有 G20 会议，并在 2005 年担任了轮值主席国，不仅积极阐述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与政策，更积极参与了宏观经济评估、国际宏观经济金融政策对话和协调、危机应对、全球经济增长框架、金融部门改革和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等重大议题的讨论与实施，显著提高了我国在国际经济金融事务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其四，我国参与国际金融组织的数量增加，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维度不断扩大。我国加入了国际清算银行、巴塞尔委员会和金融稳定理事会等重要国际金融组织。自 2006

年以来，中国中央银行行长一直是国际清算银行（BIS）董事会成员，我国利用国际清算银行平台的作用，在宏观经济金融政策领域，加强了与全球主要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的对话与合作。通过加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和金融稳定理事会等组织，我国全面参与国际标准和规则制定，为国际金融准则的形成做出了积极贡献。

其五，我国在全球金融监管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全球化背景下，全球金融已融为一体，但当前监管体系缺乏对金融机构、金融结构的综合性监管，从而容易导致“监管套利”。“监管套利”对国际金融体系损害严重，这也是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目前，我国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宏观审慎框架的构建，提高了新兴市场国家在监管标准制定方面的话语权，更多地反映了新兴市场国家利益。

其六，人民币国际化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2009 年我国启动跨境人民币结算试点，近年人民币在跨境使用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截至 2012 年，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业务规模已从开始的 36 亿元达到 2.94 万亿元。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占比已超过 11%，我国还与英国、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目前，香港已成为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新加坡及欧洲一些城市也在加快建设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人民币已实现了局部自由兑换。未来 10-20 年，人民币有望成为类似日元、英镑等的区域性乃至第二层次国际货币。

其七，中资金融机构海外业务遍布全球，交易规模显著扩大，国际影响力逐步扩大。截至 2012 年底，我国 1.6 万家境内投资者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近 2.2 万家，分布在全球 179 个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 5319.4 亿美元，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 2.3 万亿美元。截至 2012 年底，我国在亚洲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 3644.1 亿美元，占比 68.5%，主要集中在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拉丁美洲投资存量 682.1 亿美元，占比 12.8%，主要集中在英属维京群岛、开曼群岛、委内瑞拉、巴西、阿根廷等国家和地区；非洲 217.3 亿美元，占比 4.1%，主要集中在南非、赞比亚、尼日利亚等国家；欧洲 369.8 亿美元，占比 7%，主要集中在卢森堡、英国、俄罗斯、法国等国家；大洋洲 151.1 亿美元，占比 2.8%，主要集中在澳大利亚等国家。

2. 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主要不足

其一，我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影响力受到较大限制。从具体情况看，我国提高所持份额计划受阻。2010 年，在 G20 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上，各方就 IMF 份额改革达成协议，计划将我国所持份额从 3.996% 升至 6.390%。但该决议在 2014 年 1 月再次被美国否决，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中独大局面并无变化；发达国家持有特别提款权的比重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我国运用特别提款权仍较大程度受制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管人员的任命仍由欧美主导，历任总裁均来自欧洲国家，我国高管难于充分

发挥作用。

其二，我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战略前瞻性不足。与传统金融发达国家比较，我国金融体系历史上较为落后，整体国力不足，在加入国际金融组织早期，我国重点以了解情况、适应规则和力所能及地削弱发达国家不合理主导等为主要任务。该思路毫无疑问具有历史合理性，但其不足之处在于，对我国经济实力发展速度估计不足，战略上略显保守，故而未能前瞻性设计我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步骤与路径。就此而论，历史上我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存在一定失误因素。

其三，我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能力与经济实力上升协同性不足。历史上，我国早期对国际金融影响力的价值认识不足，更为重视国际贸易与产业合作，国际金融合作有所不足，相对封闭的金融体系在降低我国国际经济金融风险的同时，也降低了我国金融体系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影响了我国及早介入和发展国际金融治理能力。近年来，我国经济实力增长速度较快，对国际金融和影响力价值的认识快速上升，但鉴于自身准备不足和国际博弈加剧等原因，我国国际金融影响力与经济发展仍未能充分协同，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效果与经济实力相比仍不相称。

其四，我国在全球金融治理中发挥影响的策略与技巧不足。一个国家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影响力主要取决该国经济与金融硬实力，但同时，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策略与技巧也十分关键，恰当的策略与技巧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反之，则会对硬实力的影响大打折扣。从现实看，我国设计维护自身权益、提高自身地位而又同时能够有助全球利益机制的能力还不足，致使我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缺少更大的战略空间。更有甚者，在某些情况下，我国提出的主张反而成为少数国家挤压我国、索要利益的借口。例如，我国对市场经济国家资格的诉求就成为部分国家对我提出要求的借口。

其五，我国金融体系发达程度不足制约了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能力。发达的国内金融体系是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并取得较好效果的重要基础之一，只有金融体系较为发达，我国才具备在积极创新中提高对不断发展变化的国际金融体系的适应力和影响力。但目前，我国利率市场化水平仍然较低，汇率市场化进程受各种因素制约较大，国际储备结构仍有待优化；资本市场建设仍有极大潜力，对外投资能力较弱和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尚不理想，这些因素都制约了我国适应国际金融形势变化、提高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水平的能力建设向更深入发展。

其六，我国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输出增长缓慢，国际影响较小。中资金融机构海外业务主要集中于港澳地区，在其他地区机构和业务扩张缓慢，影响力较低。截至 2009 年末，在 16 个中资机构在海外设立的 44 家营业机构中，31 家设在港澳地区。另外，我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影响较小，对外提供金融服务的能力也很有限，目前主要还是通过向在

华外资（合资）企业和在华金融机构提供金融服务的方式，来间接对外提供金融服务。

其七，人民币国际化水平不足，境外人民币产品交易活跃度不高。虽然自 2009 年开始实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以来，交易规模有了显著增长，但目前我国周边经济体的人民币流通总量仍然不大，其占我国境内货币供应量的比例也还很低，而且在我国非周边经济体（包括欧美等国）也基本上没有利用人民币结算（旅游人民币的兑换和支付除外）的情况。因此，目前人民币仅处于国际化的初始阶段。就境外人民币产品市场看，人民币 NDF 市场交易最为活跃、影响力最大，其他市场则成交清淡，影响力不大。

三、我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阶段性与方向

全球金融治理是极为复杂的大国博弈过程，涉及领域往往并不仅限于金融领域，集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和综合性于一身。因此，提高我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能力不会一蹴而就，故而切合国内外实际设定阶段性目标十分关键。

（一）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全球金融治理机制的公平、公正和包容程度

重点包括：针对全球金融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决策机制，提高我国参与的公平度和有效度；提高我国在相关机构高管人员中的代表性；提高我国在国际金融风险监管体系中话语权；围绕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提高全球金融治理主导国家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有序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高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督促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实施承担国际责任与义务的货币与汇率政策，降低国际资本流动对新兴经济体的负面作用；初步建立由我国主导的区域性国际金融组织和国际金融规则。

（二）在重点领域提高我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影响力

在重点领域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提高我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投票权份额；提高我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高级、中级管理人员的代表性；提高我国在国际金融规则设计中的参与程度和决策程度；有序提高我国拥有的特别提款权比例；提高我国在国际金融风险监控领域，尤其是国际资本流动领域的参与程度与影响力；提高我国对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承担国际责任的影响力。

（三）快速提高我国利用全球金融治理机制对国际金融风险的监管与处置能力

未来一段时期，全球金融风险有逐步扩大趋势，为此，应围绕重点领域，加强国际金融风险监管合作。主要领域包括：国际金融风险预警机制合作；国际资本流动监控；国际资本市场风险传导；利率与汇率国际协调；跨国金融机构监管；国际信用评级体系协调；国际货币政策协调；海外投资风险监控与处置体系建设和跨国投资者保护等等。

（四）快速提高人民币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作用

立足现实，在承认美元主导地位前提下，充分发挥其他国际货币的积极作用，努力提高人民币国际化水平，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进程。在积极扩大人民币国际贸易货币规模的同时，重点提高人民币在全球国际投资货币与国际储备货币中的比例，重点提高人民币双向流动水平；提高人民币与主要国际货币之间汇率的可协调性；发挥国际合作机制的作用，提高 SDR 使用范围与规模，将人民币纳入 SDR 货币篮子中。通过上述措施，提高人民币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提高我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水平。

（五）强化全球大宗商品价格非理性波动治理机制合作

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全球经济影响巨大，是影响我国经济安全的重要现实因素。粮食、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非理性大幅波动暴露了全球金融治理中的薄弱环节，我国应积极采取措施，加强全球金融治理机制合作，力争降低全球大宗商品非理性波动对世界与我国的影响。

（六）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是未来我国金融市场国际化的重要步骤与关键举措。未来一段时间，我国要想在全球金融体系中有话语权的实质性提升是非常困难的，可以考虑从其他方向寻求突破。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不断拓展金融市场的广度与深度，建设比较发达的多功能、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完善金融法制建设，制定符合国际惯例的金融税收和法律制度。我国理所当然地在本国的国际金融中心拥有较大的话语权，从而逐渐形成与纽约、伦敦等金融中心抗衡的局面，我国也就成为国际金融体系中举足轻重的国家，在国际金融治理中的重要性就能进一步提升。

（七）推动中资金融机构国际化，提升中资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

推动金融机构“走出去”，实现金融机构国际化，符合国家推动企业“走出去”的战略需要，同时也有利于我国实现金融服务的进出口平衡，有利于提升我国金融业的国际影响力。对此，应该着重培育具有中资背景的资信、评级、评估、会计、审计、资讯、法律服务等服务类机构，培养起国际生存能力，争取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话语权。另外，我国货币当局和有关金融当局也要积极扩大对国际金融事务的参与，加强对国际金融形势的分析，适时发布对国际金融领域重要事件的看法，营造有利的国际舆论氛围，为我国货币、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发挥更大的国际性作用创造宽松的舆论环境。

（八）推动我国金融市场国际化，提高我国金融市场对外服务能力

实现我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化，使主要由国内参与者参与交易的金融市场逐渐转变为

由全球参与者共同参与交易的金融市场，逐渐扩大我国对国际金融交易的影响力，逐渐由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单纯参与者转变为参与者和组织者，由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信息接受者转变为信息发布者，由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中介服务的消费者转变为中介服务的生产者，同时，争取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话语权和定价权，从而更好地保障我国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金融利益。

四、提高我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能力的建议

总体看，提高我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能力，需从提高我国自身综合国力、积极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和提高捕捉国际金融影响力重大机遇等方向综合考虑。

（一）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夯实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基础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正面临国内外多重矛盾挑战。就国内因素而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任务艰巨繁重，总需求下降、经济结构失衡、产业核心竞争力和科技水平不足等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就国际因素而言，美国量化宽松政策正在加紧退出，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人民币汇率问题喧嚣不止，新兴国家之间经济合作尚未理顺，亚洲部分国家经济金融形势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这些外部因素有可能对我国经济金融稳定与发展造成切实威胁。因此，进一步提高我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能力，需要围绕上述关键领域，有针对性地化解矛盾，确保我国经济大局稳定，切实提高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只要综合国力不断提升，我国提高参与全球金融治理能力就会具有基本保障。

（二）加快金融改革，提高金融实力

金融领域是全球金融治理的核心领域，提高参与全球金融治理能力，需要发达的金融体系作为核心支撑。从目前看，我国金融体系改革还有较大空间，应重点做好以下领域的工作：放宽金融行业准入，积极鼓励民间及各类资本设立金融服务机构、金融中介组织；针对我国近年地方债务特点，完善地方金融监管机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用市场手段化解金融风险；针对我国直接融资市场发育不足的特点，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积极推进利率与汇率市场化；扩大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和积极建设以我为主的信用等级评估体系。通过上述措施，大力提升金融要素市场化程度，壮大我国金融实力。

（三）加快金融机构“走出去”步伐

我国海外金融机构是经济金融实力发挥国际影响的重要载体，也是我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战略支点。近年来，我国多家金融机构“走出去”获得的较大进步，有效地拓展了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战略基础。在提高金融“走出去”力度时，既要重视我国在海

外建立金融机构，又要重视在风险可控条件下的跨国并购。在机遇选择方面，近期美国正在逐步加大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极有可能造成大量亚洲资本外流，我国可充分利用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稳妥积极扩大我国在亚洲的金融影响力，为在更大范围影响国际金融规则，制定国际金融规则，提高参与全球金融治理能力创造条件。

（四）持续打造结构合理的国际化金融人才队伍

我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既需立足经济和金融质量与规模的影响，也亟需大量国际化人才支撑。就现实看，人才战略对我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具有关键作用。基于全球金融治理的综合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人才队伍中不仅包含国际化金融人才，还应包括国际政治和经济战略人才，亟待制定我国长期战略人才规划，走培养与引进相结合的道路。

（五）重点加强与周边、金砖国家等金融合作

就我国现有国情和面临的世情看，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不宜单打独斗，必须最大限度发挥周边国家和其他有相同战略利益国家之间的合作。加强与周边、金砖国家和欧洲有关国家机制性合作，才能更有效发挥我国经济金融潜能，在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六）创造条件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和资本项目可兑换改革，积极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人民币国际需求建设，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结算货币、国际投资货币和国际储备货币建设，借助自由贸易实验区探索，加强境内离岸业务中心建设，争取在较短时间内大幅提高人民币境外使用规模，提高人民币国际地位，增强我国货币国际影响力，通过国际货币体系调整，提高我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能力。

（七）积极建立我国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

加强我国全球金融治理的影响力，需要全面提高我国对世界经济和金融活动的参与程度与影响力水平。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获得重大成就，经济金融实力不断上升，作为参与国际金融活动的重要主体，国际金融机构的作用不容忽视。

只有我国经济和金融实力更好地展示在国际舞台上，与其他国家发展共同利益，才能更好地释放我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潜力，与更多国家与区域形成合力，改善全球金融治理现状。为此，建议尽快设立金砖国家银行，加快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步伐。通过设立多国参与的有利世界经济金融发展的大型金融机构，倒逼全球金融治理机制变革，为我国提高参与全球金融治理能力提供机遇。

责任编辑：刘英奎

论打造“质量安全型”经济升级版

徐明焕

摘要：当前，我国处于转型发展的十字路口，正承受着经济高增长的惯性要求和加大结构调整力度的双重压力，要求把促发展与促转型有机结合，在保持经济平稳发展的前提下，有效解决经济发展中的质量安全问题，提升经济质量安全总体水平。所以，应当遵循质量安全规律的要求，针对经济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创新经济发展的新理念、新方式、新途径，激发经济发展的创新驱动力，着力打造“质量安全型”经济升级版，从战略上促进实现经济平稳发展和质量安全提升的有机统一。为了确保宏观经济发展目标任务实现，要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中激活新动力，通过创新人们普遍关注的 GDP 结构的实际内容，形成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促使我国经济始终保持在合理区间转型发展、科学发展。

关键词：打造经济升级版 质量安全型 科学发展

作者简介：徐明焕，国家质检总局进出口食品安全局综合业务处处长、博士。

“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是李克强总理提出的重大命题，这一命题为实现经济发展战略转变、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指出了方向，也为发展质量安全型经济提供了广阔空间。经济升级的显著标志是有效解决质量安全问题，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安全水平。因此，必然要求着力打造“质量安全型”经济升级版。

一、经济整体转型升级对质量安全的内在要求

打造经济升级版要在保持我国经济平稳发展的基础上，有效促进经济从整体上实现转型升级，就是要针对传统发展模式的主要不足，从发展理念、发展方式、发展动力等的根本性转变上，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更新换代。

（一）质量安全的科学理念

一方面，质量是经济发展内在规律的要求。质量是指事物更好地满足人们需要的属性；安全则是人们最基本的需要，是对质量属性的有力诠释。在经济活动中，质量是基础，安全是底线。“质量安全”这一概念反映在经济领域中人们的主体需要与经济活动客观属性之间的内在关系。质量安全也是经济活动中必须遵循的内在规律，是正确引导经济转型升级的核心理念。传统发展模式重数量、轻质量，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不符合质量安全规律的要求，经济发展理念有所偏差，已经引起广泛重视。如在国际贸易规则中充分反映质量安全需求，技术性贸易措施以质量安全的核心内容，反映人类在经济发展中对维护生命健康、安全、卫生、环保等的客观需要。我国加入 WTO 后，技术措施对国内的生产经营活动呈“倒逼”之势，对技术措施的应对和不可回避的发展趋势，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质量安全的客观性和规律性要求，以及对经济贸易活动的引领作用。为此，我国经济和对外贸易的粗放型增长也付出了较为沉重的代价。据调查，近三年来国际上出台的与我国有关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平均为 19.7%，约占世贸组织所关注通报的 1/5。2012 年，我国有 23.9% 的出口企业受到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影响，全年出口贸易直接损失 685 亿美元，占同期出口额的 3.34%，企业新增成本 280.2 亿美元。同时，我国从入世至 2013 年 7 月，共向 WTO 通报了 1658 个技术性贸易措施，其中 TBT 和 SPS 领域的措施在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中均位列前 5 名。

另一方面，质量是经济发展的价值追求。质量是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和必要载体。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质量和效益上来。进一步强调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更好满足人们对物质和文化生活质量提高的需求。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就是为了通过经济资源优化配置，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安全水平，以便在更高层次上满足人们的需要，并且要求通过制度创新，让改革和发展的“红利”最大限度释放，更多更好地惠及人民群众。经济发展的质量安全状况如何，消费者的感受最

为直接，消费者对产品、环境等质量安全的反映是重要的参数。据统计分析，2013 年全国质检系统受理与产品质量相关的咨询、举报和投诉 82.5 万起，其中举报 6 万起，投诉 3.98 万起。这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了消费者的质量安全理念在逐步增强。

（二）质量安全的推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要求

质量安全问题带有根本性，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了紧迫任务。主要原因是，经过 30 多年快速发展，我国粗放型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2010 年我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到 2012 年我国 GDP 已达 51.93 万亿元，比 1978 年增长了 23.2 倍。2012 年，我国经济总量约占全球的 11.5%，却消耗了全球 21.3% 的能源、45% 的钢、43% 的铜、54% 的水泥；原油、铁矿石对外依存度分别达到 56.4% 和 66.5%，排放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总量已居世界第一。针对这种状况，只有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到提升质量安全水平上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依靠高投入、高消耗、重复生产建设，保证经济发展高速度的问题，走出一条投入和消耗相对较少，增长速度适中，资源和环境能够承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普遍较高的科学发展之路。

同时，影响经济发展效益和生命健康的质量安全问题十分突出。据专家分析和估算，我国制造业因质量问题直接损失每年超过 1700 亿元，浪费了大量资源和能源，同时也严重污染了环境。2013 年产品国家质量监督抽查合格率为 88.9%，同比下降了 0.9 个百分点。全国执法查处质量违法案件 11.7 万起，涉案货值金额 48 亿元，查办大要案 2959 起，向公安机关移送案件 937 起。全年共截获进口不合格工业品 43521 起，退运或销毁 1879 批，遭遇境外退运出口货物 41140 批，共计 24.3 亿美元。我国相当部分的城市达不到新的空气质量标准。全国江河水系、地下水污染和饮用水安全问题不容忽视，有的地区重金属、土壤污染比较严重。据中国人民大学评估资料显示，我国空气质量好的城市只占 10.67%，差的城市占 75.80%，极差的城市占 13.52%。媒体报道 2013 年以来全国平均雾霾天数为 52 年来之最。约有 5000 万亩土地因污染严重无法耕种。目前，我国已知的外来入侵物种至少包括 300 种入侵植物、40 种入侵动物、11 种入侵微生物。据专家估计，外来有害生物每年给我国经济带来的损失在 2000 亿 -3000 亿元人民币之间。由于发展粗放、质量安全标准相对较低和检测技术不足等原因，以及环境污染等因素，给消费品安全、食品安全等带来不确定性，增添了不可预计的风险，国家每年要拿出数百亿元，启动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地下水严重超采综合治理的试点，加大了质量安全风险防范的难度和成本，亟需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效解决突出的质量问题。

（三）质量安全也是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我国经济总量越来越大，基数继续抬高，今后的 GDP 增速必将放缓。这既是现实发

展的需要，也是发达国家的经验。比如，当今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能有 3% 的增长便被看作理想水平，表明经济发展是健康的；高于此水平表示有通胀压力；低于 1.5% 的增长，显示经济放缓和有步入衰退的迹象。虽然经济的外延式增长有极限，但是内涵式增长却具有无限性。一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蕴于人们的质量安全需求。市场经济是以有效需求为核心的经济，人们对高质量产品和具有更高安全性能保障的产品的需求，将成为拉动经济需求的主导力量。2008 年我国食品农产品进口贸易额为 593.3 亿美元，2012 年已达 1114.4 亿美元，翻了近一番。这表明国内市场对质优安全食品农产品的旺盛需求。二是有效解决经济发展的质量安全问题，必须着力加强我国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这些将带动现代农业、环保产业和新技术服务业发展，必然扩大经济供需规模。三是重视实体产业发展将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汲取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教训，去经济泡沫化，重视发展实体经济，走产业高级化发展的道路，将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和潜力所在。四是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是提升质量安全水平的必然要求，表明带动经济发展的动力位移势在必行，发展前景广阔。五是民生产业和服务业不断发展。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第三产业及与其匹配的一、二产业发展有较大需求。另一方面，从经济增长实际情况看，国家对治理环境污染的资金投入，也将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目前，环保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部委，分别从制订防治计划、调整落后产能、提供资金支持、鼓励清洁能源等方向找到治理雾霾与自身工作的结合点，从国家层面向制服霾害擎起利剑。据国务院发布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到 2017 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可吸入颗粒物浓度比 2012 年下降 10% 以上，优良天数逐年提高；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细颗粒物浓度分别下降 25%、20%、15% 左右；到 2017 年，重点行业排污强度比 2012 年下降 30% 以上，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降低到 65% 以下。2014 年地方政府将加大环境治理投入资金，与环保相关的产业将面临发展的新机遇，完全有可能成为保持经济增长和提升经济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质量安全型”经济升级版的基本涵义和路径分析

（一）“质量安全型”经济升级版的主要内涵

一方面，提升质量是经济升级版的显著特征。顾名思义，“质量安全型”经济升级版主要是指质量安全这一明显特征，也是指经济升级版所具有的特殊属性，是新的发展模式区别于传统发展模式的显著特点。过去 30 多年，我国为了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相对于发展质量来说，更加重视经济发展的速度。我国从 1985 年开始实行 GDP 核算体系以来，经济一直保持高增长，主要通过扩大投资、政府支出、居民消费和净出口等来带动经济发展，实现跨越发展。GDP 指标在促进我国加速向市场化发展的进程方面，发

挥了很大作用，并受到了追捧。虽然 GDP 会掺杂水份、包含泡沫，如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初步核算数据显示，2013 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 56.8845 万亿，但据有关媒体统计和估算，28 省 GDP 总和约为 58.9423 万亿，足足超出 2 万亿。GDP 最大的不足还在于不能反映人们对经济发展的质量安全的根本需求。因此，必须冷静看待 GDP 变化，再不能以 GDP 论英雄。打造经济升级版必须着力克服重发展速度、忽视经济增长质量及对人的生命健康安全的不利影响等缺陷。另一方面，要求切实把提升质量安全贯穿经济发展全过程。一要做到以质量为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动因，把经济发展牢牢建立在重视质量、讲求质量的基础上，通过促进质量发展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二要坚持以提升质量安全为经济发展的主线和目标，使质量安全贯穿经济发展各个环节，做到以提升质量安全为重要目标，切实推进质量安全主导型经济发展。三要坚持以质量安全为检验和评判经济发展优劣的标准，把质量安全水平提高情况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成败得失的重要标准，正确引导经济向质量安全型发展。

（二）“质量安全型”经济升级版的重要意义

打造“质量安全型”经济升级版将在保持经济发展基本体制框架不变的前提下，实现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创新经济发展的境界，改变经济发展的方式，引领经济发展的方向。一是质量安全型经济反映了以人为本、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科学理念。彻底打破了为发展而发展、盲目追求发展速度和发展形式的不当做法。二是质量安全型经济反映了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的根本利益。回应了如何增进人类福祉和创造美好幸福生活，以及对经济发展模式的基本要求。质量安全作为完整统一概念，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人类根本利益关系的抽象反映，这一内在规律正是维系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保持其相互依赖、正常运转的纽带。三是质量安全型经济反映了基于经济活动价值判断的人类经济行为准则。表明经济发展与人的生命健康安全的非对称性，解释为什么个别产品的高质量安全风险可能导致系统性安全风险的原因，警示经济发展不当会使人类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遭遇不可逆的更大风险。告诫人类为了生活得更精彩，可以创新，可以探索，甚至可以冒险，但不能违背质量安全经济规律。四是质量安全型经济反映了社会进步的衡量标准。社会进步必须有利于维护人类的根本需要，以有利于提升质量安全为评价标准，否则，将离开人的主体需要，将误导经济发展。五是质量安全型经济反映了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责任和担当。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同样离不开中国，发展质量安全型经济将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新理念和正确的价值追求，在促进世界经济健康与和平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使中国真正屹立于世界经济强国之列。

（三）“质量安全型”经济升级版的基本路径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打造经济升级版的必由之路，而坚持理念、制度和科技创新则是打造经济升级版的主要动力。要按照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把质量安全因素融入经济发展各种载体之中，尽快形成新的经济驱动力，促进我国经济在更高水平上继续稳定发展。

1. 改善投资、消费和出口三大引擎。在投资结构方面，针对质量安全突出问题，加强三个重点，弥补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点。一是加大投资关系民生的乳及乳制品、肉类产品、食用油，以及职业教育、卫生医疗、养老保险、信息服务等产业发展。二是加大投资小城镇和新农村建设。下功夫加强城镇、乡村自然环境、生活环境的改善和保护的重点项目建设。三是抓中心城市空气污染治理、水资源污染治理、土壤污染治理。在居民消费方面，倡导节约型和简约型消费，防止不当消费对资源和环境造成的损害。坚定不移地反对奢侈浪费，保持消费与经济良性循环。城市居民以鼓励旅游、教育、医疗保健、休闲消费为主，农村居民以鼓励教育、医疗和保障性消费及基本生活消费为主。在外贸出口方面，运用技术性贸易措施调节进出口平衡发展，改变粗放型外贸发展的格局，遏制国际贸易中破坏基本经济资源、污染环境、危害人类生命健康、危害生态系统安全等行为。从解放资源约束和环境约束等出发，本着双赢和多赢的原则，特别要鼓励国内正常需要的进口，以及进口后的加工再出口。

2. 调整城乡发展重心，实现协调发展。我国幅员辽阔，城乡差别大，没有广大农村的质量安全水平提高，就没有国家整体质量安全水平的提升。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安全水平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不在少数的一二线城市，而在广大的小城镇和农村。因此，促进经济协调发展，提升经济发展质量还有很大的空间。打造经济升级版就是要尽快形成促进投资、消费和出口重心转移的有效机制，大力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东西部平衡发展。要适时调整城乡经济发展布局，着重加快农村“五大工程”的规划和建设：即乡村青山绿水保护工程、乡镇路网（道路和网络）工程、民居改造和古迹保护工程、农村水厕改造工程、为老龄农民服务的造福工程。通过这些方面建设，全面提高占总人口80%居民的生活质量，并使其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打造经济升级版的强大驱动力。

3. 创新经济发展的必要载体。打造经济升级版要把经济创新、区域发展和民生保障有机结合起来，需要适当的经济体承担重点区域、关键产业、重点项目建设。要加强经济体的创新：一是要大力发展承担为保障食品质量安全、消费品质量安全，完善全过程监管服务，为广大消费者服务的经济体。二是要大力发展承担新技术研发和推广服务的经济体。三是要大力发展承担环境保护、节约资源和能源、治理环境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的经济实体。四是要大力发展承担为保障居民生活服务、教育服务、社保服务

的经济体。五是要大力发展承担促进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的建设任务的经济体。可以考虑组建集投资、消费和出口服务于一体的“中国农村发展服务集团公司”，来具体承接项目建设任务。可在各地设立分公司，采取国家控股的方式，加强融集民资、外资。也可与解决大学生就业相结合，切实增强经济发展新动力，实现促进区域平衡发展、扩大就业、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等的有机结合，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

三、促进经济从整体上向质量安全型升级的对策建议

按照打造经济升级版的目标要求，必须针对传统发展模式的主要弊端，着重从战略上促进发展经济与提升质量安全相统一，大力发展质量安全型经济。

（一）确立战略目标，把质量安全型经济作为经济发展的长期任务

一是加强研究和规划，变质量安全“软约束”为“硬约束”。对质量与经济、质量与安全、质量与生产生活，以及质量与安全与人类基本生存和发展环境条件之间的根本性联系，进行系统研究，从宏观经济发展战略上加强对质量安全提升的发展规划，并将其从“软约束”转变为“硬约束”，以便克服人们对质量安全的重视还不稳定、不平衡的现象。二是明确提出“质量安全型经济”这一具有确定内涵的经济理念和发展方式。努力探寻能够综合反映经济发展现实需求、理想状态和发展趋势的经济形态，做到从满足人类自身需要的物质基础条件做起，有效解决发展中的资源、环境约束等难题。三是大力推进建设质量强国。《质量发展纲要（2011-2020）》的颁布实施，确立了质量安全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保障地位和作用，这是国家经济发展中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实施《质量发展纲要》的目的就是要进一步促进形成质量提升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互推动的良好局面，逐步实现我国从经济规模意义上的大国向经济质量强国迈进。四是避免经济建设和质量工作“双轨制”的现象。在实施《质量发展纲要》中要避免质量发展与经济发展“两张皮”和“双轨制”等现象，努力把实施《质量发展纲要》与推动实现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变，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消费需求，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要求有机结合。五是建立完善解决质量安全突出问题的长效机制。制定具体发展规划，立足当前、谋划长远，建立长效机制，加强督促检查和实绩考核，着力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产品质量、服务质量、工程质量总体水平不高，大气污染、土壤污染、水污染，以及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等质量安全突出问题，提升我国经济的发展层次和水平，增强我国经济的综合实力。

（二）借鉴负面清单，集中精力抓好质量安全问题的综合治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

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质量安全规律的要求，在正确界定政府职能作用的前提下，实施加减法，最大限度简政放权，保证公共产品供应及公共管理的需要。从经济体制的因素上看，质量安全问题主要是由于市场经济的负效应造成的，所以，从经济体制上说质量安全问题不可能通过市场机制自行解决。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的本质和本性早已揭示得淋漓尽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要用“看得见的手”自觉克服市场经济外部性和负效应，促进经济向质量安全不断提升方向发展。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就意味着，对市场经济实现资源高效配置的所有好的作法经验都可以加以利用，但是，唯独不能容许市场经济体制对质量安全这一人们的根本要求造成损害。也可以说，危害质量安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监管的“负面清单”，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就是要进一步明确这个清单，以便更有针对性地发挥好政府的作用，更好地集中精力对这一负面清单实施宏观管理和综合治理。

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必须坚持以质量安全为经济发展准则，把政府的主要精力转移到对质量安全问题的综合治理上来。要增强全社会质量安全意识，创新质量安全监管工作体制机制，坚持各级政府、监管部门、企业、行业乃至全社会的齐抓共管。一是着力维护产品质量安全。提升产品质量安全水平，防范发生区域性和系统性质量安全风险，是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任务。二是着力维护经济结构安全。经济结构失衡对满足人们需求的损害是巨大的，因此，需要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使资源得到最优配置，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需求。三是着力维护国际经济贸易中的质量安全。这是建立互利共赢国际经济关系，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发展对外贸易，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重要基础。四是着力维护经济资源和环境质量安全。坚持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最大限度地保护生态链、保护自然环境，做到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使各种经济资源得到永续利用。五是着力维护经济发展取向的质量安全。以科学的标准和依据正确评估经济发展的质量安全风险，预测经济发展的趋向，及时纠正经济发展的偏差，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

（三）加强风险防控，着力建立覆盖经济活动全过程的质量安全体系

食品、工业消费品、其它用途产品等的质量安全风险与产品的生产经营方式发展相伴随，产品的质量安全风险潜藏于生产经营的整个过程之中，产品生产经营延伸到哪里，质量安全风险就覆盖到哪里。必须探索建立和完善涵盖生产经营全过程的质量安全体系，加强全过程风险评估和分析，做到从产品的研发、原材料生产、成品生产、组装、储运、进出口、销售、消费等各环节的质量安全体系，保证产品生产符合质量安全标准，产品

交换和消费符合质量安全规范。一是要建立全过程监管制度，落实各环节安全责任。二是要着力促进作为市场经济实体和主体的企业切实承担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企业要按照产品的不同性质，加强质量安全风险防控措施，要建立健全有效的质量安全保障制度体系和技术支持体系。三是做到质量安全过程有记录、可追溯，一旦出现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可以迅速找到根源，迅速采取有效措施应对风险，采取适当的防控措施。四是要形成全社会重视产品质量安全、部门各司其职、人人参与监督的良好氛围。五是要加强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计量检测体系、认证认可和合格评定体系、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和检验检疫体系建设，为保障产品质量安全提供基础保障。六是要加强质量安全综合管理，从宏观上加强产品全过程监管的规划和管理，动员社会力量主动参与提高产品质量安全工作，为全面提升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创造有利的社会环境。

（四）注重实体经济，创新产业质量安全发展模式

打造“质量安全型”经济升级版，不只是宏观经济管理层面的战略思路，更重要的是贯穿于产品、产业和企业的发展过程，要将其变成为经济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内在的、切实的动力。一是要充分汲取发达国家过份追求虚拟经济的教训，着力发展实体经济，避免虚拟经济过度发展使经济泡沫化和呈现出的表面虚假繁荣景象，以免误导经济资源的不当配置。二是在实践中探索提升产业质量安全的有效模式。产业的质量安全发展并非无章可循，而是具有自身的规律性，并在经济实践中形成相对稳定的发展状态，比如结构优化型、资源循环利用型、生态平衡型、产业提升型、政府主导型、企业管理型、品牌效应型等。产业质量模式融汇了产业成长、质量提升与经济发展等因素，表明了产业发展如何更好地满足人类需求的路径和方式。同时，要充分考虑产业质量提升的周期性，按照从低级向高级化不断演进的发展进程来合理安排产业空间和时间上的布局。三是加快构建符合经济质量安全提升要求的现代产业体系。加快构建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以先进制造业为基础、以现代服务业为支撑的布局合理、配套完善、整体竞争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引领产业发展方向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大力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广泛应用先进适用技术、信息技术和先进工艺设备，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增强新产品开发能力和品牌创建能力，坚决淘汰落后产能，加大技术改造力度，优化企业组织结构，促进传统产业的高新化发展。

（五）科学引领发展，改革经济发展绩效考核体系

各级政府在提升经济质量安全中具有组织动员、规划管理、监督检查等功能作用，对政府政绩的正确考察将促进发挥其科学引领作用。GDP 还要继续发挥作用，但需要加以改造和创新。为了克服原有发展模式的缺陷，亟需建立能够反映质量安全需求的 GDP 核算

体系。一方面，要研究制定更加严格的标准，确保 GDP 的质量，保证真实性。GDP 的统计比较复杂，牵涉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环节也多，真实性容易受影响。这就需要制订新的更加严格的统计分析技术标准，以规范统计工作。一是要确保 GDP 不掺水份。避免为了某种目的而弄虚作假和重复计算的现象。二是要挤掉泡沫。要扣除 GDP 中虚拟的成分，真正反映出有效的经济增长。三是要剔除被称作“带血”的 GDP 成份。要体现环境污染和各种事故等造成的损失，要能够分清成本性和成果性经济总量。另一方面，要探索建立与 GDP 互相呼应的质量安全核算体系。尝试研究建立综合指标，反映国民经济发展的质量安全提升状况，建议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产品质量符合需求方面因素。包括产品、工程和服务的需求满足情况。可用国家监督检查的不合格率及损失率来体现，并把启动政府响应的突发事件等因素考虑在内。二是环境质量需求变化方面因素。包括一二三线城市空气质量变化情况、水污染监控情况、土地污染和沙漠化等的监测情况、动植物环境等变化指数。三是生活质量需求变化方面因素。包括就业情况、物价情况、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变化情况等。这些方面因素综合形成质量安全指数，它与 GDP 并行不悖，做到两个量化指标同时公布和使用，更全面、更客观反映经济发展与质量安全提升的成效，有效引导各级政府大力促进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安全水平。

打造“质量安全型”经济升级版，是彰显我国经济整体转型升级的内涵要求，也是针对传统经济增长模式所存在的突出问题和不足之处，着眼于寻找解决实际问题的经济发展思路 and 措施，是对原有经济发展模式的扬弃。加强这一领域探索，对于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而且，对于促进深化改革，探索新形势下的质量安全工作，进一步树立科学发展新理念，进一步凝聚全社会力量，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所裨益。

参考文献：

- 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2013 年 11 月 12 日。
2. 张高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 努力建设美丽中国》，《求是》2013 年第 24 期。
3. 徐明焕：《论质量安全型经济》，中国质检出版社 2013 年第 1 版。

责任编辑：刘英奎

沙漠化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

——各国要协力防治沙漠蔓延

李长久

摘要：沙漠化、荒漠化和土地退化已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大威胁。全球陆地面积的 1/4，即 35.92 亿 hm^2 的土地受到沙漠化的侵蚀；全球荒漠化面积达 3600 万平方公里，并仍以每年 5 万 -7 万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全球超过 20% 的耕地、30% 的森林和 10% 的草原正在退化。联合国有关机构预测，如不采取措施防治“三化”，在 2027 年前，非洲、亚洲和南美洲可能分别减少 2/3、1/2 和 1/5 的耕地，世界 1/3 人口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直接威胁。各国协力防治“三化”不仅让当代人受益，而且为人类永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关键词：沙漠化 荒漠化 植树造林 防沙止漠 国际合作

作者简介：李长久，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沙漠化、荒漠化和土地退化都是全球性危害，特别是“三化”引起的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灾难更是跨国的，需要各国合作、共同应对。各国协力控制沙漠化、荒漠化和土地退化蔓延，保护耕地、森林和草原，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是各国人民的福祉所系，是对子孙后代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三化”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

沙漠化、荒漠化和土地退化已经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大威胁。“三化”侵蚀人

类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直接威胁粮食安全、国家经济、生态甚至政治安全。

沙漠化由来已久，但是，近几十年来，专家、国际机构和各国政府才高度重视沙漠化问题。1949年，法国科学家 A. Aubreville 在研究热带和亚热带森林的稀树草原更替进展过程时，首次使用英文“Desertification”一词。1959年，法国科学家 H. 拉霍鲁（H. lehouerou）采用了 Desertization（沙质沙漠化）一词。1977年，联合国荒漠化大会首次对沙漠化问题进行了系统、科学的分析和总结，明确了沙漠化的定义，即土地的生物潜力降低或破坏，并最终导致类似沙漠的环境。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完成的《21世纪议程》及1994年6月通过的《联合国关于发生严重干旱和/或荒漠化的国家特别是在非洲防治荒漠化的公约》，又对上述定义作了补充，明确指出沙漠化是由于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等因素造成的干旱、半干旱和干燥、半湿润地区的土地退化。目前，全球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10亿人口的生存条件受到沙漠化的严重威胁，全球陆地面积的1/4，即37.25亿hm²以上的土地受到沙漠化的侵蚀，并仍以每年6×10⁶hm²以上的速度蔓延。“沙漠化除导致可以利用的土地面积减少、土地肥力降低，直接造成农牧业严重减产，毁坏各种生活设施和建设工程、污染环境外，还引起饥荒、社会动荡、政治和武装冲突，加重生态不平衡，引起全球气候异常、生物物种减少”。据统计，目前全球已灭绝了280多种哺乳类动物、350多种鸟类和2万多种植物，地球上的生物（动植物）仍以每天灭绝一种的速度消失。

土地荒漠化被认为是“地球的癌症”，是引起生态恶化、阻碍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并造成贫困的重要因素。长期以来的常规工业化、现代化发展，已经导致耕地、草地、林地、湿地、社区，即所有的地理资源受到荒漠化侵蚀。据联合国有关机构统计，全球2/3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程度地受到荒漠化的危害，全球52亿公顷干旱地区中的大约70%已经退化。全球约3600万平方公里土地已经荒漠化，分布在110个国家和地区，受影响人口达到10亿以上，荒漠化仍以每年5万-7万平方公里的速度蔓延。

早在1994年，100多个国家就签署了《国际防治荒漠化公约》，但荒漠化、土地退化继续蔓延。在约190个缔约方中，已有168个缔约方直接或间接受到荒漠化的危害。土地退化指土地的生态系统功能和生产力长期下降。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全球超过20%的耕地、30%的森林和10%的草原正在退化。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研究显示，世界1/3耕地表层土损失速度超过新土通过自然过程形成的速度，因而正在丧失原来的生产力。2013年8月初，在中国内蒙古举行的第四届库布其国际沙漠论坛期间，《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长吕克·尼亚卡贾展示的一张世界荒漠分布图显示，欧亚大陆中部、亚洲中东部、撒哈拉、拉美中部均被涂上象征荒漠的红色。他说：“我们正在失去森林，其中80%都是由于沙漠扩张所致。可耕地的退化率已从1991年的

15%升至现在的 25%。”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主要载体。据中国国土资源部门测算，耕地提供人类 88%的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95%以上的肉、蛋、奶是由耕地提供的产品转化而来的。耕地直接或间接为农民提供 40%–60%的经济收入以及 60%–80%的生活必需品。但是，引人关注的是，全球耕地继续减少。联合国有关机构 2007 年预测，如不及时防治沙漠化、荒漠化和土地退化蔓延，未来 20 年内，非洲、亚洲和南美洲将分别失去 2/3、1/2 和 1/5 的可耕地。

全球耕地不断减少，而全球人口却持续增加。19 世纪初，全球人口达到 10 亿，100 多年后，全球人口增加到 20 亿。此后全球人口增速加快，由 20 亿到 30 亿历时 30 多年，由 30 亿到 40 亿仅用 17 年，由 40 亿到 50 亿只用 13 年，由 50 亿到 1999 年的 60 亿仅历时 12 年。联合国人口基金会预测，到 2050 年全球人口将从 2012 年底的 72 亿增加到 90 亿。世界自然基金会 2002 年 7 月发表评估报告指出，1961 年后人类对自然资源的需求相当于地球再生资源的 70%，1999 年已经出现“赤字”。该机构 2012 年 5 月 15 日发表的《地球生命力报告 2012》指出，当前我们的生活方式过度消耗了自然资源，如不改变这一趋势，到 2030 年即使两个地球的资源也不能满足人类需求，到 2050 年我们可能需要第三个地球提供资源。

英国政府首席科学家贝丁顿早在 2009 年就指出，世界粮食储备正处在 50 年来的最低水平，到 2030 年全球粮食产量必须再增加 50%，人类对能源和淡水的需求将分别增加 50%和 30%。因此，有效防止沙漠化、荒漠化、土地退化蔓延，保护耕地、森林、草原和水资源，为不断增加的人口提供必要的农林牧渔等产品，需要各国协力应对。

二、值得借鉴的防治沙漠经验

巴比伦地区在公元前 4000 年左右开始有人定居。巴比伦是上古时代最著名的城市之一，原址现已成为废墟。历史学家们认为，沙漠化、荒漠化是导致具有 6000 年历史的“巴比伦文明”消失的原因之一。

沙漠化、荒漠化的危害是严重和多方面的，而沙漠化、荒漠化和土地退化主要是人为因素造成的。位于北非的撒哈拉地区，1968 年以前 15 年间风调雨顺，人口持续增加，耕地从南往北推进 100 公里左右。1968 年到 1972 年发生严重干旱，当地损失家畜 350 万头、死亡 10 多万人。1977 年内罗毕联合国荒漠化会议通过了《行动纲领》，企图通过打井灌溉解决荒漠化蔓延问题，但在连续行动 7 年后，撒哈拉地区荒漠化继续蔓延，受害者达 3000 万人，1000 万人沦为生态难民。联合国在 1987 年被迫宣布终止行动方案，承认控制荒漠蔓延的行动失败。

防治沙漠是非常困难的系统工程，迄今在多数国家仍然面临“沙进人退”的严重威

胁。但是，有些国家已经积累和提供了值得借鉴的防治和利用沙漠的宝贵经验。

在 20 世纪 30 年代，由于开垦耕地等因素影响，北美地区爆发了大面积土地荒漠化。1934 年美国发生了历史上最大干旱，沙尘暴由西部地区向四周蔓延，影响到美国 75% 的国土面积，27 个州受到严重影响，1417 万公顷耕地毁坏，4049 万公顷农田的全部或部分表土丧失。加拿大大草原地区的萨斯卡切温、阿尔伯塔、麻尼托巴三省农田约 20% 受到侵蚀，小麦、玉米分别减产 32% 和 50%，20 万个农场破产、30 万人离开大草原地区。由于美、加人口少、经济已经很发达，两国实行“减人减耕还草”，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治理，在减少土壤侵蚀与沙尘暴影响方面取得明显成效，特别是美国在建设防护林方面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

美国农业部针对中西部地区的沙漠化扩展和沙尘暴的频繁发生，成立了水土保持局，开始了土壤风蚀的研究和防治工作。从 1935 年起，美国联邦政府与地方当局和社区通力合作建设防护林带，因倡议者为时任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又称“罗斯福防护林工程”。到 1942 年，一条从加拿大边境向南直达得克萨斯州布拉索斯河的防护林已经成形，总计植树 2.23 亿棵，造林面积近 3 万平方公里，使美国中西部环境大为改观。70 多年来，罗斯福防护林一直是护佑美国中西部发展的“绿翼”。罗斯福防护林之所以能够保持常青，主要得益于美国政府激励政策与机制的持之以恒。多年来，美国政府一直委托一批优秀的专家队伍收集造林资料，对防护林进行评估。负责造林护林工程局成立伊始，就采取技术局长和行政局长双轨领导制，一个负责技术标准，选择树种和造林方式；一个领导野外作业，但对技术问题必须听取前者的意见。在造林和护林机制方面，罗斯福防护林工程采取政府、农户合作造林、养林的模式：联邦政府提供资金、技术咨询和鼠害防治用品，当地农户提供土地，并负责林带的培育、养护。这一机制获得了双赢效果，当地农民生活、收入得到改善；政府则凭借植树项目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

有些国家和地区从实际出发，防治沙漠也取得较好效果和经验。有专家介绍，在印度西部干旱严重的拉贾斯坦州，58% 的土地为流沙地和沙丘。印度政府通过种草植树，改土固沙等措施，目前已治理和固定流沙地 10 万公顷。蒙古国是东半球的“黄色沙暴源”，沙尘影响到中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和地区。蒙古国环境与绿色发展部专家阿迪亚苏介绍，为防治荒漠化，蒙古国依靠矿业收入“反哺环境”。日本和阿尔及利亚的大学计划利用撒哈拉沙漠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阳光和沙子，“培育”太阳能发电站和太阳能电池板工厂。

最值得各国借鉴的是以色列的治沙之道。以色列在短短 60 年间实现了“人进沙退”，创造了人类治沙止漠的奇迹。中国治理荒漠化基金会理事长安成信和以色列等国家的专家总结了以色列防治和利用沙漠的主要经验。

（一）国家主导治理利用沙漠

1947 年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分治决议”规定，以色列面积为 1.4 万平方公里，在 1948 年 5 月至 1949 年 2 月的阿以战争后，以色列实际控制面积为 2.07 万平方公里，人口从 1948 年建国时的 65 万增至 2011 年的 770 万。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熊云武博士和一些专家介绍，以色列境内大部分为山地、高原，近 70% 的土地属于干旱、半干旱地区，50% 的地区降雨量少于 150mm，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农业还很落后。2013 年 8 月初参加第四届库布其国际沙漠论坛的以色列农业系统公司耐特菲姆亚太区总裁艾伦·塔其托说，以色列在建国初期，65% 的土地为荒漠，“整个国土如同被烧焦过”，“如果无法防治荒漠，那就是生死存亡的事情”。

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开国总理本-古里安多次指出，以色列的未来将寄托在这片沙漠上。本-古里安执政期间开始建设向内盖夫沙漠引水的全国工程，鼓励科学工作者致力于海水淡化、太阳能、沙漠植被等研究，号召国民积极参与治沙拓荒。他在 1970 年退出政界后和妻子移居到沙漠深处的斯代博克集体农庄，身体力行参与治理荒漠，直到 3 年后去世。

以色列为在荒漠无人区建设现代生物产业，发展农业，建立起完善、可持续发展的社区组织与社会。60 多年来，以色列政府从政策、财政、信贷等方面向农业倾斜。在政府主导协调下，各部门每年都对农业发展进行宏观规划，引导发展方向，稳步增加农民收入，确保农业良性发展；建立国家合作运动基金和保险，其中包括自然灾害保险基金，专门补偿自然灾害造成的农业损失；重视法制农业，实行依法治地。

（二）依靠广大群众科学防治和利用沙漠

早在以色列建国前，一个基金会组织在世界各地犹太人的资助下，就在该地区一片一片地买地，一棵一棵地种树。该组织成立百余年来，专注于改善自然环境：栽种 2.5 亿棵树，修筑 210 座水库和大坝，兴建 1000 座公园，整理 1 万多平方公里土地。

政府高度重视教育和人才，国家教育经费一直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8% 以上。以色列农民大多数受过高中甚至大专教育，群众文化技术水平大大提高，每万人中有 140 名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比美国的 80 人和日本的 75 人之比还多。据统计，从 1901 年到 2001 年的 100 年间，有 138 位犹太人或具有犹太血统的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占 680 位获奖者的 1/5，而犹太人在世界人口总数中仅占 1/500。全民参与防治荒漠化，科学治沙止漠，这是以色列创造防沙止漠奇迹的强大基础。

政治家、科学工作者和广大群众协力治理荒漠，不仅解决了本国农业安全问题，而且大量出口农产品。以色列的瓜果、蔬菜曾占据欧洲 40% 的市场，被称为“欧洲的冬季厨

房”，“出售地中海阳光”的国家。以色列有效灌溉面积从 1948 年的 3 万 hm^2 扩大到 2009 年的 25.5 万 hm^2 。但是，农业吞噬了以色列水资源的 2/3。由于上游及太巴列湖大量取水，死海年入水量从 20 世纪 60 年代的 13 亿方减至 2009 年的 1.3 亿方，死海水平面年均降低 1 米左右，20 年间下降了 1/3，沿岸出现了 1000 多个车库门大小的“下沉洞”，如不加治理，30 年后死海将成为盐碱沙漠。这是以色列面临的新挑战。

（三）实现了滴灌技术革命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以色列农业生产能力大大提高，但缺水问题依然严重。1964 年在 SimchaBlass 和 Yeshayhu 创新专利技术基础上，成立了专门开发滴灌设备的 Netafim 公司，实现了滴灌技术革命。滴灌技术革命的意义在于：可以节约 1/2 的灌水，单位面积可以增产 1/3 到 5 倍，可以使水分、肥料利用效率高达 95%，最重要的是可以控制沙漠地区土地盐渍化。以色列已占据世界 50% 的滴灌技术市场。

水是荒漠化区农业发展的根本基础，根据《水资源法》规定，以色列所有水资源归国家所有，实行污水处理规模化，通过价格调节鼓励农民使用再生水，以色列北部部分地区再生水用量已占农业用水总量的 90%。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以色列陆续启动海水淡化，开发新的水源。

以色列国土面积的一半以上被炎热、干旱的内盖夫大沙漠所覆盖，但是，以色列却成为“沙漠中种出的绿色国家”。2012 年，以色列人均 GDP 超过 2.5 万美元，居世界第 28 位。

三、中国面临的挑战与应对之策

中国是世界上沙漠化、荒漠化和土地退化严重的国家之一，在防治“三化”、绿化沙漠方面已经取得巨大成效。但是，“三化”在局部地区仍在蔓延，防治“三化”任重道远。我们要采取有效政策和措施，继续防治并向“三化”要耕地，这关系到中华民族生存空间战略大计和生态文明建设。

（一）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

1. 荒漠化面积仍然很大

我国荒漠化面积仍有 260 多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面积的 27%，有 4 亿人常常受到风沙的危害，内蒙古库布其沙漠面积 1.86 万平方公里，起大风时，这里的沙尘一夜就能刮到北京城。荒漠化已经成为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难点问题和制约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突出因素。

2. 土地退化在局部地区仍在蔓延

东北“粮仓”粮食商品率达 70% 以上，是全国最大的商品粮基地。黑土肥力高，素有

“土中之王”的美称。但是，黑土地 1 厘米土壤腐殖质层的形成需要 300 年左右的时间，所以黑土是很难再生的自然资源。根据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统计，吉林省黑土地面积 1650 余万亩，其中耕地面积 1248 万亩，黑土地面积占全国黑土地面积的 20%，是中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关于黑土地退化的一组数据，却令人堪忧：东北黑土地初垦时黑土厚度一般在 60-80 厘米，到 19 世纪 50 年代黑土层减至 60-70 厘米，迄今只剩下 20-30 厘米，而且还在以每年 0.3-1 厘米的速度流失，有些黑土区域已丧失了农业生产能力。吉林省政协委员付诚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吉林省黑土腐殖质层在 20-30 厘米的面积占黑土地总面积的 25%左右，腐殖质层厚度小于 20 厘米的面积占 12%左右，完全丧失腐殖质层的面积占 3%左右。粮食产量主要是化肥给“催”上来的。要想持续增产，解决黑土地的退化问题已迫在眉睫。一些专家指出，如果继续重用轻养，超负荷利用，不采取保护措施，不久的将来或许将会失去这片“美丽的黑色”。

3. 石漠化难以治理

中国是石漠化严重的国家之一，在贵州、云南、广东、广西、湖北、湖南、四川和重庆等 8 个省市自治区都有石漠化地区。其中，贵州省被石漠化的土地面积达 36000 平方公里，占全省土地面积的 20.39%，并以每年 900 平方公里的速度继续扩展；2005 年广西首次石漠化监测数据显示，全区岩溶区土地面积达 1.25 亿亩，占全区土地面积的 35.2%，已经石漠化土地面积 3500 多万亩。在全国确定的 592 个贫困县中，224 个县分布在西南岩溶区的 8 个省市自治区，占全国 34.5%，贫困人口超过 1000 万，占全国贫困人口的一半。从 2008 年启动《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规划大纲》到 2010 年，全国 451 个县总计完成 3.03 万平方公里的石漠化治理，林草植被覆盖提高了 3.8 个百分点，土壤侵蚀减少近 6000 万吨，农民人均收入与 2007 年相比年均增长 10.1%。但是，仍难以控制石漠化面积继续扩大的趋势。

（二）中国取得的成就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党和政府一直重视防治和利用沙漠的工作。1978 年，在财力十分紧张情况下，中国政府决定在西北、华北和东北 13 个省区市构筑一道“绿色长城”，封锁北疆万里风沙，守卫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命脉。这就是世界上建设规模最大的生态工程——三北防护林工程。从东起黑龙江宾县，西抵新疆乌孜别里山口，在 400 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大地上，党和政府率领全国人民投身建设“绿色长城”的伟大事业。

经过 30 多年的艰苦奋斗，三北防护林工程建设取得巨大成效。截至 2012 年，三北防护林工程区已累计完成造林保存面积 2647 万公顷，工程区森林覆盖率由 1977 年的 5.05%提高到 12.4%，三北地区实现了由“沙进人退”向“人进沙退”的重大转变，每年

减少 1400 多平方公里沙化土地，水土流失程度明显减轻，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根据三北防护林工程规划，到 2050 年，三北地区森林覆盖率将提高到 15%，林木蓄积量增至 42.7 亿立方米。

从 1999 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退耕还林工程也取得明显成效。截至 2012 年，全国退耕还林工程共完成造林任务 4.41 亿亩，工程实施 15 年来，中央已投入各项资金 3262 亿元，惠及 3200 多万农户、1.24 亿农民。退耕还林工程相当于再造一个东北、内蒙古固有林区，工程区森林覆盖率平均提高 3 个多百分点。

（三）中国的应对策略

我国防治和利用沙漠已经取得巨大成就，但是，要从根本上封锁北疆万里风沙，变沙漠为绿洲，仍需加强宏观规划，依靠全国各族人民，持之以恒地防治沙漠，建设美丽中国。

1. 各级政府要坚决落实中央宏观规划

2013 年 12 月 18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青海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二期工程规划》，要求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将治理范围从 15.2 万平方公里扩大至 39.5 万平方公里，以保护恢复植被为核心，将自然修复与工程建设相结合，加强草原、森林、荒漠、湿地与河湖生态系统保护和建设，完善生态监测预警预报体系，夯实生态保护和建设的基础，从根本上遏制生态整体退化的趋势，使支撑民族长远发展的“中华水塔”坚固而又丰沛。会议通过的《甘肃省加快转型发展建设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指出，甘肃地处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交汇处，在国家生态建设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要突出水资源节约集约和合理利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人口有序转移，加强生态保护建设与环境综合治理，在主体功能区规划实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方面不断取得突破，构筑西北乃至全国的生态安全屏障。

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实施京津风沙治理工程，对于巩固我国北方防沙带，遏制沙尘危害，至关重要。要进一步推进二期工程实施，继续提高中央造林补助标准，鼓励各类社会主体投资治沙造林。统筹推进防护林更新改造，在河北张家口坝上地区开展试点，强化后期管护责任，确保建成一片、管护一片，严厉打击和查处乱砍、乱垦、乱牧、乱挖及乱用水资源等违法行为，支持地方大力发展沙产业和林下经济，努力实现生态改善，农民增收。

中央关于继续防沙治沙的目标、要求和措施都非常明确，关键在于各级政府要认真落实。

2. 充分依靠广大群众

企业是微观经济的基础，是技术创新的主体，要调动和鼓励更多的企业参与防治沙漠。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亿利资源集团董事长王文彪认为，变荒漠为绿洲，是解决中华民族土地问题的根本出路。20 多年来，亿利资源集团累计投资 20 多亿元，绿化中国第八大沙漠库布其沙漠 4000 多平方公里，在飞鸟难越的库布其沙漠修建了多条纵横交错的穿沙公路，创造性地建成了一道全长 240 多公里的“北方绿色生态屏障”，使昔日赤地千里、黄沙遍野的死亡之海变成了今日生机盎然的绿洲，走出了一条“生态与生计兼顾、治沙与致富并举、绿起来与富起来结合”的多赢之路。在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东南缘，自 2008 年以来，新疆建设兵团仅用 5 年时间就辟出数十万亩“绿色方舟”，创造出一个“绿色奇迹”。

广大农民为防沙治沙做出了巨大贡献。腾格里沙漠南缘的甘肃省古浪县八步沙林场，自 1981 年以来，六位老汉经过 80 年的治理，治沙造林 16.4 万亩，封育 5.2 万亩，总管护面积达 21.6 万亩，把茫茫沙漠变成“看不到边的绿洲”。

3. 鼓励更多的中青年科技工作者参与防治沙漠

越来越多的科技人员参与了防治荒漠化的战斗。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老所长夏训诚已届 78 岁高龄，还 30 次进出罗布泊开展研究，被誉为“罗布泊科考第一人”。同为 78 岁高龄的刘铭庭，发明了肉苁蓉人工种植，创造亩产 2600 斤的全国最高纪录，带动了农民致富。各级政府要采取一些具体政策，创造必要的条件，鼓励更多的中青年科技工作者参与防治沙漠的斗争。

4. 要加强国际合作

一些国家的政治家和学者积极支持或参与中国防治荒漠化的工作。日本“治沙之父”，1984 年已 78 岁高龄的远山正瑛，建立“中国沙漠开发日本协力队”开始在中国治沙，到 1995 年，远山及其他志愿者在库布其沙漠地区种植白杨树 100 万棵。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说：“我们已完成第 26 年的植树造林活动，包括三峡周边一些地区，总种植区域达 28 平方公里。”韩国前驻华大使、UNCCD 大使权内弘从 2000 年起带领中韩志愿者在陕西、内蒙古、甘肃、宁夏植树 2200 万棵，2006 年他带领志愿者致力于在库布其东部植树 100 万棵，阻止沙漠继续东进。

到 2020 年，全国 50%以上可治理的沙化土地得到治理，沙区生态状况进一步改善。为实现这个目标，既需要全国协力奋斗，又要加强国际合作。

2008 年 1 月底在北京举行的防治荒漠化国际会议通过的《防治荒漠化推动可持续发展北京声明》指出，荒漠化是全球问题，严重影响全世界的生态安全、粮食安全、经济社会稳定以及可持续发展。与会各国代表形成的共识之一是，荒漠化是（下转第 78 页）

世界经济进入全球价值链时代 中国对外开放面临新选择

王子先

摘要：联合国贸发会议专题研究成果显示，全球价值链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日益突出，全球生产经营活动日益被纳入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全球生产服务体系；跨国公司是全球价值链的主导者和治理者，控制了全球贸易的 80%。伴随着国际分工从自然分工向垂直一体化和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人类开始进入“全球资源深度整合时代”，通过全球深度整合资源，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成为各国对外开放新潮流、新趋势，创新全球化水平不断提升，开放与合作式创新势在必行。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适应新的产业技术革命和世界经济大调整的要求，跨国公司对其全球价值链进行了局部调整，同时全球价值链也进入一轮快速重塑期，给中国对外开放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过去 30 多年，通过扩大开放，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获得巨大开放红利，未来中国应选择全方位参与全球价值链和实现地位攀升并重的对外开放战略。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 对外开放 资源整合

作者简介：王子先，商务部政策研究室巡视员。

一、全球价值链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日益突出， 对外开放进入全球资源深度整合时代

（一）世界经济进入全球价值链主导时代

联合国贸发会议 2013 年关于全球价值链的专题研究成果显示，全球价值链在世界经

济中的主导地位日益突出，全球生产经营活动被逐步纳入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全球生产服务网络。跨国公司是全球价值链的主导者和治理者，发挥了重要的支配作用，他们通常是通过跨国贸易、投资与外包，推动跨国生产服务网络体系的布局 and 全球延伸。对外贸易是全球价值链布局的重要先导领域，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大约占据全球贸易的 80%，一般其投入和产出品跨境贸易在其海外分支机构、合作伙伴及市场交易对象之间进行。早期全球价值链布局重点是制造业跨国贸易与投资，随着服务全球化及世界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全球价值链逐步由生产制造主导型向服务主导型升级，跨国服务贸易与投资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日益上升，主导作用逐步加强。

（二）国际分工进入全球价值链分工时代

伴随着人类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经济和服务经济时代的转变，国际分工也大致经历了从自然分工到垂直一体化分工，再到全球价值链分工三个阶段。在农业社会，人类过着“刀耕火种”、“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自然生活，间或原始的跨国农产品贸易。进入工业化时代，工业革命大大推动了国际分工与贸易的扩大，贸易业进入大发展时期。但是，这个时代总体上仍采取福特主义的垂直一体化分工模式，所有生产环节都在一个工厂内部完成，包括从设计、制造到销售、回收处理及售后服务的全过程，企业竞争力要通过整体产业链表现出来。进入服务经济时代，服务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国际分工也由此进入全球价值链分工新阶段。继战后制造业逐步走向全球分工之后，价值链中的服务环节也开始分解出去，到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服务环节加速推进全球分工，包括研发、设计、采购、营销、人力资源管理、财务、信息服务等，此时更多的服务节点在全球进行，分工体系全球化，一个全新的跨国生产服务体系基本形成（江小涓，2008）。这也就是说，国际分工进入以服务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阶段。传统意义上以商品贸易为基础的国际分工格局正在被打破。国际分工方式出现革命性变化：一是从过去以跨国贸易、投资为主导，向全球价值链、供应链整合为主导转变，继合同制造之后，服务外包成为日益重要的驱动力量。二是国际分工领域从制造主导向服务主导演进，服务业跨国投资占据跨国投资总存量的 2/3，包括商业存在在内的服务贸易比重大幅提升。三是由单个企业内部分工向整个供应链分工方式递进，产品内和公司内分工与贸易更成为主导方式，国际分工的节点由产业转变为工序、业务流程或生产要素，企业价值增值和竞争力由整个供应链上的整体资源整合能力来决定。

（三）世界贸易与投资是全球价值链跨国延伸与布局的重要渠道

世界贸易是全球价值链形成的先导，跨国直接投资后来居上，跨国服务贸易与外包则成为推动全球价值链拓展与升级的生力军，其他各种形式的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

则成为重要补充，共同推动了全球价值链时代的到来。世界贸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先导作用不可忽视，特别是二战后世界贸易进入增长高速期，一直以两倍于世界产出的速度增长。传统的部门间、产品间贸易，日益被部门内、产品内贸易所取代，颠覆了传统的以民族、国家间贸易为主导的模式；跨国公司高速扩张，进一步推动部门间、产品间贸易向公司内贸易升级，形成了以跨国公司内部贸易为主导的新模式。据统计，世界货物出口量平均增长速度，1913年-1938年仅为0.7%，1948年-1990年为6%以上，1990年-1997年为6.7%；世界出口值占世界GDP比重，20世纪50年代初仅为5%，70年代初为10%，90年代初达到15%，1995年升至20%。1980年-2011年世界货物贸易额平均增长7%，达到18万亿美元。世界贸易从规模到结构，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对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的形式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跨国投资的飞跃式发展，更成为全球价值链延伸的关键动力。据统计，20世纪70年代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每年只有400亿美元，80年代增至1700亿美元，到1998年则超过6000亿美元，90年代以来以高于世界贸易一倍的速度增长，2007年突破2万亿美元，此后有所回落，2012年为13509亿美元。1990年-1997年，世界GDP平均增长3%，而世界直接投资增长12%，几乎比产出高出了三倍，推动了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和全球价值链的加速形成与升级。服务贸易和外包则是后起力量，但正在成为推动全球价值链进一步延伸与重塑的生力军，潜力巨大。由于服务业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服务全球化推动服务可贸易性不断增强，可能使服务贸易规模最终超过货物贸易，成为未来世界贸易的主导。世界服务出口从1万亿美元增至2万亿美元大约用了10年时间，从2万亿美元到3万亿美元只用了4年时间。包括占比约50%的商业存在方式在内，2010年世界服务出口接近75000亿美元，与全球贸易之比达49.2%。

（四）服务外包成为全球价值链分解与优化重组的关键节点

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服务化日益突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价值链向服务化转型已经相当普遍，因为在全球500强中服务类跨国公司超过一半，而其他跨国公司中服务收益也占一半以上。跨国公司“跨国经营指数”显著提升，其中服务类跨国公司从1995年的32%提高至2004年的52%，涉外业务重要性超过本土业务，而同期制造业相对指标仅提高不到5个百分点。IBM是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向服务化转型的典型例子，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重大战略调整，率先实现由IT硬件制造商向IT综合解决方案服务供应商转型。同时，愈来愈多的跨国公司开始把服务作为价值创造及增值的主要来源，纷纷加入向“服务化”转型的队伍。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思维和视野，服务外包从内涵到外延都得到很大拓展，成为全球

价值链分解、优化重组与治理的重要途径。服务、服务外包及其网络是全球价值链的核心环节，服务外包是其中的关键节点；服务外包为全球价值链深度分解提供了可能的前提条件；服务外包是企业优化重组全球价值链的关键选择；服务外包还是更有效整合全球资源、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的战略举措；服务外包网络是跨国公司全球生产服务体系及供应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跨国公司日益成为全球价值链的主导者和治理者

全球价值链总体上由跨国公司主导，特别是以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为主导。跨国公司推动了跨国贸易投资和生产要素转移，不断提升全球资源整合水平和程度，形成了全球价值链的跨国延伸、布局 and 不断升级。以跨境贸易为例，跨国公司投入和产出的跨境贸易在其涉外分支机构、合作伙伴及市场交易对象之间进行，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约占全球贸易的 80%。跨国公司一直是跨国投资的主体，控制了全球跨国直接投资的 80%-90%。跨国公司是战后几次大的产业转移的主导者，特别是新世纪前后，推动了高新技术产业转移与要素重组的新高潮。目前，跨国公司控制了世界生产的 40%，国际贸易的 50%-60%，国际技术贸易的 60%-70%，国际研发的 80% 以上。随着知识经济的蓬勃兴起和新技术革命的推进，跨国公司以抢占高新技术和提升核心能力为目的的企业并购，掀起新高潮，成为跨国直接投资的主导形式，占比超过 60%。尤其在全球价值链可拆分和外包程度日益提高的趋势下，跨国公司对全球价值链的掌控与治理变得日益重要，成为跨国公司维持核心竞争力、占领国际竞争制高点的重要选择。以制药业为例，制药业跨国公司通过采用多元化混合治理模式，实现其对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的创新，支持其对价值链进行深度分解和全球资源的战略组合，成为全球价值链的有效治理者。在其他高科技产业和领域，跨国公司一样是全球价值链的掌控者与治理者。

（六）全球资源一体化深度整合成为对外开放新潮流新趋势

价值链从单个民族国家内部向外部延伸，是与经济全球化的总体进程相适应的，全球化推动了国际分工和交换边界的不断拓展，跨国公司价值链也随之向全球延伸，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和聚集优势要素的程度不断提升。经济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也达到了较高水平，人类进入“地球村”时代。特别是到 20 世纪末期，经济全球化延伸到服务全球化这一最高阶段，服务业革命蓬勃发展，全球一体化生产服务体系正式形成，世界经济史上第一个“全球价值链”时代宣告到来。由于服务业革命带来的产业组织驱动器和粘合剂功能，经济全球化的深度、广度空前提高，学者称 3.0 版的全球化时代即将来临，特别是跨国公司全球范围内聚集知识、人才等要素和优化配置资源达到有史以来最高水平，人类开始进入“全球资源深度整合时代”，通过全球深度整合资源，

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成为各国对外开放新潮流、新趋势。就连长期处于边缘化状态的非洲大陆也日益融入世界经济，开始进入经济快速增长期。由于在知识、人才、技术、研发领域，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创新全球化水平不断提升，开放与合作式创新成为新潮流。全球化和信息网络革命推动从技术到产业、管理和商业模式的全方位创新，与全球要素深度整合在一起，构成产业和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最大源泉。当今，国际竞争不再是单个企业之间的竞争，而是整体供应链与价值链之间的竞争，谁拥有全球资源最大整合平台与能力，谁就能赢得天下，积极主动的开放式发展战略成为优先选择。

二、全球价值链时代中国对外开放面临新机遇新挑战

（一）过去 30 多年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获得巨大开放红利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研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与人均 GDP 增长率之间呈现正相关，全球价值链对附加值、就业和收入都有直接影响。参与全球价值链，还是发展中国家构建生产能力、实现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一些发展中国家显著提高了自身在全球价值链的参与水平，提高了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的出口，成功地在全球价值链中获取了更大份额。中国就是其中的成功案例，通过积极有效吸收外资和出口模式的升级，中国得以嵌入价值链中一些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环节，成为世界工厂和全球制造第一大国。过去 30 多年，伴随中国对外开放的扩大，参与全球价值链水平也得到逐步提高，前期货物贸易和吸收外资是主渠道，后期“走出去”、服务贸易、服务外包开始发力，对于中国全方位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推动作用日益凸显，潜力巨大。总之，过去 30 多年通过扩大开放，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获得巨大的开放红利，有效推动了经济增长、就业、税收、结构升级、效率提升、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

（二）全球价值链正加快重塑升级，中国对外开放面临新机遇

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适应新的产业技术革命和世界经济大调整的要求，跨国公司对其全球价值链进行了局部调整，同时全球价值链也进入一轮快速重塑期，给中国对外开放带来新的重要机遇。

1. 全方位嵌入全球价值链，获取新的开放红利。中国现有过度依赖投资和廉价劳动力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潜在增长率日益受到资源生态环境和其他经济社会因素的约束，经济发展内生能力和后劲不足，迫切需要打造新的引擎，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由于在全球价值链下各国产业的关联性、互动性日益增强，使各国经济技术产业乃至管理模式出现全方位变革，一国产业结构实际上成为一个开放系统。作为后发国

家，中国有可能充分利用后发优势，仍然可以通过扩大对外开放，全面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和全球要素重组，获取更大外部利益和外溢效应，更好发挥其综合性引擎作用，收获新一轮对外开放红利，为经济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动力，提升和维持经济潜在增长率，打造以开放促发展新引擎，帮助缓解经济转型期的各种矛盾与压力。

2. 提升全球资源和要素整合水平，打造产业升级 2.0 版。适应世界进入“全球资源深度整合”时代的新形势，抓住全球价值链重塑升级的机遇，全方位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与合作是中国扩大开放的战略选择。通过扩大开放，提高市场准入水平，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将大大提升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深度与广度，提升全球资源深度整合能力，特别是聚集全球优势要素、知识、人才和创新资源的水平，助推整体产业跨越式升级，打造产业升级 2.0 版。

3. 推动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重塑与攀升，提高对外开放质量、效益。国际金融危机推动世界经济进入大调整、大重组、大变革时代，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也进入优化重组期。中国面临全球价值链大重塑的有利时机，通过提升与跨国公司的战略合作水平，加快“走出去”和服务外包步伐，中国有可能嵌入一些高端环节，优化全球价值链布局，实现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重塑与攀升，提高对外开放质量、效益，推动经济发展模式向集约化转型，实现中国外贸由大到强的转变。

4. 促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面临资源、环境、劳动力和其他要素瓶颈的约束，中国制造业逐步告别低成本时代，面临巨大转型升级挑战。全方位参与全球价值链，将成为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的重要推手：一是扩大技术知识密集型商品及服务进口，提升制造业配套服务质量与效率，缓解成本压力；二是通过大力发展离岸和在岸服务外包，帮助中国 4000 万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实现向“小而专精深”转变；三是引导制造业龙头企业重构业务管理流程，重塑核心竞争力，培育自己的跨国公司和知名品牌；四是通过跨国贸易投资的竞争和示范带动效应，帮助制造业企业加快从技术到管理和商业模式的全方位创新，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五是通过双向贸易、投资与外包，聚集全球优势要素，促进中国“6+1”整体产业链的优化重组，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制造在国际产业价值链的低端位置；六是促进产业集聚和中心城市空间集聚，延伸香港“前店后厂”模式，加快制造业梯度转移，优化区域产业布局与分工。

5. 强化对外开放特别是服务贸易创新溢出效应，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过去 30 多年，中国以开放促创新取得了重大成效，未来仍然是推动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的重要动力，特别是服务贸易比货物贸易的技术与创新溢出渠道更为多样化，应该成为重中之重。一是直接通过技术贸易进口途径，提高服务进口国的技术水平；二是通过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如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利和商标许可等，产生技术溢出效应；三是通过聘请

国外服务技术专家参与本国研究与攻关，提高本国技术开发能力；四是通过服务业跨国投资产生技术溢出效应，包括通过跨国公司跨国投资中的前后向联系，对当地服务供应商或销售商产生关联影响，通过外资企业的竞争与示范效应产生技术溢出，通过内外资企业之间的人员流动产生技术溢出效应；五是通过服务出口，参与国际竞争，带来技术进步与创新的动力与示范效应；六是通过广泛的国际服务贸易交流与合作，引进先进经营理念、管理方法和商业模式，形成学习、模仿、再创新效应，推动本国软技术和思维理念的全面创新，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6. 创造国际竞争新优势，提升国际话语权。中国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关键在于一些高端生产性服务环节严重滞后，各类企业“大而全”、“小而全”，自我服务现象比较普遍。致使生产性服务低质化与制成品结构同构化形成不良循环，导致核心竞争力低下，产业升级受阻，过度依赖中间商，缺少自主知识产权和品牌，国际市场话语权、定价权低下。全方位推进以服务业为重点的新一轮对外开放，有利于中国提高全球资源配置深度、广度，并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一些高端环节，推动全球价值链重塑，逐步实现中国在全球价值链“链”和“点”上地位的攀升，形成和强化基于服务端的国际竞争新优势，同时也通过对全球价值链、供应链的优化布局，逐步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话语权、定价权和影响力。

（三）全球价值链下中国对外开放面临新挑战

联合国贸发会议认为，由于全球价值链由跨国公司主导，参与全球价值链也存在风险：如果一国从全球价值链中只能获取较少份额的增值，那么其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就有限；如果外溢效应过低，全球价值链也不一定能够带来技术转移和进步，特别是如果仅选择简单跟随型模式，某些国家会陷入在低附加值领域被低端锁定；全球价值链流动性强，容易被转移和替代，也可能加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外部风险；另外，对生态环境和社会的影响也值得关注。

1. 中国总体仍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处于相对被动地位。虽然随着中国吸收外资和整体开放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中国已成为诸多行业全球价值链的重要一环。但总的看，中国企业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更多仍限于对跨国公司价值链的参与和适应，较多地集中于全球价值链低端和低附加值环节，即仍处于微笑曲线的中部和底部。这制约了中国对外开放质量和效益的进一步提升，限制了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积极作用，不利于稳步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2. 中国也面临简单跟随式发展陷阱。虽然总的看，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是实现长期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但也有少数国家采用简单跟随式发展模式，一定程度上出

现了产业低端锁定，部分产业长期被用于低附加值领域而无法升级，某些中等收入国家因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还出现倒退。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内外部经济不均衡的矛盾加深，资源生态环境和社会制约加大，如果不把参与全球价值链与培育自身区域和产业价值链相结合，培育经济内生发展和创新能力，优化营商环境，推进公平竞争，就无法提升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溢出效应和开放红利，甚至局部地区陷入简单跟随式发展陷阱，一些产业领域被低端锁定，无法随着内外部形势变化而不断升级，最终只能被淘汰。

3. 全球价值链加快重组升级与全球新的产业技术革命，可能给中国带来双重挑战。为了适应危机后的新形势，全球价值链进入新的大调整、大重塑周期。同时，全球还在酝酿新的产业技术革命，发达国家推进“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流，将推动全球价值链的进一步调整与升级。这将给中国带来双重挑战，加快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势在必行。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必须适应全球价值链大调整和新的产业技术革命的新形势，实行全方位参与和地位攀升并重，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促创新，实现对外开放新跨越，创造对外开放新优势，收获对外开放新红利，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优势与主动。

三、中国全方位参与全球价值链推进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选择

（一）抓住战略机遇，继续积极主动参与全球价值链

未来世界经济仍然处于调整恢复期，中国应该紧紧抓住世界经济大重组、新产业技术革命稳步推进、全球资源深度整合及全球价值链大重塑等多重机遇，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继续全方位嵌入全球价值链，努力获取最大的开放红利和外溢效应，为中国发展、改革和创新注入新的强大动力。不能因为外部危机导致局部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遇到一些障碍，就改变对全球范围内对外开放大趋势的判断；经济全球化仍在继续推进，全球价值链仍在拓展和延伸，全球资源深度整合水平在继续提高，3.0 版的全球化将如期而至。中国必须吸取过去的成功经验，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不动摇，将全方位参与全球价值链，作为下一阶段开放型经济建设的战略重点，显著提升全球资源整合能力，创造国际竞争新优势。

（二）坚持实施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推动以服务业为主导的新一轮开放

当前服务业革命方兴未艾，制造服务化、服务知识化进一步推动世界产业结构的大融合。中国完全可以凭借后发优势，实现产业结构的开放式跨越，即通过服务业开放与双向服务外包更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吸纳全球优势要素，提升全球资源整合能力，加快向服务经济转型步伐，提高本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竞争力。中国应该坚持实施

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将服务业作为新一轮开放的战略重点，扩大服务业市场准入，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加快实现服务业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大力发展服务双向外包，以便更大程度上嵌入以服务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特别是中国有优势和潜力的微笑曲线高端环节，为服务业和整体产业升级提供最大动力和国际化支撑。

（三）积极主动参与全球价值链重塑，推动中国地位攀升

中国必须将参与服务业全球化作为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核心内容，并置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战略高度认真对待，切实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路径。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建议，中国应该建立属于自己的全球价值链网络和全球生产服务体系，形成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优势，推动国内产业升级。

（四）建立自己的全球价值链体系，大幅提升“走出去”水平

为了改变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中低端位置，中国一方面应大力提高吸收外资质量，将外资更多列入先进制造业和知识性服务业；更为关键的是，尽快调整对外投资战略，实施基于建立自己的全球价值链体系的“走出去”战略，目的是由参与全球价值链转向建立自己的区域及全球价值链，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优势，在推动国内产业升级中发挥关键驱动作用。这一战略要求以集群式投资，而非以往分散的点式对外投资，推动中国制造企业通过投资、贸易以及非股权模式（如合同生产等），将产业链延伸到海外，建立自己的区域和全球产业链。在全球范围内最有效利用和配置资源，逐步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主导+全球制造”转变。同时，不断提升服务业对外投资合作水平，使“中国服务”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并逐步提高地位和水平。

（五）加快外贸转型步伐，大力发展服务贸易

中国外贸面临大而不强、质量效益和贸易增值水平有待提升以及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发展不协调等问题，加上内外部环境约束和成本压力加大，亟待加快转型升级步伐。一是继续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推动从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让更多企业逐步走上差异化竞争之路；二是支持高科技产品出口，提高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带来更多贸易增值和福利；三是支持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产品出口，提升外贸企业在研发设计和市场营销等高端环节的位置，显著改善中国出口商品的定价权和影响力；四是有序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实现中国加工贸易在全球价值链上地位的稳步攀升，推动内容与形式的协调创新；五是大力发展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将供应链公司培养成促进外贸转型的重要抓手，全力推进各类外贸主体升级；六是加快研究制定基于全球价值链的服务

贸易战略，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予以高度重视，充分发挥其作为综合性引擎和产业组织驱动器的作用，像货物贸易曾经是整体改革开放的先锋和动力一样，让服务贸易发展与开放，在国家新一轮改革开放中继续发挥引领作用，为打造中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版做出重要贡献；七是把服务外包置于中国产业开放式升级战略的核心位置，突出“离岸与在岸”、“接包与外包”并重的“大外包”战略，将“双向服务外包”作为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解与重塑的重要渠道，加快服务外包业“走出去”步伐，使之成为推动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利器，同时实现服务外包与培育本土专业化服务运营商的有机结合。

（六）以打造全球资源深度整合平台为抓手，推动中国企业产业全方位升级

伴随着世界经济向服务经济和知识经济转型，全球第三方供应链革命应运而生，供应链管理由自我服务向专业化、精细化的第三方服务供应商转型。香港利丰集团和美国的专业供应链公司是先导。同时，跨国公司由制造业主导向服务主导转型，IBM 转型为 IT 解决方案服务供应商，其供应链体系也随之向混合化转型，既提供自我服务，更愈来愈多地为第三方提供服务，实现了向混合化物流供应链和服务外包平台的转型，也成为实现全球资源深度整合的高端平台。与此相关，全球价值链由“生产者驱动”向“购买者驱动”转型，一些大型零售品牌商和供应链管理者，凭借他们的品牌优势、对销售渠道的控制以及供应链服务平台，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日益重要的地位。第三方供应链及相关的服务外包网络和流通综合服务企业，日益成为实现全球资源整合的高端平台，帮助上下游供应商优化业务管理流程、分离非核心业务、提升核心竞争力，成为推动企业和产业升级的利器。通过建立以供应链公司为主导的购买者驱动型价值链，还有利于整合国内市场，强化对国内销售渠道的主导权；可以通过渠道交换等手段进入国外销售市场，为生产制造企业开辟通往国外中高端市场的大通道，改变过度依赖国外多层次中间商的局面。所以，必须抓紧打造自己的第三方供应链及相关专业化平台，显著提升中国企业全球资源整合能力，推动各类企业、产业加快转型升级。

（七）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提升在整体价值链上的竞争力

加快实现向竞争优势导向战略转变，在继续利用过去规模、成本优势基础上，更加注重培育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国际竞争新优势：一是加强外向型企业创新能力建设，推动企业走创新驱动之路，鼓励企业通过全方位创新，创造新的核心竞争优势；二是加快产业升级，培育自有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提高产业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培育中国高附加值产品的国际竞争优势，提升中国产品的定价权和国际影响力；三是加快从过度依赖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向发挥综合人力资源优势转变，注重培养基于大规模高端专业化人才的国际竞争新优势；四是加快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服务”升级，鼓励发展各类综合性

服务平台，支持发展第三方供应链和跨境电商平台，大力提升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服务端的竞争优势；五是显著提高在国内国际市场上的产业和区域集聚水平，增强全球资源整合能力，以链代点，培育中国产业在整体产业链和价值链“链”上的竞争优势；六是加快各类市场主体的转型升级步伐，全面优化重组业务管理流程，在优化自身价值链基础上，逐步构建自己的全球价值链网络，专注核心业务，培育核心竞争力，提升国际化水平，将其中有实力的企业培育成为国际一流的跨国公司。

（八）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治理，提高中国国际话语权

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也带来了利益的不平衡，亟需加强全球治理。一方面，我们要与世界各国一道，推动国际经贸规则完善，改善全球经济治理，加强跨国公司社会责任建设。另一方面，我们更要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重塑，并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一些高端环节，逐步实现中国在全球价值链“链”和“点”上地位的攀升，形成和强化基于服务端的国际竞争新优势，推动中国制造与中国服务的良性互动，在全球制造向服务革命中抢占新的制高点；同时也通过对全球价值链、供应链的优化布局，形成与多国互利共赢的新型国际合作模式，共同推动全球价值链治理与国际经贸规则改善，逐步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话语权、定价权和影响力，促进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

（九）构建国内价值链，实现国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的高效对接

建立自己强大的全球价值链，需要高效的国内价值链和流通服务体系支撑，同样，国内价值链体系的建设也离不开全球价值链，两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必须实现高效对接。目前条件下，构建国内价值链体系有几方面目的：一是实现与全球价值链高效对接，为中国实现自己的全球价值链战略提供支撑和基础条件；二是促进国内区域经贸协调发展；三是加快结构调整，实现国内产业升级；四是更好实现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结合，实现良性互动。由于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要素禀赋差距十分巨大，应结合实际，构建各地区的区域价值链。东部地区中低端制造业已经饱和，应更多地跻身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在此基础上，实现新的产业集聚和城市空间集聚，形成自己的区域价值链网络。中西部地区为了完成产业升级、缩小地区差距和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等多重任务，必须发挥后发地区的比较优势，包括中国作为全球最大代工平台所积累的优势，构建以本土企业为主导和立足国内市场的国内价值链。

责任编辑：李蕊

双边投资协定：加强中美经济关系之道

丹尼尔·普莱斯 迈克尔·斯马特

摘要：中美两国经济来往密切，但因为种种政治问题，关系仍不稳定。双边投资协定的成功签署可以让中美经济关系少一些争端，多一些发展潜力。

关键词：中美关系 双边投资协定 市场准入

作者简介：丹尼尔·普莱斯，国际经济政策顾问公司董事总经理；
迈克尔·斯马特，国际经济政策顾问公司副总裁。

一、中美经济关系密不可分但仍不稳定

中美两国的经济命运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现在更是如此。在过去 10 年，双边贸易增长了 5 倍，现已超过 5000 亿美元。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中国已经超过墨西哥，成为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截至 2011 年末，美国在中国总投资为 540 亿美元，而在过去 5 年中，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大约增长了 6 倍，现已超过 230 亿美元^①。两国贸易和投资数额巨大并不断增长，这说明两国的经济具有相互依赖性和互补性。

^①荣鼎咨询集团（Rhodium Group）：《中国对美直接投资》，2013 年 6 月，<http://rhg.com/interactive/china-investment-monitor>。

但这一事实本身还不足以支撑稳定、全面的双边经济关系。中美经济关系积极的一面常常会被一些具有争议性的问题所掩盖。中美之间贸易争端频发，包括可再生能源补贴和出口限制诉讼，知识产权纠纷，以及“双反”措施等等。在投资层面，双方也互相指责对方的经济对外国投资不够开放。更重要的是，经济网络间谍行为这一复杂和高度政治化的分歧如果不能解决，会阻碍所有谈判的进展。

尽管中美关系良好会带来诸多好处，但这一关系目前的发展还不够充分和平衡，在政治上依然十分脆弱。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美两国缺乏不断深化并改善两国经济关系的积极和前瞻性贸易与投资谈判议程。相反，双方都在进行区域性布局，各行其政并将对方排除在外。例如，有些中国分析师认为，美国正在谈判的跨太平洋合作关系（TPP）是“遏制”中国在亚太区发挥经济影响力的举措。另一方面，中国关注的重点仍然是亚洲区域安排，并将美国排除在外。这些安排主要包括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潜在的中日韩三边自由贸易谈判和东盟 10+3 框架下的其它经济讨论。

当然，中美两国可以自由选择谈判伙伴，并行使世贸组织（WTO）的权利来应对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毫无疑问，近年来美国对中国贸易行为的合理担忧正在加剧。但是，两国必须寻找贸易和投资互惠的领域，积极的谈判议程应该以此为目的。这类合作不仅能为中美两国的农民、工人、牧民和企业创造机会，而且还能建立双方互信，从双边关系的各个方面获得实际利益。两国政府必须制定 21 世纪的经济议程，让双方能够确立政策，签署协议，从而重新巩固中美两国的经济关系，并通过强化关系为全球经济带来利益。双边投资协定（BIT）既是 21 世纪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合理的起点。

二、推动中美双边投资协定

双边投资协定是为双边经济关系注入新活力的最佳起点。中美自由贸易协议（FTA）虽然比双边投资协定更加全面，但目前双方分歧太大，无法成功地完成这一协议的谈判。世贸组织显然是增进中美协调与合作的另一个平台，但只要多哈回合谈判处于僵持状态，其前途也非常堪忧。双边对话，尤其是由美国国务卿和财长以及中国副总理和国务委员主持的战略与经济对话将发挥重要作用，包括加强工作关系、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并消除对具体行业的担忧。但是，双边对话并不能取代具有法律约束性和涵盖整体经济的协定。

相比之下，双边投资协定可以为制定积极的经济新议程打下坚实的基础。协定能为两国提供谈判机会，并对两国投资者及投资待遇问题设定共同标准。这是一个法律工具，可以为两国投资者降低政治、法律和监管风险，从而鼓励更多的跨境投资。此外，它在进一步为美国投资打开中国市场的同时，还能倒逼中国实行国内改革。协定的成功

签署可以让中美经济关系少一些争端，多一些发展潜力。协定还能成为两国以规则为基础，在经济政策问题上合作的样板。

除了加强双边合作，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和签署还能让中美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制定全球投资规则。目前，有多项谈判正在制定新型贸易与投资规则，包括跨大西洋贸易投资合作伙伴关系、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如果中美两国能够成功签署协定，就可以与其它主要国家一起，引领 21 世纪的投资标准。

三、双边投资协定的基本要素

双边投资协定，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开放、透明度和法治。目前，全球有 3000 多个生效的双边投资协定，既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签订的协定，也有发展中国家之间签订的协定。这些协定通常会保证以一视同仁的态度对待投资者，也就是说，东道国不能偏袒国内投资者而损害外国投资者的利益。这个义务适用于所有与外国投资相关的政府行动，包括发放营业牌照、法律法规的执行，以及对商品和服务营销的审批等。如果东道国并没有给予外国投资者同等优惠待遇，则会违反非歧视义务。

双边投资协定通常还会给予外国投资者按市场汇率将资金随时汇入和汇出东道国的权利。这个义务涵盖了所有与投资相关的汇款，包括利息、清算收益、汇出利润以及首次投资后的追加注资。这类协定禁止扭曲贸易的做法，例如当地成分要求，即要求投资者在制造商品或提供服务的时候使用国内零部件或供应商，以及要求投资者出口本地生产商品的出口配额措施。

双边投资协定包含一系列以国际法为基础的保护条款，可以保护投资者免受不公平或武断的待遇，并要求任何资产没收或国有化行为必须按照公平的市场价值给予赔偿。

最后，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双边投资协定允许投资者在独立的仲裁法庭就违反协定的行为提起诉讼并寻求赔偿。允许投资者有效地寻求国际仲裁，可以避免将投资争端政治化，并保证投资争端不会自动导致两国法律和政治关系紧张。政府以往在给予仲裁裁决方面做得不错，如有必要，可以由《联合国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 136 个签约国中的任何一个国家来强制执行。

四、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实践

当中美两国在上世纪 80 年代就双边投资协定首次展开对话时，中国从原则上拒绝接受国际法标准以及这类协定中常规的争端解决条款。中国与其它国家早期签订的双边投

资协定，在这些问题上比较模棱两可。例如，中国要求当地法院而不是国际法庭就是否发生了资产没收行为做出裁决。只有中国的法院可以决定案件是否要提交仲裁法庭，以评估损失和赔偿金额。

但是，近年来，为了保护中国日益增长的海外投资，中国在理论上不再反对这些核心条款，并与德国、荷兰、日本、韩国、新西兰、加拿大和秘鲁等多个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协定或自由贸易协议，其中包括了所有双边投资协定的标准保护条款，并允许通过投资者与国家之间的仲裁，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仲裁来强制执行所有条款。

但是，即使中国的双边投资协定实践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向国际标准和美国实践靠拢，中美双方在一项重要义务上仍然持有不同观点。与很多其它国家的协定不同，美国的双边投资协定不仅在投资后保护投资者利益，还保证投资者最初具有投资权利。具体来说，协定要求在投资的条件和条款方面，必须给予美国投资者和任何国内投资者或第三国投资者一视同仁的待遇，例如企业形式（股份公司、分公司、合伙制）、在企业中的股权比例（少数权益或多数权益）以及可以投资的行业。换句话说，美国的双边投资协定为消费者提供了有效的市场准入，即政府不能对美国投资者提出比对国内投资者或第三国投资者更多的限制或条件。

这一所谓的“市场准入”义务，让中国陷入了两难境地，因为中国禁止或限制外资进入某些行业，要求外国投资者与中国企业合资（中资占多数股或少数股），或以其它方式限制投资方式、行业或对象。例如，中国要求美国投资者必须与中国企业合资生产生物燃料、汽车、民用飞机和发电设备。因此，在截至目前的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中，中国拒绝承担任何形式的“市场准入”义务，以便在投资审批上保持完全的自由度，并坚持所有对投资者加以限制的现行规则 and 规定仍然适用（祖父条款），但并没有做出具体说明。

但是，如果认为美国的双边投资协定要求中国立即取消所有对美国或其它外国投资者的歧视性限制，那么这种想法其实是夸大了双方的潜在分歧。美国在谈判双边投资协定和自由贸易协议的时候，通常会考虑对方提出的“市场准入”限制，但会要求对方明确界定该义务在哪些措施、行业或活动受到限制，并允许对方在界定的范围内保留歧视美国投资者的权利。

在中美双边投资协定中包含“市场准入”义务，但允许某些具体限制的存在可以带来很多好处：第一，可以为哪些行业对美国投资开放提供透明度和法律确定性；第二，可以为目前的市场准入水平设定“下限”，防止中国在未来对行业实行额外的限制；第三，可以在谈判期间创造机会，让中国考虑并让双方协商是否可以取消一部分现有的限制。

五、双边投资协定的好处

虽然市场准入问题目前是一个障碍，但凭借双方的创造力和共同努力，肯定可以找到解决方案。而且有理由相信，中国可能会重新考虑其立场。例如，中国正在将部分审批外国投资的权力从中央政府下放给地方政府，而且正在从审批制转向简单的备案制；近几个月，中国政府放松了外资进入中国资本市场的限制，并示意有可能进一步开放市场。这些新动向再加上中国对与美国谈判协定的兴趣高涨，都显示出中国可能已经做好了准备，在与美国的协定对话中探讨市场准入和投资保护问题。

（一）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的好处

1. 中国政府可以利用与美国的双边投资协定以及更长期的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来推动国内改革，减少国内经济的扭曲，对所有投资者开放市场和提高透明度，并让所有企业更自由地竞争，包括中国的民营企业。通过增加中美之间的跨境投资并拓宽投资范围，双边投资协定可以帮助中国实现经济结构转型，从过度依赖固定资产投资转向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驱动的增长模式。为了成功实现转型，中国必须向价值链高端的创新行业转移，给普通员工支付更高工资，并促使他们更多消费。如果更多的中国企业能够接触美国企业，并学习这些企业的高级管理经验及技术，这一转型过程就能更早完成。

2. 通过提供跨境资金流动和投资的便利，双边投资协定可以帮助中国经济向民营企业倾斜。投资民营企业的资金池增加，可以帮助它们进行创新并提高效率。资本的增加对中小企业尤其有利，因为它们很难获得贷款，因此不得不依赖民间借贷市场。加快民营企业的增长可以让更多的中国公民创造财富，并促进民企与国企的良性竞争，提升民企的效率和活力。

3. 双边投资协定可以使中国与美国的投资关系建立在稳固的协定基础上。这不仅可以消除政治风向对中国在美国投资态度造成的不确定性，而且还可以使美国企业更放心地在中国投资，尤其是考虑到美国投资者对中国自主创新、网络盗窃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担忧让他们变得更加谨慎的现实。

（二）双边投资协定对美国的好处

1. 双边投资协定可以让美国企业与中国企业的竞争环境更加公平，并阻止中国用监管规定偏袒中国企业，无论是民企还是国企。更重要的是，非歧视义务可以阻止中国政府给予中国企业美国投资者不能享受的特殊待遇。实际上，非歧视义务可以消除在中国开展业务的美国企业最持久和最普遍的担忧。根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BC）的资料，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面对的 10 大挑战中，对中国企业（包括民企和国企）的偏袒

就占了 5 个：牌照的行政审批、与中国企业的竞争、法律和政策的选择性执法、投资限制以及标准和合规评估程序。^① 双边投资协定可以防止中国政府在这些领域或任何其它监管领域，采取歧视美国投资者的措施。双边投资协定还可以终止目前作为批准投资或享受当地优惠政策的条件，而对美国企业提出的一些要求，例如向中国企业转让技术或使用中国技术。双边投资协定还可以消除另一个重要的竞争担忧：即中国的国企利用政府的权力，推动自身的商业利益或使美国企业处于不利地位。有时候，中国政府会将权力下放给一家国企，让其监管其所属行业。在这种情况下，协定的规则对政府和国企的行为具有同等约束力。例如，如果一家国企有权发放营业牌照、制定监管法规或建立产品标准，那么该国企的这些活动也要受协定的规则约束，包括要求非歧视待遇、公平和公正待遇，以及在没收资产的情况下赔偿美国投资者。

2. 美国企业将广泛受益于中国市场开放，并在美国和其它发达国家经济低迷的时候从中国获得更多收入。对美国工人来说，提高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的投资能力可以创造而不是消灭美国的就业机会。学术研究已经反复证明，美国跨国公司的附属公司在海外的扩张，会保护和支持而不是破坏美国母公司的就业。如果附属公司的扩张能够服务于新客户，就能在美国创造更多就业，而这正是很多在华美国跨国公司的主要目标。2009 年，美国企业在华制造业附属公司将产出的 2/3 销售给当地顾客，而不是全球市场。实际上，这些中国附属公司销往美国的份额从 1999 年的 16.3% 下降至 2009 年的 10.2%。最根本的一点，美国企业需要在中国和其它外国市场投资，以便更好地在全球市场上竞争。而双边投资协定可以帮助美国企业降低与这些投资相关的政治、法律和监管风险。尤其是在中国，如果协定一再拖延下去，美国企业将无法与已经享受协定保护的英国、荷兰、韩国和日本企业公平竞争。

六、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协调经济利益

双边投资协定可以促进更加强劲的投资流动，这不仅能使中美两国受益，还能协调两国长期经济利益。中国肉类生产商双汇收购美国猪肉公司史密斯菲尔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中国而言，该收购不仅能够增加安全、优质产品的供应，以满足中国消费者日益上升的需求，而且可以获得美国的技术和专业能力，提高中国的农业生产率和食品安全。对美国而言，作为一个新的利益相关方，一家由中国控制并对中国出口的大公司可以发挥影响力，降低中国市场准入的门槛，例如取消对美国农产品贸易的限制。从

^①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员调查，www.uschina.org/info/members-survey/2012/pdfs/uscbc-2012-member-survey-results.pdf。

更广泛的意义上看，这类投资可以让中国分享美国经济增长，而不是一味地投资低收益率的美国国债（有着加剧经济失衡的负面效果），从而导致汇率失衡，甚至采取限制双边贸易措施。

中美两国贸易和投资浪潮浩浩荡荡，为太平洋两岸带来了巨大利益。现在中国新一届政府领导已经尘埃落定，中美两国应当更加精神抖擞地重返谈判桌。成功签署双边投资协定，将重新设定中美两国 21 世纪双边经济关系，将投资关系提升到国际层面，推动中国经济改革，并帮助美国企业在世界上最重要的市场取得成功。成功签署双边投资协定，还能显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有能力达成以规则为基础，并让全球经济受益的均衡协议。

责任编辑：李 蕊

（上接第 60 页）

历史性和全球性生态问题，防治荒漠化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责任和义务。国际社会应积极推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缔约方切实履行公约义务，在能力建设、资金安排和技术转让等方面采取实际行动。在 2013 年 6 月举行中韩首脑峰会时，韩国总统朴槿惠表示，“与中国荒漠化做斗争也是中韩良好合作的实例，我非常鼓励我们的年轻人自愿参与这个利在千秋的工程”。同年 8 月初举行的第四届库布其国际沙漠论坛期间，与会专家们呼吁要加强国际合作。

加强沙漠化、荒漠化和土地退化防治经验交流与合作，守护绿水青山，留住蓝天白云，是各国人民福祉所系，是对子孙后代义不容辞的责任，不仅让当代人受益，而且为人类永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 李祥余等：《沙漠化问题研究综述》，《干旱气象》第 23 卷第 4 期，2005 年 12 月。
2. 安成信：《荒漠化是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2009 年 12 月 30 日在内蒙古乌兰浩特市举行“第二届国际防治荒漠化科学技术大会”期间发表的文章。
3. 莱斯特·布朗：《2011 年食物大危机》，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网络版）2011 年 1 月 10 日。
4. 徐静：《罗斯福防护林为何常青》，新华每日电讯 2013 年 9 月 23 日。
5. 袁震宇：《沙漠中的绿色国家》，新华每日电讯 2013 年 5 月 8 日。
6. 祝大伟：《不堪重负的黑土地》，《人民日报》2013 年 8 月 25 日。

责任编辑：刘英奎

自由贸易园区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沈家文 刘中伟

摘要：自由贸易园区成为承载我国实施全面对外开放和改革攻坚的新平台，在扩大国际贸易规模、便利国际物流运作、实施新经济政策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将影响未来国际经济合作与区域贸易格局。本文比较和分析了国外自由贸易园区的发展经验和我国传统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各类模式，提出立足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整合的客观实际，建设以贸易便利、投资自由、物流畅通、金融开放为核心的自由贸易园区，将是我国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发展方向。借鉴国外自由贸易园区的先进经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完善监督管理体制，发展新时期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由贸易园区。

关键词：自由贸易园区 自由贸易区 战略 政策

作者简介：沈家文，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装备工业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刘中伟，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和产业发展环境在发生深刻变化，欧美经济缓慢复苏，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环境污染治理、土地及劳动力成本上升等诸多挑战。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以开放促改革；加快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整合优化；在推进现有试点基础上，

选择若干具备条件的地方发展自由贸易园（港）区。自由贸易园区成为承载我国实施全面对外开放和改革攻坚的新平台，在扩大国际贸易规模、便利国际物流运作、实施新经济政策等方面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

一、自由贸易园区的概念界定、制度安排和类型定位

作为全球各种类型特殊形式经济区域发展的典型代表，自由贸易园区是促进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的有效工具，也是各国参与国际竞争和分享经济全球化利益的重要平台与机制。

（一）自由贸易园区的概念界定

从理论定义来看，自由贸易园区涉及两种概念定义：一是 GATT 第 24 条第 8 款第 2 项所定义的 Free Trade Area（FTA），即国家间自由贸易区，是根据政府间协议设立的包括协议国（地区）在内的经济体履行其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而形成的跨国区域自由贸易集团。二是在 1973 年的《关于简化和协调海关业务制度的国际公约》（即《京都公约》）中提出的 Free Trade Zone（FTZ）概念，即在一国或地区的境内关外设立的，以优惠税收和海关特殊监管政策为主要手段，以贸易自由化、便利化为主要目的的多功能经济性特区。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FTA 是根据政府间协议设立的，涵盖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所有成员的全部关税领土，而 FTZ 是根据本国法律法规在本国境内特定区域设立的。为避免两者混淆，2008 年我国商务部和海关总署发布《关于规范“自由贸易区”表述的函》（商国际函[2008]15 号），称之为“自由贸易园区”，加上一个“园”字，以此区别于国家之间建立的自由贸易区。

自由贸易园区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境内关外，即只有当外国商品进入所在国海关的管辖区时才按照规定进行纳税，当外国商品进出自由贸易园区时不仅可以少缴、免缴关税，而且还可在园区内进行加工、分类、挑选、销售、改装或长期储存。通过适当放松管制的强度与力度，贸易、物流、关税、金融等方面的政策更加灵活，从而加快货物流动、资金进出以及信息传递。目前，国际上大多数自由贸易园区不仅包括进出口贸易、转口贸易、保管、储存、配送等的基本功能，还拥有商品展示及金融等服务贸易功能。

（二）自由贸易园区的制度安排和主要类型

基于《京都公约》对于自由贸易园区的概念界定，以关税减免和海关手续便利化为基础，追求高度简化、协调统一的海关制度标准已成为自由贸易园区发展的基本制度安排。《京都公约》对于自由贸易园区规定了 18 个标准条款和 3 个建议条款，涉及园区的建立与取消、商品准入与监控、授权、区内商品消费、储存期间、所有者变更、货品移

动、税费补交等作出了明确规定。1988 年至今，我国已陆续接受多章条款和承诺，成为条约签署国成员之一，但总体接受和承诺范围和水平仍然有限，在借鉴国际规则和融合国内标准的海关制度实践中仍有很大开放和提升空间。

此外，在制度安排设计上，自由贸易园区发展的成熟化、功能完善化和开放自由化正成为新的内涵延伸。例如，根据国际自由贸易区的管理惯例，货物进出自由贸易港区实行备案制管理。但在我国现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实践中，仍按报关制执行，影响了货物中转效率。传统海关制度机制设计的深入和有效显然是自由贸易园区建设和发展的重要主题。同时，内外产业联动和结构升级、扩大保税服务范围与功能、新型金融、信息和生活消费等服务业态的创新和开发，也将成为新兴自由贸易园区“超前”和“高水平”建设的新重点。

伴随经济全球化进程深入和国际贸易规模快速扩大，许多国家和地区通过自由贸易园区的建立，逐渐形成其各自贸易发展的重要平台。尽管各国自由贸易园区的角色相近、功能趋同，但在设计定位、运行管理和区域形态等却各有差异，从产业功能划分上可以将自由贸易园区分为七种类型：一是自由港型自由贸易园区，二是保税仓库型自由贸易园区，三是转口集散型自由贸易园区，四是出口加工型自由贸易园区，五是商贸结合型自由贸易园区，六是商业零售型自由贸易园区，七是跨境加工型自由贸易园区。此外，根据专注领域，分为单个领域专业集聚模式和多元化产业领域集聚模式；按照覆盖区域，分为港城融合发展模式、港城分离发展模式、跨境园区模式和主副园区发展模式；按照运营主体，分为中央直属、地方管理、企业运作和跨国共管等形式^①。

二、自由贸易园区的国际经验与政策比较

除自由港型自由贸易园区外，其他园区类型仅在某些涉及国际货物或服务贸易方面赋予了相对自由，大多结合各国或地区的经济状况、政治制度和贸易战略进行了有针对性的侧重，园区形态和运作表现也各不相同^②。

（一）欧洲的枢纽转口型自由贸易园区

欧洲作为自由贸易园区的发源地，汉堡、鹿特丹、安特卫普、香农等西欧沿海主要港口城市和重要空港，利用其优越的航运和地理条件，建立起四通八达的运输网络，将港区打造成为自由港，货物运输辐射欧盟全境，形成了兼具传统物流集散和高效综合服务的枢纽型自由贸易园区形式。以荷兰鹿特丹港和爱尔兰香农自由贸易区为例，其特点

①李志鹏：《中国建设自由贸易园区内涵和发展模式探索》，《国际贸易》2013 年第 7 期。

②陈浪南、童汉飞、谢绵陞：《世界自由贸易区发展模式比较》，《税务研究》2005 年第 8 期。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建立自由贸易园区专责机构和明确的职责。鹿特丹港提高港口效率最重要的举措是设立专责机构。例如，荷兰国际配销委员会（HIDC），通过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以及与其他政府部门相互合作，吸引全球更多的企业到荷兰成立国际配销中心。港口再通过已设立的保税仓库和货物分拨配送中心进行储运和再加工，提高货物的附加值，将货物运往荷兰国内和其他欧洲国家，实现储运销一体化。相比之下，香农自由贸易园区则有政府控股的地区发展公司，统筹香农地区的产业、旅游及乡村，制定园区整体发展规划，开展土地开发、租赁及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并资助和扶植园区企业发展，帮助企业申请国家补助，进行日常管理、维护及处理客户投诉等。

第二，便利化的服务措施和优惠的税收政策。鹿特丹港和香农自由贸易园区均打造了具有弹性的保税仓储、运输与加工电子管理系统，企业只需提供一次信息，海关等相关当局就可实现信息共享，协作办理相关手续。海关在工作日提供 24 小时通关服务，部分货物免除入境报关，必须报关货物可通过先存储后报关，以公司存货账户管理代替海关查验，授权一定符合条件的企业享有更大程度的通关程序减免等。同时，低税率、税收抵免、免税、避免双重征税等税收优惠和就业、研发培训等促进地区发展的补助形式多样，为园区吸引全球投资、提升竞争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第三，主导产业培育和关联产业带动枢纽增长。例如，香农自由贸易园区依靠其独特的空港中转作用，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优化互联互通功能，经过几十年发展，将航空运输、飞机租赁及商用机融资和服务等航空产业打造成支柱产业，并通过高新技术应用的集合促进，带动信息通讯技术业成为爱尔兰的重点产业之一。金融服务、客户服务、供应链管理、物流服务等配套服务也不断拓展升级，为园区内其他产业协调促进发展提供了新动力。同时，鹿特丹史基辅机场经营团队也从基于“城市”而不是“机场”的概念，创造了一个包括从事办公联络、商务洽谈、仓储运输甚至休闲娱乐的场所，使前往园区工作的商务人士便捷感也得到大幅提升，成为吸引国际企业选择鹿特丹作为转口港的重要影响因素。

（二）美国的企业管理型自由贸易园区

美国是全球设立自由贸易园区最多的国家，“对外贸易区”是美国对自由贸易园区的特有称呼。从 1934 年 6 月美国通过《对外贸易区法案》并于 1936 年建立第一个对外贸易区，其目的是为了抵消劳动力和其他成本上升，避免美国企业大量向海外转移，通过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以提升美国产品的贸易竞争力。根据美国 1993 年《对外贸易区法案》的规定，包括外国公司在内的任何公共机构和私人公司，都可以在港口或附近申

请建立、管理和经营一个对外贸易区，该区域是美国境内但不属于美国关税法管辖的特殊区域^①，有主区和分区之分。前者为综合型、多元型区域，后者则多由一个公司进行有特定用途的生产和经营。截止到 2013 年，全美共有 250 多个对外贸易区，遍布美国 50 个州和几乎所有主要港口城市。

美国对外贸易区主要以进出口贸易为主导，兼顾加工制造与装配的商贸模式，通过提供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便利服务，实现免税进园区存放商品，园区内提供商品的加工、装配、销售和展览的场所等功能。就其特点而言，主要体现在管理模式、监管政策和产业促进方面。

第一，美国对外贸易区的管理模式是一种“企业管理”的模式，由国营企业或私营非营利性企业进行管理。申请企业需要获得对外贸易区委员会（FTZB）授权，才能出资建立园区。管理企业要根据法律制定园区规划并监督园区运营，进行公共设施有效维护，并向对外贸易区委员会提交年度报告。同时，管理者要对园区的启用、停用或变更提交书面同意书，授权园区零售或其他商业活动，并对园区违法行为承担相应责任^②。由此，在园区内管理机构可依法放松部分经营和管理权限，最大限度激发企业的积极性。

第二，美国对外贸易区实行“境内关外”的监管政策。一是货物转移关税延迟，即进口货物最终进入美国海关境内，其关税的缴纳可推迟到货物从最后一个对外贸易区进入美国境内时缴纳。二是税率转换，即经对外贸易区委员会同意，管理者可以选择园区生产的最终产品或进口零部件、原料税率中较低的税率，作为产品进入美国境内时应缴纳的税率，从而减少应缴税款^③。三是关税减免和出口退税手续减免，即对园区内进口货物免除部分地方税，并省去出口退税环节手续。四是海关报关手续电子化、一周集中报关制度、直接通关与入园手续减免等便利化措施。

第三，美国对外贸易区对主导产业发展和吸引外资的促进作用。由于对外贸易区对加工原料和中间产品提供税收转换优惠，大量产业链长、规模经济明显的产业和行业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汽车制造和能源加工行业尤为突出。几乎所有全球主要汽车制造商和能源巨头企业均成立了自己的对外贸易分区，对促进产业集群形成、巩固本土企业和扩大对外出口起到重要作用。

①周滢：《我国出口加工区转型升级与对策研究》，上海交通大学 2009 年学位论文。

②根据《美国联邦法规法典》（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15 CFR PART 400）2012 修订版整理。

③崔迪：《从欧美自由贸易园区发展经验看上海建立自由贸易园区研究》，《江苏商论》2013 年第 6 期。

（三）亚太的港城融合型自由贸易园区

港城融合发展的自由贸易园区，也称综合型自由贸易区，主要分布在亚太地区，以中国香港、新加坡为代表。园区包括了整个港口城市，由若干工业区组成，兼具转口贸易、出口加工及金融、商业、旅游等多种功能。园区内允许居民居住、生活、娱乐，并可享受免税进口消费品。这类自由贸易园区的地理位置优越，邻国或地区的经济处于工业化的初期或成形之中，扮演着“联系人”和“窗口”的角色，与周边国家互补开展对外经济贸易，其经济活动和发展目标呈现显著的国际性。

新加坡于 1969 年通过《自由贸易园区法》，授权政府可以根据地区发展需要，在采用“境内关外”的制度前提下，宣布可成为自由贸易园区的地区。目前，新加坡国内共有 7 个自由贸易园区，其中樟宜机场自由贸易区主要负责空运货物，其余 6 个自由贸易园区均负责海运货物。其主要海关便利化和税收优惠措施体现在进口外国的货物，可以暂时免征消费税和关税，并且在海关监管最少的情形下，在区内从事加工、分类、存储、销售以及制造活动。同时，除依据法律设定的自由贸易园区区划外，新加坡整个港口城市兼具出口贸易、转口贸易、商业、金融及旅游等多种功能，名副其实地构成了一个综合性的自由贸易园区，在亚太经济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中介角色。

中国香港在自由贸易园区建设和政策经验上有很多积累和制度安排，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①：一是自由贸易制度。即对进出口贸易不设置管制和关税壁垒，海关手续简便，物流体系流畅。二是企业自由进入及自由经营制度。绝大多数经济领域由投资者自己决策进入经营与否，特区政府只直接经营部分公共事业。新开办企业注册手续简便，缴费低廉，只征收 16% 的公司所得税。无论资金来源为本地还是海外，资产所有形式如何，均享受“平等居民待遇”。三是自由外汇制度。各类外汇形式均可自由进出香港，任何货币都可在香港自由买卖汇兑。四是自由出入境制度，香港特区政府与 86 个外国政府签有免签协定。

（四）自由贸易园区的国际经验与政策比较

由于国情背景、发展战略和自然、社会条件存在差异，国外各种自由贸易园区在现实运作的监管措施、管理体制以及优惠政策等方面各有所长。比较来看，就发展方向、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诉求的实现而言，自由贸易园区的构建原则与运行理念主要在于四个方面。

一是提高贸易和投资便利程度。自由贸易园区的核心思想可概括为“一线放开，二

^①张世坤：《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转型的模式研究》，大连理工大学 2005 年学位论文。

线管住，区内不干预”^①。比较欧美和亚太各类自由贸易园区，准许进口商品自由免税进出口，实施便捷合理的有效监管是其基本功能。赋予自由贸易园区“境内关外”的特殊法律地位，海关的监管方式不同于其他海关管辖区域，对于进出货物的运输、储存、流动和买卖，尽可能简化手续、提高效率，给予最大程度的自由，海关仅在货物离开园区入境时进行严格监管。

二是创新园区管理模式。国外自由贸易园区的管理模式不尽相同，分为国家或地区级的宏观管理体系和园区内的微观组织体系。根据各国园区的发展经验，对于自由贸易园区较多或港城融合型的国家和地区，在立法约束基础上，建立国家级的专门机构进行协调，负责全国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园区事宜。对于自由贸易园区数量较少的国家和地区，可以赋予地方政府进行直接监管。美国的对外贸易区作为“公共设施”进行运营，将政府政策干预限定在立法和契约保障上，允许企业自身涉足自由贸易园区管理，充分调动企业的能动性和积极性，形成创新性的制度设计。

三是扩大园区开放范围。各个国家在为自由贸易园区立法中，普遍推出各类优惠政策和开放措施，吸引国内外投资者，扩大园区影响力，包括税收优惠，即实施不同范围和程度的关税减免和豁免优惠；金融优惠，即允许资金自由流动、提供和放宽进出口贷款补贴等措施；还包括开放国内市场、租用土地加速资本折旧等政策。

四是培育园区优势产业。在各国和地区自由贸易园区实践中，传统上主要围绕海关监管和关税制度自由化，或以便利生产经营活动和货物人员往来为基本业务。但是，产业附加值提高、产业结构优化和竞争力提升，正成为自由贸易园区示范效应和引领作用新的体现。根据国外各类园区的发展经验，凭借各类优越条件吸引国内资本或外资进入，引进高科技和新兴产业形成集聚，形成一国或地区独特的产业特征和可持续发展动力，逐渐成为各国和地区发展自由贸易园区的普遍共识。

三、我国自由贸易园区的发展沿革与转型升级

国务院 2013 年 8 月批准成立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标志着我国在整合以往设立条件、优惠政策和管理体制的基础上，提高服务、投资领域的开放和便利程度，探索贸易、投资、航运和金融服务相结合的新途径，对我国发展自由贸易园区将起到示范作用。此前，我国虽然没有完全意义的自由贸易园区，但已设立 110 多个具有部分自由贸易园区功能的各类海关特殊监管区，为创建我国自由贸易园区的政策制度和完善园区管理体制机制奠定了基础。

^①祁欣、孟文秀：《全球自由贸易园区发展模式及对比分析》，《对外经贸实务》2010 年第 6 期。

（一）传统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主要形态与比较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是一国或地区为实现某些特定目的（如吸引外资、扩大出口、促进贸易、增加就业等）而实行特殊的海关监管制度和政策（关税减免、贸易自由、资金自由、投资优惠等）的特定区域^①。目前，我国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主要形式包括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跨境工业区、保税港区、综合保税区等六类（参见表 1）。截至 2012 年底，我国共在 27 个省市设立 110 个特殊经济区域，包括 12 个保税区、47 个出口加工区、5 个保税物流园区、14 个保税港区、30 个综合保税区，以及 2 个跨境工业区^②。据海关统计，2012 年全国特殊区域共实现进出口总额 6068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29.2%，增幅高出全国 23 个百分点，占全国进出口比重从上年的 12.9% 上升至 15.7%，其中，出口额 2955.3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31.6%；进口额 3112.7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26.9%；出口、进口增幅分别比全国高出 23.7 个和 22.6 个百分点^③。

（二）传统海关特殊监管区域面临转型升级

从基本功能的视角来看，我国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过分依赖保税加工、出口及国际市场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忽视了保税服务、进出口的均衡发展以及内外接轨、实现长期共赢的目标。区内服务的短板限制了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进一步扩展，过度依赖国际市场将导致国内经济结构失衡，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基本功能需要扩展升级。

从运行机制的视角来看，我国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发展还面临区港分离、物流不畅、区内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现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以地方管理为主，“境内关外”原则落实有限。此外，我国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在进出口贸易方面发展较好，但物流和转口贸易功能受地理位置和操作手续的影响，较自由贸易园区仍有一定差距。

从自由度和开放度的视角来看，我国各类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整体自由度和开放度还比较低，有待通过完善的立法约束，确保企业的完全自主权和政府有节制的监管权，并且无论内资外资、经营生产、消费投资都完全由企业自身决定。同时，我国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开放也主要侧重于贸易自由，集中在税收优惠和贸易便利化，对于金融服务开放、货币兑换自由、自主投资企业优惠和人员出入境流动等方面的政策开放度还相对有限^④。

总之，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及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需要，建设以贸易便利、投

①包海兵、匡玲丽：《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向自由贸易园区转型的几点思考》，《世界海运》2012 年第 10 期。

②王俊奎：《综合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园区转型战略研究》，《现代经济信息》2013 年第 6 期。

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网站 2012 年有关数据整理。

④黄智勇：《中国保税港区与自由贸易区发展模式比较研究》，《改革与战略》2012 年第 7 期。

表 1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功能情况比较

类型	功能	实施时间
保税区	海关设置或经海关批准注册、受海关监督和管理,可以较长时间存储商品的特殊监管区域。具有贸易物流、加工制造、商品展示,部分集装箱拆并业务和海铁联运的功能。能够提供免税、保税、离境退税、区内流转免增值税、内销按货物实际状态征税、不实行银行保证金台账制度、实行意愿结汇与核销等优惠政策。	国务院于 1990 年批准建立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成为我国首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出口加工区	为实现利用外资、扩大出口和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目标,专门开辟进行加工制造、生产装配等加工活动的特殊区域。一般只具有加工制造功能。能够提供免税、保税、入区退税、内销按货物实际状态征税、不实行银行保证金台账制度、实行意愿结汇与核销等优惠政策。	国务院于 2000 年批准首批 15 个出口加工区,是我国数量最多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保税物流园区	在保税区内或毗邻的特定港区内设立的专门发展现代国际物流业的海关监管区域。具有口岸装卸运输(专用通道)、贸易物流、商品展示,部分集装箱拆并业务和水水联运功能。能够提供免税、保税、入区退税、区内流转免增值税、内销按货物实际状态征税、不实行银行保证金台账制度、实行意愿结汇与核销等优惠政策。	国务院于 2003 年批准建立上海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作为首个区港联动试点。
保税港区	设立在国家对外开放的口岸港区和与之相连的特定区域内,具有口岸、物流、加工等功能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具有港区合一、贸易物流、加工制造、商品展示,全面的集装箱拆并、中转业务和各类多式联运功能。能够提供免税、保税、入区退税、区内流转免增值税、内销按货物实际状态征税、不实行银行保证金台账制度、实行意愿结汇与核销等优惠政策。	国务院于 2005 年批准建立上海洋山保税港区作为首个港口物流功能和保税区特殊政策结合的保税港区。
综合保税区	设立在内陆地区的具有保税港区功能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具有港区合一(内陆港)、贸易物流、加工制造、商品展示,全面的集装箱拆并、中转业务和部分多式联运功能。能够提供免税、保税、入区退税、区内流转免增值税、内销按货物实际状态征税、不实行银行保证金台账制度、实行意愿结汇与核销等优惠政策。	国务院于 2006 年正式批准设立苏州工业园综合保税区作为国内首个综合保税区。
跨境工业区	设立在边境线上建立的类似保税区的运作形式、海关监管的跨境特殊监管区域。具有港区合一(内陆港)、贸易物流、加工制造、商品展示,部分集装箱拆并、中转业务和部分多式联运功能。能够提供免税、保税、入区退税、区内流转免增值税、内销按货物实际状态征税、不实行银行保证金台账制度、实行意愿结汇与核销等优惠政策。	国务院分别于 2003 年和 2011 年正式批准设立珠海跨境工业区(珠海园区)和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中方配套区)作为跨境工业园区。

资料来源:根据海关总署网站有关信息及有关文献整理。

资自由、物流通畅、金融开放为核心的自由贸易园区,将是我国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转型升级方向。

(三) 我国自由贸易园区的发展趋势

在借鉴国外园区发展经验基础上,统筹我国既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产业联动转型和

升级，培育自由贸易园区优势产业和新型业态，将是我国未来自由贸易园区产业组织实施的重点。以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为例，外高桥港、浦东航空枢纽港和洋山深水港已形成一条长 100 多公里、纵深 10-20 公里的沿海现代产业带，外高桥保税区、洋山保税港区和机场综合保税区始终处于我国对外开放探索的前列。同时，上海兼具我国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地位，就全球自由贸易园区发展条件而言，经济和区位优势独一无二。未来上海在既有“三港三区”融合的基础上，转型升级建设高水平自由贸易园区，既要继承在先进加工制造业、物流业等产业上优势地位，又要围绕上海的“四个中心”建设，创新保税服务等新型业态；既要巩固进出口贸易规模优势，又要加大转口贸易均衡发展；既要借助上海自由贸易园区内外联动的良好发展格局，重点发展航运及配套服务、国际贸易、金融信息等领域，又要探索创新消费、体验等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新型业态。同时，还要鼓励本土企业与跨国公司开展区内合作或经营，推进园区与高校、科研机构的互动联系，为主导产业链拓展、延伸和辐射营造有利环境。

四、我国自由贸易园区建设发展的政策建议

通过比较和分析国外自由贸易园区的发展经验和我国传统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各类模式，立足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整合的客观实际，遵循稳步发展规律，灵活吸收各类发展模式的优点，自由贸易园区的建设发展才能扎实深入有效。借鉴国外自由贸易园区的先进经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完善监督管理体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时期自由贸易园区。

（一）创新自由贸易园区政策法规

自由贸易园区的开放和发展，首先取决于货物进出的自由。推动以贸易自由为核心，实现物流自由、投资自由和金融服务自由，建设高水平自由贸易园区。一是传统海关监管区域尚未实现真正的“境内关外”管理，要大力创新自由贸易园区在口岸监管、人员出入境、通关查验、外汇管理等方面的体制机制，提高监管效能和通关效率。二是积极推动“区港一体化”，拓展和提升既有保税区贸易加工和口岸港口物流功能融合，形成海陆空运输方式无缝对接。三是允许投资者自由开展投资经营活动，建立较区外更加开放的投资经营体制，鼓励各类国内外资本在园区投资设立机构。四是扩大离岸金融中心建设，推动区内企业开设离岸账户、国际贸易结算试点、融资租赁、期货保税交割、保税船舶登记、国际中转集拼、启运港退税等业务开展，准许区内金融机构开发外汇金融衍生服务和区内企业直接到海外上市融资等试点。

（二）完善自由贸易园区管理体制机制

2007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保税港区管理暂行办法》，是我国目前唯一规范传统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全国性法规。国家必须通过立法，明确自由贸易园区的创新

试验的性质、功能和地位,协调海关、边检、海事、工商、税务、外汇、港政和其他行政监管的职责和联动,从而使得园区投资者和业主的权益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园区发展协调可持续。同时,可以借鉴国外园区发展经验,创新管理体制机制,建立以“政府主导、服务企业”的管理模式,由政府成立专责机构对园区发展进行统一规划管理,与职能部门协调园区便利化和开放政策的制定,与地方政府构建自由贸易园区“港城互动”的实施和落实,在园区内为企业“统一高效、服务丰富、减少干预、监管到位”的管理服务,形成自由贸易园区管理体制“三驾马车”,从宏观上对自由贸易园区的发展进行把握和设计,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大的自由度和开放度。

（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促进园区发展

我国自由贸易园区的试验和发展,需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深入转变政府职能,发挥企业主体作用,使传统政府事前审批的思维向过程服务和事后监管转变,提高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能力。一是要处理好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关系,统筹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使各种企业在公平公正的环境中展开竞争。二是要探索人民币国际化、利率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和资本项目可兑换等金融市场改革的具体路径。三是要完善土地使用管理制度的市场化改革,使政府、土地新旧使用者、土地开发者合理分配利益,促进土地资源合理自由流动。四是要尝试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可行性,促进资本更加充分自由地竞争。五是要严格强化执法,切实保护知识产权,激发园区内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动力,逐步形成更为合理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

参考文献:

1. 张世坤:《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转型的模式研究》,大连理工大学 2005 年学位论文。
2. 尚佳:《基于对应分析法的综合保税区与自由贸易园区的差别化研究》,上海交通大学 2012 年学位论文。
3. 张世坤:《有关汉堡港、鹿特丹港、安特卫普港的考察—兼谈我国保税区与国际自由港的比较》,《港口经济》2006 年第 1 期。
4. 李志鹏:《中国建设自由贸易园区内涵和发展模式探索》,《国际贸易》2013 年第 7 期。
5. 陈浪南、童汉飞、谢绵陞:《世界自由贸易区发展模式比较》,《税务研究》2005 年第 8 期。
6. 周滢:《我国出口加工区转型升级与对策研究》,上海交通大学 2009 年学位论文。
7. 崔迪:《从欧美自由贸易园区发展经验看上海建立自由贸易园区研究》,《江苏商论》2013 年第 6 期。
8. 祁欣、孟文秀:《全球自由贸易园区发展模式及对比分析》,《对外经贸实务》2010 年第 6 期。
9. 包海兵、匡玲丽:《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向自由贸易园区转型的几点思考》,《世界海运》2012 年第 10 期。
10. 武俊奎:《综合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园区转型战略研究》,《现代经济信息》2013 年第 6 期。
11. 黄智勇:《中国保税港区与自由贸易区发展模式比较研究》,《改革与战略》2012 年第 7 期。

责任编辑:刘英奎

由“生产型”趋向“消费型”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2013 年回顾与 2014 年展望

王碧珺

摘要：2013 年中国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901.7 亿美元，同比增长 16.8%；完成海外兼并收购 460.46 亿美元。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呈现日益多元化的格局，无论是在传统的资源和制造业领域，还是在金融业、高科技、房地产业、娱乐业等领域，2013 年的表现都可圈可点。2014 年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并有望超过利用外资的规模。结构上，我们预计中国海外投资逐渐由“生产型”趋向“消费型”。

关键词：全球并购 企业“走出去” 结构转型

作者简介：王碧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一、2013 年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特征

根据商务部的最新数据，2013 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 156 个国家和地区的 5090 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901.7 亿美元，同比增长 16.8%。截至 2013 年底，中国累计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达到 5257 亿美元。兼并收购是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形式，根据 BVD—ZEPHYR《全球并购交易分析库》与 IIS，2013 年全年中国完成海外兼并收购 460.46 亿美元，同时，该年中国企业另有 187.39 亿美元海外兼并收购意向。对这些交易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如下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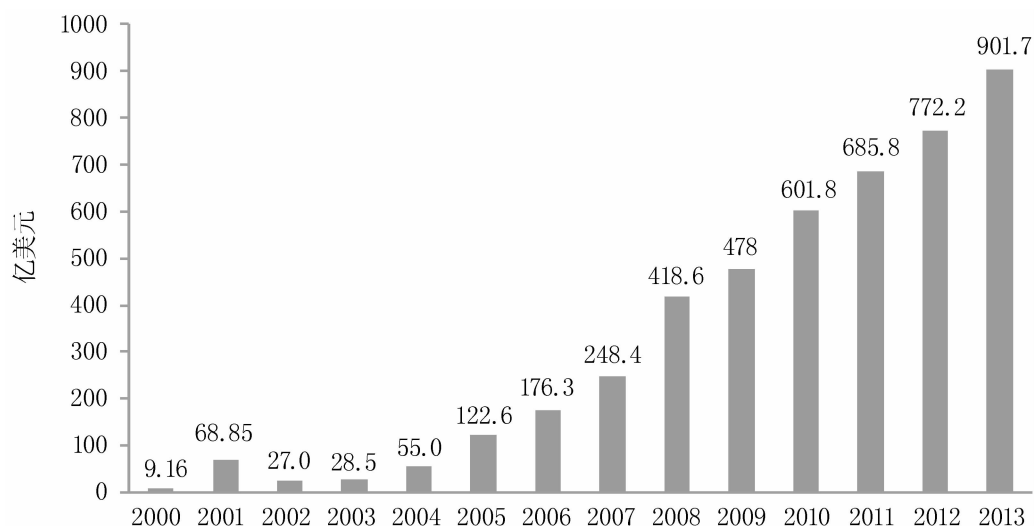


图1 2000年-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数据来源：商务部等发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一）投资行业日益多元化，采矿业和制造业拔得头筹

2013年，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呈现日益多元化的格局。无论是在传统的资源和制造业领域，还是在金融业、高科技、房地产业、娱乐业等领域，中国企业在2013年的表现都可圈可点，具体的行业分布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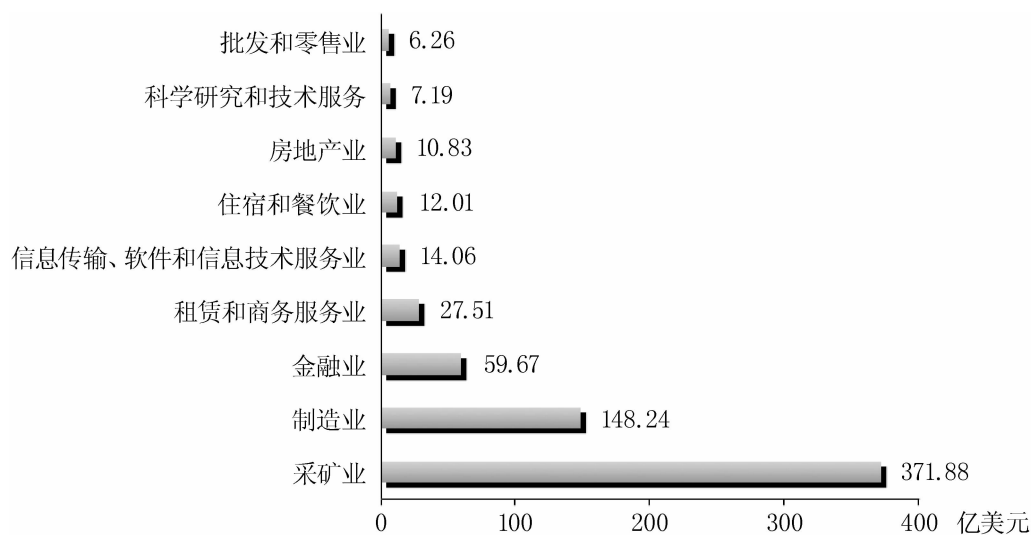


图2 2013年中国跨境兼并收购行业分布

数据来源：BVD—ZEPHYR《全球并购交易分析库》与IIS。

在众多的海外投资目的行业中，采矿业和制造业拔得头筹。2013年，中国企业海外采矿业兼并收购20起共371.88亿美元，制造业兼并收购43起共148.24亿美元，两者合计占同期中国企业海外兼并收购额的78.88%、项目数的43.45%，是中国企业海外兼并

收购最为重要的两个行业。

采矿业作为中国对外兼并收购的第一大产业，占据半壁江山（占 2013 年中国企业海外兼并收购额的 56.40%，剔除中海油收购加拿大尼克森公司的交易后占比达到 43.45%），反映了资源需求在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中的重要性。从投资的资源类型来看，油气资源是主体（占比达到 95%），煤、金、铜、铁矿资源为辅。这些油气资源投资主要位于巴西、俄罗斯、埃及、莫桑比克、秘鲁等新兴市场国家以及美国、加拿大、新加坡等发达经济体，而其他金属和非金属类矿业投资主要位于澳大利亚。中石油是中国所有油企中最为活跃的海外并购者，2013 年耗资近 190 亿美元，囊括了包括巴西国有石油公司位于秘鲁的传统油气资产以及意大利埃尼集团在莫桑比克一处大型天然气田的权益，比 2012 年全年的海外并购金额 56 亿美元翻了两番。

制造业在投资额上是中国海外兼并收购的第二大行业（22.48%），在项目数量上是第一大行业（29.66%）。绝大多数制造业海外兼并收购发生在发达经济体（占制造业投资项目数的 86.04%、投资金额的 60.80%），主要包括美国、澳大利亚、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和日本。获取当地的先进技术、品牌和市场渠道是重要的投资目的。2013 年投资额最大、最引人注目的制造业项目发生在美国，即双汇国际 71 亿美元收购全球最大猪肉供应商——美国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在经历股东、美国参议院、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等重重阻力下最终尘埃落定，有史以来最大一桩中国企业收购美国公司的交易于 2013 年 9 月 26 日顺利完成。

金融业异军突起，成为中国海外兼并收购的第三大行业。相比其他行业，中国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一直较为保守。中投投资摩根士丹利和黑石、平安投资富通集团等中国金融机构在金融危机前进行的海外财务投资都遭受了巨额亏损。在这些惨痛教训下，无论是金融机构还是监管当局对海外投资都较为审慎。然而，这一现象正在改变，2013 年金融业海外兼并收购 59.67 亿美元，其中，中信证券收购里昂证券以及广发证券收购 Natixis（法国外贸银行）大宗商品部已经收官，工商银行也接近完成收购伦敦大宗商品交易业务。

（二）亚洲和欧洲是投资重地，香港、德国和美国是项目数前三目的地

从投资项目数上，亚洲是首要目的地。如果剔除中海油 151 亿美元收购加拿大油企尼克森的交易，亚洲在投资额上也是首要目的地。2013 年，中国企业在亚洲兼并收购 142.66 亿美元，占同期总投资额的 23%（剔除尼克森交易占 29%）、项目数的 38%。在亚洲的投资主要集中在香港、新加坡和吉尔吉斯斯坦；投资行业多种多样，主要有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以香港为代表（包括新加坡等）的亚洲地区经济体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桥头堡和中转地。例如，三

峡集团收购葡萄牙电力公司 21.35% 股权、万达集团收购美国 AMC 娱乐公司等以欧美为最终投资目的地的中国对外兼并收购，实际上都记在了香港名下，通过香港地区再投资完成。

仅次于亚洲的第二大吸引地是欧洲。2013 年，中国企业在欧洲兼并收购 96.46 亿美元，占同期总投资额的 16%、项目数的 37%。在欧洲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德国、英国和法国，以制造业投资为主，同时，金融业投资增长迅猛。从项目数来看，2013 年德国是中国海外兼并收购的首要目的地，这既与德国广泛存在的优质资产有关，同时，德国的投资风险较小。根据 IIS 国家风险评级课题组发布的《2013 年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①，德国获得 AAA 评级，投资风险最低。

虽然美国的国家安全审查给中国投资者带来不少麻烦，但美国对于中国投资者的吸引力仍然较大。2013 年，中国企业在美国兼并收购将近 100 亿美元。主要标的包括太阳能面板、新材料、食品等制造业，以及生物科学、计算机服务等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此外，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复苏也增加了对中国企业的吸引力。中国投资者已经成为美国房地产市场上仅次于加拿大的第二大海外购买者。2013 年的几笔重大交易包括：万科与美国铁狮门房产共同在美国旧金山买下复升街 201 地块的 70% 股权；上海绿地集团宣布就收购加州教师退休基金持有的美国洛杉矶中心区大都会项目签署合作协议，项目总投资达 10 亿美元等。

（三）十大海外兼并收购中资源行业仍是主体

根据投资规模排序，本文总结了 中国海外兼并收购前十大交易（见表 1）。其中，最大一笔交易是中海油 151 亿美元收购加拿大油企尼克森公司。第二大交易为双汇国际 71 亿美元收购全球最大猪肉供应商——美国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该交易将助力双汇获得美国养猪行业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并推动国内整个猪肉生产加工工业的现代化。

在前十大交易中，资源行业仍然是主体，总投资额达到 330 亿美元，占前十大交易总投资额的 72.2%。这些资源主要是位于加拿大、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油气资源，以及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中投入股印度尼西亚最大的热煤生产商布米资源公司（Bumi Resources）。

与大项目相对应，作为中小企业集群式“走出去”的重要平台，境外经贸合作区在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中的位置得以加强。截至 2013 年底，中国企业已在 13 个国家建设了 16 个境外经贸合作区，实际投资 44 亿美元，协议入区企业 390 家，累计创造产值 129 亿美元，企业涉及轻纺、家电、钢材、建材、化工、机械等多个领域。不仅有效地整合了企业优势和资源，同时，降低了对外投资风险。

^①国家风险评级课题组：《2013 年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国际经济评论》2014 年第 1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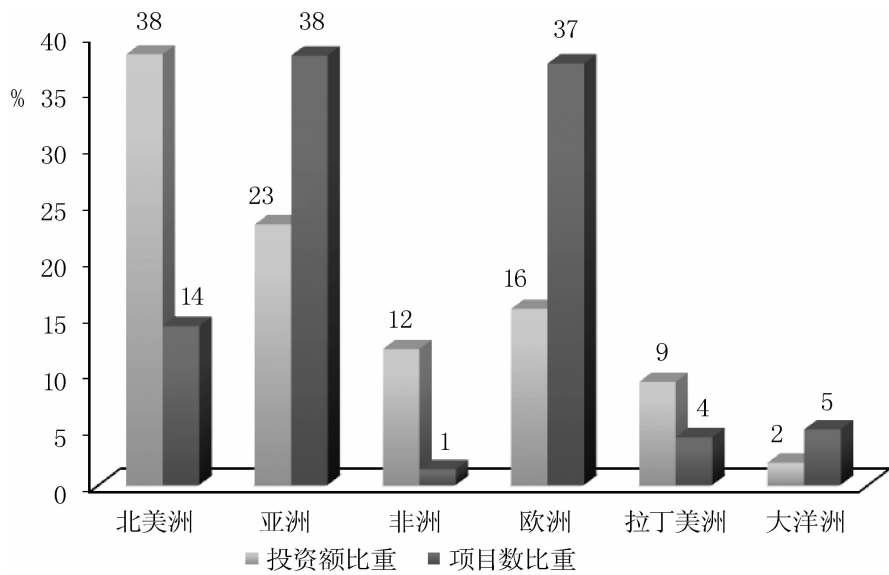


图 3 2013 年中国跨境兼并收购区域分布

数据来源：BVD—ZEPHYR《全球并购交易分析库》与 IIS。

表 1 2013 年中国十大跨境兼并收购

	中国企业	海外投资对象	投资国	金额(亿美元)	行业
1	中海油	尼克森	加拿大	151.0	采矿业
2	双汇	史密斯菲尔德	美国	71.0	制造业
3	中石油	哈萨克斯坦某油田	哈萨克斯坦	50.0	采矿业
4	中石油	意大利能源巨头埃尼集团 (Eni SpA) 的东非资产	莫桑比克	43.0	采矿业
5	中国建设银行	俄罗斯外贸银行	俄罗斯	34.4	金融业
6	中石化	阿帕奇公司油气业务	埃及	31.5	采矿业
7	中石油	巴西石油秘鲁子公司	秘鲁	26.2	采矿业
8	成栋投资	俄罗斯乌拉尔钾肥公司	俄罗斯	21.8	制造业
9	中化集团	巴西深水油田	巴西	15.4	采矿业
10	中投	布米资源公司 (Bumi Resources)	印度尼西亚	13.0	采矿业

数据来源：BVD—ZEPHYR《全球并购交易分析库》与 IIS。

二、政策发展

（一）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启“负面清单”序幕

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于 2013 年 7 月 10 日至 11 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一个重要的成果是中方同意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基础与美方进行投资协定实质

性谈判。这是中美在 2008 年启动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以来所取得的最大突破，标志着中国达成高水平投资协定和参与全球投资治理的态度，以及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决心，更重要的是进一步释放了改革信号，不仅意味着中国将进一步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同时，也表明将带动中国的外资管理体制、金融体制、司法体制等多方面的改革。

（二）《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3 年本）》标志着海外投资监管由核准制向备案制转型

2013 年 12 月公布的《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3 年本）》中规定，中方投资 10 亿美元及以上项目，涉及敏感国家和地区、敏感行业的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前款规定之外的中央管理企业投资项目和地方企业投资 3 亿美元及以上项目报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备案。由核准制改为备案制无疑是对有海外投资意向的中国企业的重大利好，有利于降低企业的海外投资成本和面临的政策不确定性，增加投资效率和避免错失投资机会；我们期待实施细则和时间表能尽快出炉。

三、2014 年海外投资展望：由“生产型”趋向“消费型”

2014 年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并有望超过利用外资的规模。从结构上来看，我们预计中国海外投资日益由“生产型”趋向“消费型”。

“生产型”海外投资的特征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海外矿业投资满足国内制造业企业的原材料供应需求，这尤其反映在钢铁企业海外铁矿石投资上。宝钢、武钢、首钢、沙钢、鞍钢、中钢、华菱钢铁等在澳大利亚都有铁矿石投资项目。二是中小企业“贸易促进类”海外投资。以浙江省为例，约有 70% 的海外投资是到发达国家建立分支机构，用于获取市场信息、提供售后服务，从而促进国内产品出口到当地。

受到国内产能过剩和外需疲软的影响，“生产型”海外投资日益式微。在国内经济转型大背景下，中国海外投资“消费型”特征日趋明显。

一是油气等消费性资源海外投资。资源需求在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中已占据半壁江山，但从资源类型上看，铜、铁、铝等生产性矿业资源已经让位于石油、天然气等消费性燃料资源，后者占到中国资源类海外投资 90% 以上，主要位于埃及、巴西、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莫桑比克等发展中国家以及美国、加拿大、新加坡和荷兰等少部分发达国家。尤其是中国企业已经开始涉足北美以油砂和页岩气为代表的非常规油气资源。

二是欧美高端消费品行业海外投资。足够的资金和快速增长的市场成为欧美高端消费品行业发展的掣肘，而中国这两样都具备。2013 年中国奢侈品消费总额超过千亿美元，依然是全球奢侈品市场的最大客户。面对国内对高端消费品日益庞大的需求，中国制造

的产品一直苦于无法实现高附加值效益和高端品牌定位。面对进入门槛高、品牌传统、品牌历史和原产地相对垄断的高端消费品行业，将世界级品牌和企业纳入囊中而非白手起家树立品牌，成为中国企业的更优选择，海外投资成为实现途径。

三是海外农业投资，满足国内对安全健康食品的消费需求。中国地域虽然辽阔，但耕地资源相对有限，且国内食品安全问题频频爆发。通过“走出去”利用国外的土地、森林、海洋、生物资源能实现发展空间的拓展和升级，获得高质量、安全健康的食品和相关技术品牌，从而满足国内中高端消费者的需求。2014 年最引人注目的农业投资项目发生在美国，即双汇国际 71 亿美元收购全球最大猪肉供应商——美国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

四是发达国家基础设施和海外房地产投资。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对基础设施升级的需求旺盛，加大了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对外开放力度。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能够获得风险相对较低、回报持续稳定的收益。此外，房地产业也成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新宠。在国内，有中国政府出于遏制房地产泡沫的宏观调控；在国外，以美国为代表的房地产市场逐渐复苏。于是，中国地产开发商加大了海外房地产投资力度。以美国为例，中国投资者已经成为美国房地产市场上仅次于加拿大的第二大海外购买者。

五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将加快转移。如果国内生产成本持续攀升，那些劳动密集型、成本敏感、低技术、低附加值的企业，即使在中国内陆地区也会失去比较优势而迁往国外。中国企业已经充分意识到获得核心技术、拥有知名品牌、占有市场渠道的重要性，并且在过去 5-8 年的海外直接投资中也是以提高自身竞争力、向价值链上端移动为重要投资目的。当前，即使对于中小企业而言，“降低成本”并不是中国制造业企业投资海外的主要动机，毕竟虽然近年来国内成本上升迅猛，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仍具备一定的成本优势。但正如 20 世纪 60、70 年代的日本，80、90 年代的“四小龙”，成本因素会日益成为重要考量。

四、企业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中国企业走向国际成为大趋势。2006 年世界 500 强中只有 20 家是中国企业，而 2013 年已经有 86 家是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成为中国企业走进世界的重要手段之一。总的来说，企业海外投资面临三大风险。

一是投资壁垒和保护主义。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频频遭遇阻力，典型案例包括中海油收购美国石油公司优尼科折戟、中铝增持澳大利亚力拓公司失利。威胁东道国“国家安全”是惯用的理由，而背后很多实际上是商业利益在作祟，是商业竞争政治化的表现，中国企业或成为东道国国内政治博弈的牺牲品。典型的受阻国家除了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外，近年来央企在发展中国家投资遭遇的政治阻力也在增加，例如，2009 年中石油在收购以利比亚业务为主的加拿大小型石油公司 Verenex Energy Inc. 碰

壁，神华集团和中铝也在蒙古遭遇挫折。

二是宏观层面投资安全。全球初级产品长期牛市面临转折，给依赖初级产业增长的除中国之外新兴市场经济体带来较大压力。同时，全球有将近 60 个国家和地区面临领导权变更，发展中国家选举争议不断。以上经济变动和政权变更两个因素正在加大当前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战乱风险。此外，自 2010 年年底爆发，先后波及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和叙利亚等国的一系列以“民主”和“经济”为主题的反政府运动并未完全消停。大量央企在利比亚的损失历历在目，数额庞大。

三是投资项目巨额亏损。中国企业，尤其是央企海外资源类和建筑类投资项目诸多面临巨额亏损。例如，中铝在澳大利亚奥鲁昆铝土矿资源开发项目告吹，损失高达 3.4 亿元；中国铁建投资沙特轻轨项目亏损近 42 亿元人民币；中铁在波兰 A2 高速公路项目亏损，合同总额 4.47 亿美元；中钢集团和中信泰富在澳大利亚铁矿石项目中深陷泥潭等。

以上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所面临的挑战，既有东道国的原因，又有国内制度不完善、不合理的地方。在中国海外投资日益由“生产型”转向“消费型”过程中，为了提高投资绩效和改善投资形象，中国企业需要采取一定的策略。

一是建立投资项目库。长期跟踪感兴趣的投资项目和企业，从经营状况、财务状况、资产状况等各方面进行全方面关注和跟踪，并制定预案。

二是控制项目规模，降低持股比例。投资额庞大的项目往往受到当地社会、政府和媒体的高度关注。中国企业缺乏海外投资经验，同时自身透明度不够，再加上东道国对中国企业的不了解，容易处于风口浪尖而遇到投资阻力。另外，投资额庞大的项目对企业自身的资金实力要求也更高，很多时候超过了企业自身的净资产和可支付能力，几乎完全依靠外部融资，尤其是国内银行的支持，这很难说服东道国是市场经济下的纯粹企业行为，同时低廉的资金成本也带来了“不公平竞争”的嫌疑，也给海外投资尤其是在发达国家的投资带来了阻力。

三是做好尽职调查，确保配套设施。做好海外投资项目的前期调研评估、科学论证和尽职调查，防止企业在能力不具备、对合同不完全了解、可行性分析不到位的情况下，贸然做出巨额投资决定。同时，尽职调查不仅要针对项目本身，还要考虑配套设施是否完善，当地的铁路、港口和码头等基础设施是否具备。

四是主动跟社会团体打交道，与当地利益进行绑定。中国企业要注意与东道国有关机构进行积极沟通并树立良好形象，重视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同时，建立与当地媒体、社区、国际组织的交流和沟通渠道，解释企业的投资动机和发展思路，阐述如何保护当地就业以及知识产权，宣传企业在当地实现互利共赢的行为。

责任编辑：刘英奎

• 调研报告 •

关于美丽乡村建设的调研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课题组*

摘要：近些年，全国各地结合实际，以不同方式开展美丽乡村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规划编制、长效机制、自觉意识、资金支持、基础设施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对此，要深入总结经验，从统一思想、村庄规划、基础设施建设、构建长效机制、弘扬乡土文化、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等方面入手，进一步加强美丽乡村建设。

关键词：美丽乡村 千万工程 清洁乡村

近几年来，全国各地在推进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坚持因地制宜，一切从实际出发，积极探索转变农村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有效途径，取得了明显成效。浙江始终把“千万工程”美丽乡村建设当作“一把手工程”，历届省委、省政府“咬定青山不放松”，常抓不懈，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有了显著改善。河北从广大农民群众最关心、最迫切的要求入手，实施“农村面貌改造提升行动”，在很短时间内，村容村貌就有了明显改观。广西准

* 课题指导：聂振邦；课题组成员：王军、王福强、马庆斌、元利兴、李锋、窦勇、赵春哲。

确把握全区农村发展阶段与实际情况，把“清洁乡村”作为现阶段统筹全区城乡发展和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突破口，已经取得初步成效。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中国农村的综合治理与建设”课题组，对新时期全国各地美丽乡村建设活动进行了系统调查和研究，重点实地调研了浙江、河北、广西等有代表性的农村地区，对于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对下阶段进一步加强美丽乡村建设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一、全国美丽乡村建设中的成功做法和经验

（一）浙江省“千万工程”

2003年，习近平同志主政浙江期间，作出了实施“千万工程”的重大决策，开启了浙江美丽乡村建设的宏伟篇章。10年来，浙江历届省委、省政府始终把“千万工程”当作“一把手工程”，始终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年接着一年抓，并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长效机制。正是靠着这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而不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抓热点，浙江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有了明显改善。“千万工程”实施以来，先后投入1200多亿元，开展了2.6万个村的环境综合整治，完成农村住房改造135万多户，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和生活污水治理的行政村覆盖率分别达到93%、62.5%，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远远低于全国平均值，走出了一条具有浙江特色、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的美丽乡村建设之路。

1. 发展优势产业，增加农民收入。杭州市安吉县山川乡高家堂村，人口849人，山林面积9729亩，水田面积386亩，竹林资源丰富，自然环境保护良好。高家堂村重点发展林业和生态休闲产业，建设高效毛竹林现代园区和世界银行毛竹林阔叶林树套种项目，成立竹笋专业合作社，流转全村3800多亩毛竹林，从零散销售到规模经营，形成了“一园一谷一湖一街一中心”的休闲产业带。2011年，高家堂村成立了安吉蝶兰风情旅游公司，作为乡村经营主体对外运营，开拓出一条集加工、休闲、度假、观光、娱乐为一体的村庄经营可持续发展之路。2012年农民人均收入19625元，村集体总收入291万元。

2. 发挥古迹优势，打造特色经济。江山市大陈乡大陈村历史悠久，现有人口1293人，拥有以清代为主的古民宅、古祠堂、古戏台等古迹111处。大陈村以古建筑为依托，大力发展特色经济，古村旅游和大陈面成为大陈村的招牌。大陈面成为乔迁新居、婚宴寿庆等回赠亲朋的上佳礼品和居家生活的风味美食，源源不断地销往全国各地。2012年村集体收入26万元，农民人均收入13000元。

3. 实施六大工程，打造生态环溪。湖州市桐庐县环溪村共有农户606户，人口2098

人。近年来，环溪村开始实施生活污水治理、生态河道改造、生态人居提升、生态文化传承、综合服务配套、富民产业发展等六大工程，倾力打造“生态环溪”。2010 年，该村投入 760 余万元，新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 9 个，生活污水处理截污率达 95% 以上，完成河道疏浚、鹅卵石砌坎和小堰坝修筑等工作。环溪村还在百年祠堂“爱莲堂”内创办了爱莲书社，设立党员远程教育站点和电子阅览室，使爱莲堂成为弘扬家风、读书明理、崇文尚志、文化传播的中心。2012 年农民人均收入 15499 元，高于桐庐县平均水平，比上年增加 11.7%，高于全省增幅。

4. 保护古村落，打造幸福乡村。江山市石门镇清漾村为历史文化村落，江南毛氏发源地，毛泽东同志的祖籍地，现有人口 1135 人。清漾村现有《清漾毛氏族谱》（该族谱已被国家档案馆确定为中国第一批珍贵文物），还有仙居寺、石大门等 16 处景点。江山市委、市政府专门成立了清漾历史文化村保护与新农村建设领导小组，出台了文化旅游总体规划，投资 1.2 亿元进行毛氏祖宅开发，修缮了一批古建筑，开发项目现已开业，不仅保护了古村落，还增加了农民收入。

5. 依托景观村落，大力发展旅游业。温州市永嘉县苍坡村始建于五代后周时期，共有人口 2639 人，以奇特的“笔墨纸砚”布局而闻名，有望兄亭、水月堂、官厅等古老建筑和传说。苍坡村依托“笔墨纸砚”文房四宝布局规划，实现了科学规划布局美。2009 年投资 7 万元建成垃圾中转站，家家户户均埋设排污管道和安装座便缸，彻底解决了乱排污水现象。同时，依托景观村落，大力发展旅游业。2012 年，苍坡村旅游收入超过 2000 万元，人均收入 10610 元，实现了创业增收生活美。

6. 采用公司合作，大力发展农家乐。台州市天台县街头镇后岸村共有农户 348 户，人口 1203 人，土地面积 800 亩，山林面积 3200 亩，是国家 AAAA 旅游景区——“寒明岩”的景中村。2011 年以来，后岸村以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为抓手，依托景点资源优势，集体成立了“农家乐”协会和寒山旅游公司，大力发展休闲旅游业，成为了集漂流、登山、垂钓、观光、采摘、餐饮、住宿及商务接待于一体的综合性休闲度假村，实现了从“采石矿”向“搞旅游”的绿色经济转型，形成了“农家乐”与农业、加工业互补互促的产业发展新格局。2012 年，共接待游客 5.5 万人次，营业额达 500 万元，人均收入 15000 元。

（二）河北省“农村面貌改造提升行动”

河北省委、省政府从广大群众最关心、最迫切的需要入手，顺应全省广大农民的要求和期盼，从民居改造、厕所改造、道路硬化、垃圾污水处理、饮水安全、村庄绿化、土地整理和秸秆处理等实事入手，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截至目前，河北省有

95.3%的村庄完成了以清垃圾、清杂物、清除残垣断壁、清庭院为内容的“四清工作”，硬化道路 7300 公里，新增供水家庭 27.8 万户，全省 98%的村庄建立了垃圾处理长效机制，8000 多个村庄面貌发生变化。

1. 因地制宜，迅速改善村容村貌。石家庄新乐市小流村聘请专业规划设计单位结合本村特色进行规划设计，充分考虑群众利益，既要漂亮又要实用。仅用三个多月的时间就改变了过去脏乱差的落后面貌，居住环境明显改善，村民生活质量显著提高。小流村还利用村中央废弃的宅基地和树木，因地制宜地改造成了一个健身休闲广场，我们与在健身休闲广场休息的老人进行了交流，看到老人们脸上流露着幸福的笑容，村民对改造后的环境比较满意。

2. 循序渐进，就地改建新民居。邯郸市曲周县小弟八村长期坚持循序渐进就地改建新民居，按照“统一规划、统一样式、统一补贴、统一建设”的思路，条件成熟一户新建一户，不急于求成。目前，已建成新民居 75 户，占全部农户的 1/3 左右，新的二层小楼使用面积比过去大为增加。小弟八村的新民居改造，不仅实现了农村面貌明显改善，还回收废旧宅基地 167 片，全部建成后将累计节省出 102 亩宅基地，相当于总量的 1/3，复垦成农田可用来增加农民收入。

3. 土地置换，破解城镇化资金难题。涿州市把里渠、大兴庄、邓渠、四树、古城、刘家园 6 个自然村集中在里渠村建设新型社区——六和新村，将原有部分宅基地置换到城里，作为建设用地指标全市统筹使用，搬迁后原有村庄进行复耕。6 个村占地面积 2145.1 亩，复耕土地面积 1946.4 亩，既解决了新农村建设的资金匮乏问题，又解决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用地少的难题。此外，通过土地置换，农民上楼后还将获得部分财产性收入作为生活保障。

4. 发展生产，推进生活生产双改善。廊坊市固安县林城万人温泉小镇，是在合并了林一、林二、林三和郭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目前已完成 29.2 万平方米住宅建设。此外，林城还建设了占地 480 亩的滤清器工业园，有 120 家企业入驻，年产值达 5 亿元，生产条件显著改善，特色产业的基础更加稳固，村民（80% 的村民从事滤清器产业）收入明显增加，2012 年人均收入超过 12000 元。林城始终坚持“生活改善”与“生产发展”相结合，把农村面貌改造提升行动与培育特色产业紧密结合起来，初步形成了“工业规模化、农业公司化、居住城市化、环境园林化”的现代化温泉小镇。

5. 注重环保，建设文明生态村。邢台市桥东区三合庄村的生活污水过去全都流入村里的一个大坑塘里，不仅污染了地表环境，对地下表层水也有污染。2012 年，村委班子充分考虑群众意见，经反复研究，由村民和区水务局共同投资 50 多万元兴建了湿地式污

水集中处理站，日处理生活污水能力为 50 立方米，完全满足了村民的污水处理需要。

（三）广西壮族自治区“美丽广西·清洁乡村”

广西区委、区政府在准确把握全区农村发展阶段与实际情况的基础上，针对全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薄弱环节，以“清洁乡村”作为统筹全区城乡发展和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突破口。未来还将在此基础上，分阶段启动“生态乡村”、“宜居乡村”和“幸福乡村”建设，全面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1. 高度重视，科学规划。目前，广西自治区把“美丽广西·清洁乡村”活动列为全区的“民生工程”、“生态工程”、“新风工程”和“作风工程”，也是“一把手工程”，由自治区书记任活动领导小组组长，各厅局委办一把手任活动领导小组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包括综合组、宣传组、资金组、项目规划组、考核验收组等六个工作组。根据区领导小组安排，自治区各市（区）县也相应组建了领导小组和美丽办等机构，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组织体系和工作网络。广西制定了科学的活动实施规划，明确了活动具体目标、基本原则、主要任务、实施步骤、工作机制和资金组织保障等具体内容。

2. 扎实有序，成果显著。广西“清洁乡村”活动已完成宣传发动阶段，正处于全面推进阶段，目前，推进的主要任务是“清洁家园”、“清洁水源”和“清洁田园”建设。截止到 2013 年 11 月 3 日，“清洁家园”活动共开展组织清扫村庄内及周边垃圾 44.5 万次，落实乡镇庄清扫保洁员 13.4 万人；“清洁水源”活动中，各地关闭乡村污染严重的小企业 1556 家，建成 1319 座村屯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清洁田园”活动中，全区重点抓 305 个自治区级清洁田园示范点，并推动各地开展清洁田园五大示范活动，全区共建立了市、县、乡级示范点 2463 个，清捡田间废物 12022 吨。

3. 创新机制，规范管理。广西在活动中持续推进机制创新，根据农户健康意识和习惯，发挥村屯自治管理组织作用，努力形成统一管理、相互监督、自我约束的村落社区化管理模式。例如，兴宾区探索出“政府主导、企业实施、群众参与、市场运作”的百万亩蔗区农药废包装回收处理模式。马山县建立了完善的村屯保洁制度，并探索建立了多种保洁机制和垃圾清运机制，如“村收集—镇运输—县处理”的乔老模式和“屯主体—村管理—镇补助—县处理”的林圩模式。

4. 充分宣传，发动群众。自治区党委、政府印发《“美丽广西·清洁乡村”活动方案》不久，全区召开活动电视动员大会，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新闻媒体，出版简报、海报、板报、标语、手册，结合各种会议和培训活动对“清洁乡村”活动进行广泛深入宣传，宣传活动遍及每一个自然村，进一步提高了对这项活动的认识，使人民群众积极

参与到活动中来，并能够发挥重要甚至主体作用。

5. 因地制宜，示范引领。广西在建设“美丽乡村”活动中，从各地实际情况出发，有针对性地制定活动方式和方案。把“清洁乡村”活动与生态建设和产业发展结合，与新农村建设紧密结合，与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紧密结合，实现了乡村清洁与农村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例如，桂林市秀峰区鲁家新村依托桂林周边的旅游资源，统一规划建设，不仅改善了村容村貌，而且通过建造高端旅游度假区，发展生态农业、休闲旅游及度假酒店等服务产业，解决了村民就业问题。

6. 明确责任，严格监督。广西采取分级负责制度，从自治区各个厅局到各区县，明确责任，分片包干，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并建立了严格规范的督查机制。例如，南宁市对全市各个乡镇进行季度考评，并对考评成绩优秀的予以奖励，对排名末位且分数较低的启动问责机制。马山县采用责任网格化管理，建立健全三级网格制度，并组织巡警、交警、城管和工商等部门组成联合执法队，每天由一名县处级领导带队，对县乡镇农贸市场“五乱”现象进行全面整治。

7. 技术引领，服务完善。广西各个主管部门分别组织制定并印发技术指导，例如《广西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技术指引》，同时组织专家队伍构建技术服务网络，到农村基层进行技术指导。认真抓好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技术示范项目的整理提升和培育推广，充分发挥堆肥场、沼气池、发酵罐等设备切合农村实际的作用，探索各具特色的多样化垃圾处理方式，并进行推广应用。

8. 整合资金，加大投入。广西在“美丽广西·清洁乡村”活动中，通过财政专项资金、涉农资金、企事业单位资金、社会力量捐助资金及农民自愿筹资等方式保障活动资金投入。截止2013年11月，自治区累计投入12.6亿元用于开展“清洁水源”活动。南宁市马山县通过建立“三个一点”（政府投入一点、县直挂点单位和社会各界投入一点、群众自筹一点）的资金筹措机制，多渠道筹措资金。目前，该县各类资金到位2.7亿元，其中县级筹措及配套资金2886万元，群众投工投劳折合资金237多万元，筹集社会资金300多万元。

二、美丽乡村建设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一）村庄规划编制工作有待加强

尽管规划先行的理念已广为人知，但在实际执行中还存在着很多问题。具体表现为：规划断档，往往是省市级有原则性规划，而村镇乃至县级很多地方都缺乏科学具体的规划指导，并且各部门之间的规划和方案还存在“打架”现象；规划脱离实际，很多规划

单位还是用城市理念来规划农村，不适合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需要；部分农村在进行宅基地划分、基础设施建设等具体操作时，不按规划操作，执行不力，造成大量土地浪费。

（二）农民自觉意识有待提高

通过广泛宣传和教育，农民群众参与乡村建设的热情逐步提高，但由于受历史和现实多重因素制约，部分农民群众的环境卫生意识和习惯仍然较差，距离自觉积极采取行动保持环境卫生的要求还有相当差距。部分地方存在“政府干、农民看”、“政府投、农民等”等现象，农村环境卫生改善极易出现反弹。

（三）资金支持难题有待解决

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地区，资金短缺已经成为深化美丽乡村建设的瓶颈。部分地区财政困难，难以落实项目配套资金、运行经费和工作经费，影响整体工作推进。在资金使用上，也存在着部门分散难成合力、多少分配不均等问题。从长远看，维持项目运行还需持续投入资金，若不从体制机制上建立长远的管理模式，后续资金保障不足，可能会导致美丽乡村建设后劲不足、虎头蛇尾。

（四）长效机制建设有待完善

各层级的责任体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没有形成一个家庭、村庄、政府、企业共同参与的机制。由于相关考核评价机制还未完全建立，有些基层干部认识不到位，没有深刻认识到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没有把这项工作摆到应有位置，仅仅当作临时性任务。

（五）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有待加强

长期以来，政府对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入严重不足，历史欠账严重。农田水利、道路、水电气、垃圾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不适应广大农村地区和农民群众生产生活改善及提高的需要，特别是边远山区和贫困地区，基本生产生活条件较差。

（六）垃圾污水处理环节有待优化

在农村和乡镇基本上不具备垃圾污水处理能力，即使有垃圾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水平和运行质量亦不高，配套设施不齐全，存在污染隐患，影响农村环境。垃圾处理的技术手段相对简单，科技含量低、综合利用率低、无害化程度低，还没走上资源化的综合处理道路。“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现象在部分村庄还存在。

（七）美丽乡村与城镇化衔接有待加强

当前，我国美丽乡村建设在人居环境、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以浙江为例，全省 94% 的村庄实现整治，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行政村覆盖率达 93%。但调研中发现，尽管很多乡村道路建设便捷、房屋建设档次很高，但多数人还是进城务工和居住，农村留守的基本上都是老人和儿童，很多漂亮整齐的房屋大门紧锁、无人居住。因此，下一阶段建设过程中，应充分考虑乡村人口向城镇聚集的趋势。合理规划，避免边建设、边闲置、边拆除的浪费情况。

（八）环保理念和认识有待深化

农村的老百姓勤劳、朴实。但是，过去一味追求经济发展、发财致富也带来了环境污染。一些人虽然挣到了钱，但污染了环境，自己也疾病缠身。一个农村干部自嘲说：“以前以为赚钱是为了生活得好，现在才明白是为了给医院送钱。”在未来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广大农村要处理好致富与环保的关系，始终贯穿清洁生产的理念。

三、大力加强美丽乡村建设的建议

进一步加强美丽乡村建设，是广大农民实现小康愿景的迫切需要，“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必须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目标，以农村垃圾和污水处理为切入点，以农民宅基地、承包地要素流转为抓手，以中心村、中心镇建设为支撑，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推动城乡一体化，促进农业生产稳定发展，全面改善、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和水平。

（一）以村庄规划编制为先导，统筹村庄综合治理

要把编制村庄布局和建设规划放在美丽乡村建设的首要位置，着力形成与城乡体系、土地利用、基础设施建设等规划相互衔接的规划体系。结合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明确中心村镇、文化村、城中村等不同类型的村庄的发展定位，有序建设，避免出现“今天建，明天扒”的现象。结合土地综合整治，明确人口集聚区、现代农业和特色产业发展区、公共服务中心等建设内容。尊重农民意愿及历史、文化和农村习俗的传承，紧密结合农民生活需求，对农村的民居、道路、垃圾污水处理、厕所改建等进行统筹规划。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美丽乡村融入大自然。

（二）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美丽乡村建设要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以中心村镇为载体，推动教育科技、

医疗卫生、文化娱乐等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统筹城乡发展，消除二元结构，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中西部地区发展落后，经济基础薄弱，自然条件艰苦，广大农民群众对农村环境改善的要求更为迫切，也更加需要政府投入。因此，要加大对中西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倾斜力度。统筹安排农村水电路气等基础设施建设，努力实现等级公路、邮政、电话、宽带等“村村通”，电视广播“村村响”和农村电话“户户通、城乡同价”。

（三）以农民群众为主体，充分发挥热爱家园、关心家园和管理家园的主人翁作用

要着眼于解决老百姓最迫切、最实际、最困难的问题，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充分尊重农民意愿，把村庄环境整治的主动权交给农民自己，以农民群众为主体，政府规划为指引，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构筑农村环境治理长效机制。农村环境如何整治、如何规划、由谁施工、由谁监管等主要环节，交由农民民主决定，发挥好村党组织和村委会的领导作用。同时，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移风易俗，逐步培养农民形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自觉养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四）以传统文化保护为依托，大力弘扬农村乡土文化

要注意保护、传承、发扬传统文化，把弘扬乡土文化作为彰显村庄特色的核心，通过开展特色文化村培育、历史文化村保护等，增强农村发展的吸引力、凝聚力和软实力。深度发掘农耕传统、民族风情和民间技艺等乡土文化，着力培育特色文化村，加快形成“一村一品、一村一景、一村一韵”的乡土特色文化；围绕修复农村传统建筑、弘扬历史文化、打造宜居环境等，保护好历史文化村落；依托村内祠堂、会堂、闲置校舍等场所，建设集学教、礼仪、娱乐于一体的农民精神文化礼堂。

（五）以兴业富民为手段，不断增强农村发展内生动力

因地制宜，培育农村特色产业，打造农村经济新增长点，增强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鼓励农民创新创业，努力形成环境美化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美丽乡村与农民富裕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把美丽乡村打造成助农致富的新亮点，充分发挥农村田园风光、山水资源等优势，运用经营村庄的理念，以休闲旅游、农家乐、民俗游等为载体，积极培育发展养生运动、文创等新型业态，发展景区经营、物业经营和配套服务等产业，增强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

（六）以形成乡村建设合力为目标，协调调动各方力量

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形成政府推动、农民主体、企业和社团等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建设美丽乡村的合力。中央财政要加大对农村建设的资金投入，带动地方财政和社会资金

投入，发挥“四两拨千斤”的引导作用。如，环京津地区周边农村治理直接关系到环境改善，国家对这些重点地区和环节应加大支持力度。创新融资机制，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推动农村资源要素可抵押、可流转、可交易，增强美丽乡村建设的内生动力。

（七）以生态文明为引领，推动乡村与自然和谐发展

从规划布局到建设实施，自始至终要贯彻生态环保理念。要在逐步渗入现代文明元素的同时，通过生态修复、改良和保护等措施，保护好农村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妥善处理农村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全面营造农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优美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

（八）以垃圾污水处理为突破口，加快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垃圾污水看似小事，但却是农民群众反映最强烈、最关注的问题。要清理露天粪坑、改造简易户厕，推行统一进厂处理、村域生态处理等污水处理办法，提高农村污水达标排放率。在推进农村垃圾集中收集的基础上，围绕解决农村垃圾收集易、无害化处理难的问题，以中心村为重点，辐射带动周边行政村的垃圾处理工作。同时，探索研究水泥窑、沼气池、太阳能等方式协同处理垃圾的新技术、新政策，努力形成各具特色、有所长的多样化垃圾处理方式，不断提升农村垃圾处理水平。

（九）以基层党组织为领导核心，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带头作用

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是美丽乡村建设的领导核心，要充分发挥他们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的带头作用。通过落实经费、加强培训、明确职责等措施，加强农村党组织建设，推动农村“末梢治理”。要加强与村民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合作，可以在自然村层面设立互助会，管理生产发展、环境保护等公共事务。

（十）以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为契机，推动城乡土地要素流转

土地在农村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闲置土地的盘活以及土地流转能够为美丽乡村建设带来必需的资金和建设空间。因此，有必要以农民宅基地、农村建设用地流转为抓手，从国家层面研究制定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土地政策，主要包括：完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及审批手续和流程、完善土地出让金收益分配制度、扩大土地流转范围等。通过土地政策创新来推动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破解土地供需矛盾。

责任编辑：李蕊

• 案例研究 •

徐工：向世界级企业迈进

张志平

摘要：徐工集团现已明确国际化、世界级企业核心战略，通过全球布局网络化基地，自主创新，产品结构全面升级，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提升核心竞争力，产业升级和战略转型框架初步成型，在迈向世界级企业的道路上步伐越来越稳健。

关键词：徐工集团 国际化 信息化 世界级企业

作者简介：张志平，江苏省经济和信息化委企业信息化处副处长。

一、导 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企业的竞争已经从本土市场迈向了全球市场，尤其是中国经济的崛起，使得中国大型企业集团在国际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正逐步向世界级企业迈进，为中国民族品牌屹立于世界之林做出了突出贡献，徐工集团就是其中具有典范意义的代表。徐工集团成立于 1989 年 3 月，作为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排头兵，24 年来始终引领行业发展方向和趋势，2012 年成功跻身全球工程机械前五强。徐工集团的企业愿

景，是成为一个极具国际竞争力、国人为之骄傲的世界顶级企业。多年来一直秉承“担大任、行大道、成大器”的核心价值观，以振兴民族工业为己任，徐工正迈开大步向“千亿元、国际化、世界级”目标挺进；发展目标是未来5年营业收入达到3000亿元，进入全球工程机械制造商前三强，进入世界500强企业，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全新跨越，全力实现“由中国到世界”、“从东方挺身全球”的产业抱负和梦想。

二、徐工国际化的主要阶段和历程

国际化是徐工的一个核心战略，从市场体系建设、制造基地建设、研发体系建设到国际收购兼并，实现了“产品‘走出去’、企业‘走出去’、资本‘走出去’”的三级跳，徐工正通过国际化之路全面构建世界级企业。而这也成为中国优势企业的核心战略。只有走国际化之路，方能提升中国企业在世界上的知名度，更好地在国际社会展现中国实力。

（一）产品“走出去”

从20世纪80年代借助外贸公司开始粗线条、零星几台的产品出口，到成立徐工进出口公司自行摸索出口，再到1992年9月实现徐工集团自营出口第一单（徐工压路机3Y8-10型号出口到韩国1台，金额为1.06万美元），标志着徐工集团已经自行探索出了一条产品“走出去”的道路。1993年徐工集团作为第一家中国工程机械企业自费参加德国宝马工程机械展，迈出了走向国际市场的第一步。20年后的今天，徐工凭借产品质量过硬、服务与备件网点量大面广的优势，产品已经成功出口到169个国家和地区，2012年徐工进出口公司实现自营出口13.26亿美元，徐工品牌的产品通过各种渠道出口额超过16亿美元，连续24年稳居国内工程机械行业出口额之首。根据规划，未来5年徐工集团将力争出口达到300亿元人民币，国际化指数达到25%以上；全球经过徐工专业培养的资深服务工程师达1100人，服务工程师达到3000人。

徐工集团董事长王民提出：“徐工将借助更多国际平台寻求更多合作伙伴，以加快国际化步伐。”近年来，徐工集团全面参与国际化高端展览会，提升企业国际影响力，扩大品牌知名度。继2011年参加美国拉斯维加斯国际工程机械展之后，2012年4月徐工集团再次组团，盛装参加法国国际土木工程机械展。2012年11月，徐工集团携41台高精尖产品再次亮相上海宝马国际工程机械展，向世界展示了徐工的高端制造科技和世界级企业的雄厚实力。2013年4月，徐工集团（XCMG）携11款不同型号及功能的工程机械在德国慕尼黑开幕的国际工程机械博览会亮相。2013年，徐工集团参加了土耳其、俄罗斯、南非、巴西、泰国、印尼、伊朗等10个区域型展会，加大区域性品牌渗透。

（二）企业“走出去”

徐工集团一直致力于抓紧实施全球化经营的战略布局，通过认真研究全球市场，划分营销区域，逐步在全球各区域内建立海外公司和工厂。目前，已在东欧、南亚和南美等区域设立办事处，为筹建徐工海外公司做前期的准备工作。同时，选择条件成熟的国家或地区设立组装厂，扩大徐工产品在当地市场份额和市场占有率。

2007 年 9 月开始海外基地建设，2009 年 3 月徐工在波兰的装配厂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徐工在东欧的生产基地，主要生产装载机、压路机、平地机等产品。2013 年 1 月，徐工集团首个海外生产基地落户巴西，项目占地面积 80 万平方米，总投资 2 亿美元，将形成起重机、挖掘机、装载机、压路机、平地机等产品 7000 台年生产能力。巴西基地 2014 年建成并批量生产，到 2015 年销售收入目标为 5 亿美元。徐工巴西制造基地是徐工集团国际化发展进程中的第一个全资生产基地建设项目，集采购、制造、营销、服务于一体，将使徐工机械加快海外拓展和全球布局，将南美打造成第二个本土徐工，将大幅增加生产规模和销量，这也将增加对上游产业的需求，拉动上游产业的发展，带动我国工程机械零部件企业走向全球市场。除此之外，印度、南非、印尼等制造基地项目也将开始实施。

（三）资本“走出去”

徐工集团注重研发能力的提升，认为技术创新是重中之重。”在研发体系的国际化布局上，徐工也在快速推进，目前已经在欧洲设立研发中心，成立项目组，未来还将在巴西、南非、印度、日本等国成立研发中心，搜集市场需求，研发适应当地化的产品，为当地施工更好地服务。2011 年徐工开始海外并购，先后收购了荷兰 AMCA 有限公司和德国 FT 公司这两家研发制造基础零部件企业。这两家欧洲企业在高端液压件制造领域拥有核心技术，徐工据此获得了高端零部件的核心技术。2012 年 4 月，徐工控股了有 78 年历史的世界顶级混凝土机械设备生产商德国施维英公司，拥有其 60% 的控股权，使徐工在这一领域跨入世界领导者地位。这三项收购每年会给徐工增加年海外销售收入超过 10 亿美元。

三、主要经验

（一）全球产业布局，建立网络化基地

面对全球高强度的竞争，徐工集团把“在全球范围构筑多区域支撑，多项目驱动的产业格局”作为促进企业健康快速发展的重要战略，通过抓住行业自身调整的有利时机，

抓紧推进徐工的国际化开拓和全球产业布局，搭建起徐工全新起跳的发展平台和产业链基础。

徐工上海临港制造基地、徐工北方基地（迁安）等国内基地陆续开工建设。2012年6月，总投资120多亿元，全球规模最大、工艺技术最先进、精益制造能力最强的徐工全地面起重机、装载机智能化、混凝土泵送机械、混凝土搅拌机械四大基地正式启用，新增5000台中大吨位起重机、4万台中大吨位装载机和2万台成套混凝土机械产出能力，投产后，将新增总产能近400亿元，相当于再造一个全新的徐工机械。徐工四大基地投产是徐工“十二五”一次至关重要的产业升级和战略转型，标志着从过去依靠规模和速度发展的传统模式，向依靠技术、品质、精细管理来拓展内涵式增长之路的全新转变，四大基地凝聚了徐工多年来的产业积淀，并呈现出全新阶段的全新亮点。一是通过高度集约化、柔性化、智能化和全数字化管理，形成与国际最先进标杆企业同一平台的精益制造和品质制造能力，并凸显了高效、节能、环保和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国家高端产业的方向性特点；二是突破性创造出6吨以上大吨位装载机、120吨以上超大吨位起重机批量化在线制造新模式；三是创造出与德国施维英技术完美融合、极具成长性并将全面爆发增长能量的成套混凝土机械全新板块。

依托全球市场基础，徐工在海外基地建设上，走出一条从CKD、SKD装配到绿地建厂的探索之路。2011年徐工收购德国FT公司和荷兰AMCA公司；2012年徐工一举控股并购了有着78年历史、曾是世界混凝土成套设备领导者的德国施维英公司，极大地加速了徐工主机和零部件产业化发展的国际化进程。目前，徐工伊朗、波兰、巴西、印尼、南非、东欧、印度海外制造基地以及海外研发中心等建设成为本地化扎根、全球化拓展的重要依托，对提升我国工程机械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和竞争格局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徐工正在建立全球保障能力的优势，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海外营销和服务备件体系，拥有巴西、安哥拉、斯里兰卡、委内瑞拉等10个海外备件中心，全球一级代理机构达110家，二级经销商超过170家，288家服务中心网点，500多家签约服务商，海外产品保有量突破5万台。目前，徐工正在建设完成菲律宾、墨西哥、澳大利亚等另外10个备件中心。徐工的海外体系建设主抓两个方面：一是专业化渠道建设，通过提升渠道管控能力、全力培养经销商、实施精细化管理等手段，建立专业的销售渠道；二是进一步夯实服务基础和备件，提升整体的品牌影响力。另外，徐工还在委内瑞拉、印度、赞比亚等国家建立起培训中心，在当地培养服务工程师以及操作手。除此之外，徐工还积极联合国内施工企业通过海外工程承包共同开拓国际市场，通过这种“借船出海”模式成功拿下了很多大单，比如，安哥拉石油管道建设一次性采购徐工422台产品，埃塞俄比亚

一次性采购 345 台徐工产品。最振奋人心的当属 2010 年委内瑞拉的 7.5 亿美元的大订单，徐工一举售出 6025 台各类工程机械产品，创下工程机械行业单笔订单历史记录，有力地证明了徐工品牌的国际影响力。

（二）自主创新提升品质，产品结构全面升级

徐工集团每年把销售收入的 5% 用于科研开发。自成立以来，徐工集团始终把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放在重要位置，始终致力于打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名牌产品，并为此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财力。自主创新是徐工集团连续 24 年稳居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第一位的法宝。近年来，徐工通过技术改造与技术创新，掌握了一系列核心技术，实现了从低端加工组装环节向产业价值链高端的发展，重量级新品源源不断，积累了深厚的技术底蕴，创新能力不断加强，科技创新能力持续领先。

徐工潜心起重机核心技术研究，深度融合工程应用和客户需求，持续打造核心竞争力，向全球起重机第一品牌目标发起冲击。中国起重机行业技术含量最高的 1600 吨全地面起重机、4000 吨级世界最大的履带式起重机均率先在徐工诞生并实现商品化。至今，徐工全地面起重机、履带式起重机型谱宽度和密度已超越国际同行，汽车起重机已构建形成最密集的型谱群，新引进的塔机板块将在徐工大力扶持下实现动臂式技术的全新突破，起重机总体专利技术已达到 1078 项，品质保值能力持续领先。

2000 年以来，徐工不仅在产量、数量上达到全球第一，在单位面积产出的集约化精益生产上也达到了世界起重机行业先进水平。在销量最大的中国，徐工起重机市场占有率连续 10 年保持在 50% 以上；在海外，其平均占有率也达到了 30%。产业组合构建互补优势。2014 年以来，徐工全面整合旗下产业，其中最具规模和品质优势的就是起重机板块，汽车起重机、全地面起重机、履带式起重机、塔式起重机、特种消防车各子板块的资源全面配备到位，在追求专业化的同时，实现在研发平台、信息化平台、采购平台、市场平台等方面的资源共享。

徐工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在国家发改委的历年度评价结果中始终位居工程机械行业第一，并被国家五部委联合授予“国家技术中心成就奖”，徐工集团也被国家工信部授予江苏唯一首批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在不断完善国家级技术中心和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同时，徐工瞄准最前沿技术、面向全球布局研发中心，徐工研究院已建设完成，徐工南京研究院已揭牌设立，徐工欧洲研究院和徐工美国研发中心也同步加紧建设。研发科技人员超过 4000 人，其中，100 多名国内最高端工程机械领军型技术人才、100 多位德国、美国、日本等工程机械专家加盟徐工，高端人才平台的集聚作用正在形成，为技术

沉淀和创新挖掘技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实现世界顶级企业的目标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持。

徐工坚持以“高科技、高品质、高附加值、大型化、差异化”的产品强力冲击市场，每年上百种新产品投放市场。近几年技术研发费每年都在十几亿元以上，在高端装备智能化、轻量化、节能环保等领域拥有近 200 项核心技术和 1382 项有效专利，研制出 100 多项国产首台套重大装备。全球最大吨位、技术含量最高的 XCA5000 全地面起重机、4000 吨级履带起重机被中石化订购后，已多次出色完成国家重点工程的吊装任务；120 吨以上大吨位起重机市场占有率近 70%，基本占领了曾被跨国公司垄断的该高端领域。徐工集团开发出我国第四代智能化筑养护机械、国产唯一 12 吨超大吨位装载机、亚洲第一高 DG100 登高平台消防车等，两次获国家科技进步奖（行业最高奖），五次获中国机械工业和全军科技进步一等奖。经过 10 多年的创新和发展，徐工集团近年来研发出了一批代表中国乃至全球先进水平的产品，主导产品汽车起重机销量已连续 9 年世界第一，大吨位压路机销量已连续 3 年世界第一；平地机、摊铺机、高空消防车等 9 类主机全国销量第一。

在关键核心零部件突破上，徐工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 + 并购消化 + 联合与协作创新”的三路并举的独特道路，自主研发的高端变速箱及与新并购欧洲企业共同突破的液压多路阀及液压系统等核心零部件有了重大突破。与此同时，新涉足的矿山装备、消防装备、环卫装备及高铁、隧道施工装备、水利及油气钻采和海工装备等主机门类的创新突破，构筑了徐工强大的工程机械航母。

依托强大的自主创新力量，徐工的规模实力已连续 24 年位居中国工程机械第一位，2011 年实现营业收入突破 870 亿元，历史性地跻身全球第五位。九类主机和基础零部件市场占有率位居行业首位，2012 年徐工移动式起重机也历史性地晋升至全球排名榜首；2012 年实现营业收入突破 1000 亿元。

（三）推进两化深度融合，全面提升核心竞争力

徐工集团经过多年的信息化建设，正在全力推进两化深度融合，努力实现信息化对产品全生命周期、业务全流程和企业全价值链的覆盖，建立企业未来的发展优势，强力推进自主研发和技术创新、精益制造、现代物流管控、产品延伸服务能力、复合型人才培养、研产供销服综合集成和集团管控一体化等核心能力的建设。未来，徐工正在着手将全球网络化基地，通过两化深度融合成为实时响应的全球网络。

近年来，徐工集团紧密围绕战略转型和业务发展需求，大力推进信息化整体提升工

程,基本实现了信息化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采购、销售、服务等各环节的全面覆盖、渗透融合和综合集成,使两化深度融合的效益得到充分体现,显著提升了企业核心竞争力,为中国装备制造业两化深度融合探索了一条比较成熟的发展路径。

1. 实现智能化发展

徐工集团从研发设计和产品信息化两个方面,着力推进工程机械产品从“制造”向“智造”转型。企业通过构建高效统一的数字化协同设计平台,统一标准、编码、流程、平台和研发工具,实现研发数据的集中管理和共享,降低了研发成本,实现新产品上市时间从半年缩短为 3 个月。下一步,企业将建立开放式的产品协同研发网络,实现与关键零部件厂商在研发阶段的整体协同能力。在产品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方面,徐工集团结合高新技术改造,取得了许多自主创新成果。通过采用计算机技术、车辆负荷传感自动变速等高新技术,对沥青混凝土摊铺机、沥青混凝土搅拌站、装载机等产品进行全面升级,提高了相关产品的智能化水平。实施工程机械机群智能化工程,通过应用有线、无线数据自动交换技术、GPS 技术、智能故障诊断与预测技术、工作状态监控技术、在线检测等先进技术,开发出涵盖大型自卸车及汽车起重机等大型施工设备的智能化机群,满足了用户对工程机械全面智能化的新需求,推动了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技术进步。

2. 提高过程管控水平

在生产过程中,徐工集团实现了关键数控设备及大型加工中心和研发设计系统的集成,能够实时掌握生产状态,自动监控和记录设备状况,对车间现场进行网络化监控和可视化管理。通过生产能力平衡系统、配送系统、看板管理、制造执行系统的全面集成,基本实现了生产过程的自动化管理和控制,增强了生产管理的科学性和灵活性,使生产能力提高了 40%,配套率提高了 8%,按时交货率提高了 12%,库存周转率提高了 20%,报废返工率降低了 0.2%,实现了多品种产品的同时排产和混线生产,提高了企业柔性生产制造水平。

3. 打造现代物流平台

徐工集团以供应链管理为主线,利用条码、射频识别等新技术,建立了现代物流管理信息平台 and 立体化仓库。企业的年度计划、月度计划、批次计划、送货计划与供应商、外协单位实现了全面集成,并通过物流管理系统的延伸,实现了与供应商的协同运作。目前,徐工集团和宝钢、上柴等 189 家主要协作厂商建立了数字化物流通道,宝钢等直接根据徐工采购计划形成自己的生产计划,实现了徐工生产计划与供应商供应计划的衔接,改变了原来那种单枪匹马的企业竞争策略,形成了优势互补的供应关系,降低了采购费用,实现了零库存。下一步,徐工集团将实现与供应商在生产过程、生产能力和生

产质量等方面的全面协同，建立一个相互支持的工程机械产业现代物流群，缩小企业配套半径，提高整个供应链的协调性，不断追求成本降低和资金周转加快，以实现整体效益提升，使企业在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

4. 延伸产品价值链

徐工集团通过呼叫中心、售后服务和备品备件管理、远程服务、电子商务平台建设等，延长了产品价值链，逐步实现企业从产品制造向产品增值服务转型。第一，通过呼叫中心建设，统一集团客服电话，构建了涵盖总部、分公司、经销商、服务网点等多层次的营销服务管理体系。第二，建立了高效的网络化售后服务和备品备件管理体系，涵盖了备品备件的采购、销售、运输和仓储，有效平衡了客户服务水平和内部库存压力，提高了客户满意度。第三，基于智能化工程机械产品，实现了产品的远程实时监控、故障预警、故障诊断、主动服务等功能，为客户提供了超值服务，提高了市场占有率。第四，通过建立 B2B 和 B2C 两种模式的电子商务平台，整合上下游关联企业相关资源，提高个性化服务能力。

5. 推进整体提升工程

推进工程充分考虑系统性、整体性、战略性的统一。为实现从战略控股型向战略经营型转变，徐工集团从 2008 年开始实施“信息化整体提升工程”，建立集团全价值链管理平台。纵向上延伸集团对下属企业的管理深度，以整合集团内部各个子、分公司的资源，实现集约经营和资源优化配置；横向上提高研产供销服等企业核心业务一体化水平，建立覆盖全价值链的业务运营和支撑体系，提高经营效率和整体运营能力，满足企业在当前市场环境下持续提升生命力和竞争力的要求。徐工集团信息化实践被评为中国企业“两化”融合的新标杆，成为助力徐工国际化征程的新引擎之一。

四、启 示

“世界级”的光荣与战略转型的挑战，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世界级企业的国际化发展需要源源不断的强大动力，徐工集团董事长王民提出的“创新引擎、品牌引擎、信息化引擎”三大引擎战略，为中国企业的国际化驱动提供了重要借鉴意义。

（一）创新引擎

中国企业已经从规模扩张进入转型升级阶段，转型的出路是技术上登上行业顶峰，无限风光在险峰。企业只有掌握价值链的高端技术，以准确的市场导向和市场定位，为用户量身创造先进适用的创新产品，加快提升企业产品核心零部件的自主创新能力，并

拥有一批行业领军专家和高端技术人才，才能拥有强大的创新引擎，实现“珠峰攀顶”，一览众山小。

（二）品牌引擎

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庞大、产品系列的不断丰富以及各类人员的不断增加，如何确保目标的统一实现和品牌的全球认知度，成为了关键任务。中国企业在向世界级企业迈进的过程中，还需要通过“标准化驱动”、“双品牌驱动”以及“高品质驱动”等，完善企业的品牌引擎，以获得客户的忠诚与信赖，赢得全球市场，进一步提升企业的国际形象。

（三）信息化引擎

企业信息资源与企业的人力、财力、物力和自然资源一样，是企业的重要资源，而且是企业发展的战略资源。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内外形势发展瞬息万变，获取信息的准确性和快捷性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需求，因而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性已经被世人所认同。同样，提高信息资源的集成与共享，提升产品全价值链管理效率，解决信息不对称等，都离不开企业信息化的全面建设。中国企业必须重视信息化成果的创新，实现以“管理云驱动”、“服务云驱动”和“商业云驱动”为支撑的“三云驱动”体系，构筑企业的信息化引擎，完成中国企业由产品输出迈向产品、技术、管理、资本等多维度输出的蜕变，从而跻身于世界级企业行列。

责任编辑：刘英奎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理论与实践”论文征集暨优秀论文评选活动参选文章

丹东市旅游局提供支持

国际权威机构观点综述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2014 年 3 月份以来，国际机构对世界经济形势、中国经济形势以及全球化进行了分析和判断。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对世界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

（一）全球经济短期内仍将温和增长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3 月 11 日发布的经济形势评估报告显示，全球经济短期内仍将温和增长，主要发达经济体继续巩固复苏，而除中国以外的新兴经济体增长将低于长期平均水平。

报告预测，七国集团（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加拿大和意大利）2014 年上半年增速将高于 2012 年底水平，但低于 2013 年下半年约 2.5% 的水平。七国集团整体经济第一季度将增长 2.2%，第二季度增长 2.0%。其中，美国经济复苏有望加速，第一季度增速预计达 1.7%，第二季度有望达到 3.1%；加拿大和法国经济增长也将加速，英国将保持平稳，七国集团其他成员经济增速将减缓。

报告显示，新兴经济体增长仍然非常不均衡，部分新兴经济体可保持强劲增长，另一部分因国际资本流动冲击而导致增长动力削弱。由于新兴经济体占世界经济比重超过一半，新兴经济体整体表现将影响全球经济在短期内加快复苏。

报告指出，全球经济复苏仍然面临一些长期风险：日本刚刚开始应对财政挑战；欧元区经济增长仍然脆弱，有可能大幅减缓；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调整将继续对一些新兴经济体带来负面影响；部分新兴经济体将面临国际资本流动和汇率剧烈波动风险。这些风险一旦蔓延和扩大，有可能拖累世界经济增长。

（二）全球经济即将摆脱低迷

国际投行高盛集团 4 月 3 日指出，2014 年全球经济在开年之际遭受了一定的波折之

后，将自第二季度起全面走入正轨。一季度时，全球经济表现相对疲软的状况是暂时的，在暂时性因素消退之后，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就会再度如同各界此前预期的步伐进行下去。

高盛认为，在进入二季度后，除了日本以外的全球各主要经济体的 GDP 增速都会有所提高。日本 4 月起将消费税税率由 5% 上调至 8%，这势必会对其经济造成一定冲击，并使其经济增速在二季度大幅下滑。

高盛强调，美国经济将会摆脱此前因为天气寒冷和消化库存而遭遇的暂时性低迷。此后，美国经济的表现将足以证实该国已彻底进入复苏模式。因为，目前美国金融市场面临的融资环境是本轮经济复苏以来最为宽松的，而经济周期性好转状况则将同时推升股市和国债收益率。高盛预计，美国经济同比增速将在二季度达到 3%，远高于一季度的预期值 1.5%。

对于欧洲市场，高盛同样持有偏向乐观的预期。因为，此前已有充分证据显示，欧元区已经摆脱了债务危机的持续困扰。目前，唯一的变数在于，欧洲央行会否在此后采取进一步的宽松政策措施。若欧洲央行有意出手提振扶助经济，那么欧元区经济复苏步伐或进一步加快。

其他发展中经济体，虽然今年年初遭遇了美国缩减购债宽松措施力度引发的热钱外逃冲击，同时也受中国经济局面堪忧的溢出冲击，但这些经济体在进入二季度全球经济环境好转后，其经济及金融市场状况将会有立竿见影的好转。

（三）全球经济已度过“最糟糕时期”

根据布鲁金斯学会和《金融时报》4月6日联合发布的跟踪指数，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复苏势头正在增强，但若想恢复失去的活力，各国政府需要齐心协力。由于发达经济体的形势持续好转，同时新兴市场从年初的惊恐中冷静下来，全球经济步入平稳发展轨道，但短期内迅速加速的可能性依然很小。布鲁金斯学会经济学家兼高级研究员埃斯瓦尔·普拉萨德认为，最糟糕的时期可能已经结束，但实现持续复苏的前景取决于各国政府能否表明进行实质性结构改革的决心。

（四）全球经济复苏正在加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4月8日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2014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降至3.6%，比之前预测下调0.1个百分点。报告认为，全球经济将在今明两年持续改善，全球经济复苏正在加强，预计全球经济今年将增长3.6%，明年将增长3.9%，高于去年的3%。主要动力来自发达经济体，发达经济体今明两年增速将分别达到2.2%和2.3%。其中美国的经济复苏最为强劲，2014年经济增速将达到2.8%。

但报告同时指出，全球经济复苏仍然脆弱，面临超低通胀率、新兴市场的资本外

流、地缘政治等带来的风险。发达经济体经济强劲复苏的同时，新兴经济体面临的风险也加剧。

二、对中国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

（一）中国需要推进经济改革和转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 3 月 24 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14 年年会表示，中国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稳定的重要力量，但中国需要推进经济改革和转型，这一转型将使中国走上质量更高、更可持续的增长道路，并进一步提升其全球领导作用。

她认为，中国上一轮改革使其变成一个制造业大国，下一轮改革必须以增强现代服务业部门的作用为目标，这不仅会释放服务业部门的巨大增长潜力，而且会促进就业和消费增长以及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为了实现金融部门现代化，中国已经采取了值得称赞的步骤，包括最近一段时间出台的一些重大措施，中国在扩大汇率波幅方面已经取得了进展，货币政策操作的市场化程度也已提高。但中国若要成功实现下一次转型，必须建立现代化的、强健的、全球一体化的金融体系，在这方面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中国经济即将回暖

据美国杂志《福布斯》网站 3 月 27 日报道，英国投资公司巴克莱资本分析中国经济形势后称，在政策刺激下，中国经济形势即将回暖。在 3 月份发布的全球展望中，巴克莱分析师称，中国政府最终将扭转经济形势，对此他们十分乐观。这一观点已成为看涨中国经济人士的共识。巴克莱资本也并非盲目乐观。事实上，3 月 26 日，巴克莱预测 2014 年中国 GDP 增长速度为 7.2%，仍低于 7.4% 的市场预期。

中国已经证明其扭转经济形势的实力。目前，中国央行保持了较低的货币市场利率，从而削弱汇率，同时，尽管中国政府曾承诺将减少固定资产投资，但近期中国开始开展或扩大基础设施计划。巴克莱伦敦资产配置研究人员表示，在相关政策刺激下，中国经济增长势必加速。

（三）2014 年中国经济增长小幅走低

亚洲开发银行 4 月 1 日发布的《2014 年亚洲发展展望》报告显示，投资的放缓以及结构性改革的积极实施，有望在继续保持更加适度但依旧稳健的经济增长态势的同时，促使 2014 年中国经济增长小幅走低。

该报告预测，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4 年 GDP 将增长 7.5%，2015 年将增长 7.4%。根据预测，主要外部风险在于影响出口需求的发达经济体的复苏弱于预期，主要国内风险源于货币管理效力的不确定性和对信贷质量的担忧。

报告称，中国政策制定者面临的重要挑战在于，以可控的方式管理投资增速放缓。中国人民银行需要在抑制信贷增长和支持经济增长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快速减缓信贷增长，可能会给企业和金融机构带来更大压力，削弱投资者信心。然而，如果当前信贷增速持续下去，包括地方政府和国企债务在内的相关债务会继续增加，也可能加剧资产质量问题，进而削弱投资者信心。

（四）2014 年中国经济增长 7.6%

世界银行 4 月 7 日发布的《东亚太平洋地区展望报告》中，微幅下调 2014 年中国经济增速预期 0.1 个百分点，至 7.6%。对 2015 年和 2016 年的经济预期保持不变，经济增幅仍为 7.5%，跌幅小于整体东亚地区经济增速预期跌幅。

报告同时指出，结构性改革是减轻风险保持长期可持续性增长的关键因素。中国已经开始就金融、市场开放、劳动力流动和货币政策等方面进行改革，以保持有效增长并刺激国内需求。长期来看，这些改革将帮助中国保持一个更稳定兼容的可持续增长。而近期政府的税务改革和降低私人投资壁垒，也将帮助中国短期保持增长。中国改革同时也将为其贸易伙伴带来利益。

（五）2014 年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稳健增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4 月 8 日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指出，虽然中国经济增长在 2012 年之后有所放缓，但从 2013 年下半年起中国经济已经开始复苏，今年将继续保持稳健增长，今明两年经济增速分别为 7.5% 和 7.3%，与之前预测持平。

三、对全球化的主要观点

（一）全球化进程导致贫富差距变大

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 3 月 24 日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根据其委托 Prognos 公司对 42 个国家 1990 年 -2011 年经济增长数据所作的一份调查，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相比，发达经济体从全球化进程中受益更多。芬兰从全球化进程中获益最多，1990 年 -2011 年间人均收入平均每年增加 1500 欧元，其次是丹麦（1420 欧元）、日本（1400 欧元）、德国（1240 欧元）和瑞士（1220 欧元）。从全球化进程获益最少的经济体是印度、中国、墨西哥、俄罗斯和巴西，人均收入平均每年仅分别增加 20、80、100、120 和 120 欧元。

该会主席德赫斯表示，必须认识到全球化加剧扩大了贫富差距。Prognos 的研究人员建议，发达经济体应更大程度地向来自发展中经济体的产品敞开大门，减少农产品补贴以及向发展中经济体的教育措施、基础设施及生产设施扩建等提供资金支持。

（二）世界步入“去全球化”新时期

美国《时代》周刊4月7日刊登题为《逆向全球化》一文，全文摘编如下。

最近，从乌克兰、中东直到南中国海的冲突提醒人们，即便是在全球化时代，地理位置仍然重要。从政治上说，世界当然不是平的。新的经济数据表明，在经济上，世界也越来越不稳定。全球化常常被界定为商品、人和资金在各国之间的自由流动。近来，所有这些都面临威胁，不仅仅是因为俄罗斯、美国和欧洲之间限制旅行和资金流动的制裁。过去两年里，全球贸易的增速低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速。这是二战以来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标志着全球经济的一个转折点，对国家、企业和消费者具有决定性影响。

全球贸易增速比过去慢，有很多原因。欧洲仍在努力结束其债务危机，新兴市场的增速在放缓。但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美国经济正经历深刻变化，美国不再是世界最终消费者。在近五年的经济复苏之后，美国贸易逆差没有增长反而在减少。实际上，从2012年-2013年，美国贸易逆差下降了约12%。

这对美国来说不一定是坏事。逆差减少的部分原因是，页岩油和天然气产量迅速增加，使得美国从国外进口的化石燃料减少了，而且其制造业在增长。但是还有一部分原因是，自危机以来工资没有增加，所以消费支出仍然疲软。美国和世界经济要继续增长，就必须有人购买美国过去消费得更多的电子产品、汽车和其他商品。

令人遗憾的是，没有人这么做。仍然陷于债务危机的欧洲人也许今后五年都不会再花钱。处于不同混乱状态的新兴经济体，其增速大约只有危机前的一半。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弥补了很大一部分全球消费缺口的中国，目前也陷入了金融危机。日本去年作出了贡献，但是安倍经济学鼓励消费政府计划正失去势头。保险业巨头安联保险公司的首席经济顾问穆罕默德·埃里安说，所有国家都存在消费意愿与钱袋不匹配的状况。

由于至少从目前看，全球经济一体化在逆转，许多经济学家和贸易专家开始谈论一个各国都转向国内的“去全球化”新时期。

然而，“去全球化”不一定完全是坏事。正如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弗罗曼最近在华盛顿的一个经济峰会上所说，“去全球化”还意味着企业重新审视其扩展的价值链、供应链，然后决定是否需把部分生产迁回母国。美国已经出现这种情况。

过去30年的全球化，其标志之一就是宽松的信贷环境。正如美联储主席珍妮特·耶伦在最近的记者会上所说，这个时代即将终结。在新的经济时期，市场将开始沿着国界和行业界限分离开来。世界经济格局就像政治格局一样，会变得更加易变、更加不可预测。

责任编辑：李蕊

• 国际统计数据 •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一、世界经济

表 1 2012 年-2015 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上年=100)

单位:%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预测值	2015 年 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4 年 1 月)				
世 界	3.1	3.0	3.7	3.9
发达国家	1.4	1.3	2.2	2.3
美 国	2.8	1.9	2.8	3.0
欧元区	-0.7	-0.4	1.0	1.4
日 本	1.4	1.5	1.7	1.0
发展中国家	4.9	4.7	5.1	5.4
印 度	3.2	4.4	5.4	6.4
俄罗斯	3.5	1.5	2.0	2.5
巴 西	1.0	2.3	2.3	2.8
世界银行(WB,2014 年 1 月)				
世 界	2.5	2.4	3.2	3.4
发达国家	1.5	1.3	2.2	2.4
发展中国家	4.8	4.8	5.3	5.5
英国共识公司(Consensus Forecasts,2014 年 4 月)				
世 界	2.4	2.5	3.0	3.2
美 国	2.8	1.9	2.7	3.0
欧元区	-0.7	-0.5	1.2	1.5
日 本	1.4	1.5	1.3	1.3
印 度	4.8	4.6	5.4	6.0

注:1.IMF 公布的世界及分类数据按照购买力平价方法进行汇总,世界银行和英国共识公司按汇率法进行汇总。2.2014 年和 2015 年为预测数。3.印度来源于英国共识公司的数据指财政年度。

表 2 2012 年-2015 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上年=100)

单位:%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预测值	2015 年 预测值
世 界	2.7	2.7	4.5	5.2
发达国家				
出 口	2.0	2.7	4.7	
进 口	1.0	1.4	3.4	4.1
发展中国家				
出 口	4.2	3.5	5.8	
进 口	5.7	5.3	5.9	6.5

注:包括货物和服务;2014 年、2015 年为预测数。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4 年 1 月。

表 3 2012 年-2015 年消费者价格涨跌率(上年=100)

单位:%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预测值	2015 年 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4 年 4 月)				
发达国家	2.0	1.4	1.5	1.6
美 国	2.1	1.5	1.4	1.6
欧元区	2.5	1.4	0.9	1.2
日 本	0.0	0.4	2.8	1.7
发展中国家	6.0	6.1	5.5	5.2
印 度	9.4	10.1	8.0	7.5
俄罗斯	5.1	6.8	5.8	5.3
巴 西	6.0	6.2	5.9	5.5
英国共识公司(Consensus Forecasts,2014 年 4 月)				
世 界	3.0	2.8	3.0	3.1
美 国	2.1	1.5	1.7	1.9
欧元区	2.5	1.4	0.9	1.3
日 本	0.0	0.4	2.6	1.7
印 度	9.4	9.8	7.7	7.1

注:1.2013 年和 2014 年为预测数。2.IMF 分国别消费者价格指数预测数为 10 月份预测数。3.印度来源于英国共识公司的数据指财政年度。

表4 2013年3月-2014年3月消费者价格同比

上涨率(上年=100) 单位:%

年份	月份	世界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2013年		3.3	1.6	5.8
	3月	3.2	1.5	6.9
	4月	3.0	1.3	7.0
	5月	3.2	1.5	7.0
	6月	3.6	1.8	7.6
	7月	3.7	1.9	7.7
	8月	3.5	1.7	7.6
	9月	3.4	1.4	7.8
	10月	3.3	1.3	7.9
	11月	3.5	1.5	8.0
	12月	3.5	1.6	7.7
2014年				
	1月	3.4	1.6	7.5
	2月	3.2	1.4	7.2
	3月	3.3	1.5	7.2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表5 2013年3月-2014年3月工业生产相关指数

单位:%

年份	月份	工业生产指数 同比增长率(%)			JP 摩根全球制造业 采购经理人指数		
		世界	发达国家	发展中 国家	全球 PMI	产出 指数	新订单 指数
2013年		2.7	0.0	5.9			
	3月	1.3	-0.9	4.0	51.2	52.0	52.0
	4月	3.4	-0.1	7.8	50.4	51.2	50.8
	5月	1.3	-0.1	4.7	50.6	51.3	51.3
	6月	2.0	0.1	4.9	50.6	51.4	51.5
	7月	2.6	0.7	6.4	50.8	51.5	51.6
	8月	2.6	0.8	5.7	51.6	52.3	53.2
	9月	3.3	2.3	5.7	51.8	53.1	52.8
	10月	3.3	2.3	5.3	52.1	52.9	53.3
	11月	4.0	2.9	4.9	53.1	55.2	54.8
	12月	4.0	3.3	5.3	53.0	54.9	54.4
2014年							
	1月	3.3	3.1	4.6	53.0	54.6	54.4
	2月	3.9	3.6	5.0	53.2	54.6	54.6
	3月				52.4	53.4	53.2

注:1.工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率为经季节调整的数据。

2.采购经理人指数超过50预示着经济扩张期。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美国供应管理协会。

二、美国经济

表6 2012年-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2012年		2.8	2.2	-1.0
	1季度	3.7	2.9	-1.4
	2季度	1.2	1.9	0.3
	3季度	2.8	1.7	3.5
	4季度	0.1	1.7	-6.5
2013年		1.9	2.0	-2.2
	1季度	1.1	2.3	-4.2
	2季度	2.5	1.8	-0.4
	3季度	4.1	2.0	0.4
	4季度	2.6	3.3	-5.2

表7 2012年-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口	进口
2012年		8.3	3.5	2.2
	1季度	8.6	4.2	0.7
	2季度	4.7	3.8	2.5
	3季度	2.7	0.4	0.5
	4季度	11.6	1.1	-3.1
2013年		4.5	2.7	1.4
	1季度	-1.5	-1.3	0.6
	2季度	6.5	8.0	6.9
	3季度	5.9	3.9	2.4
	4季度	2.8	9.5	1.5

注:季度数据按季节因素调整、折年率计算(表6、表7)。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表6、表7)。

表8 2012年-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2012年		2.8	2.2	-1.0
	1季度	3.3	2.2	-1.7
	2季度	2.8	2.3	-1.3
	3季度	3.1	2.2	0.2
	4季度	2.0	2.0	-1.1
2013年		1.9	2.0	-2.2
	1季度	1.3	1.9	-1.8
	2季度	1.6	1.9	-2.0
	3季度	2.0	1.9	-2.7
	4季度	2.6	2.3	-2.4

表 9 2012 年 -2013 年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

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2 年		8.3	3.5	2.2
	1 季度	10.5	4.7	3.0
	2 季度	9.5	4.4	3.4
	3 季度	6.5	2.8	2.4
	4 季度	6.8	2.4	0.1
2013 年		4.5	2.7	1.4
	1 季度	4.3	1.0	0.1
	2 季度	4.7	2.0	1.2
	3 季度	5.5	2.9	1.6
	4 季度	3.4	4.9	2.8

注:季度数据经季节因素调整(表 8、表 9)。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表 8、表 9)。

表 10 2013 年 3 月 -2014 年 3 月劳动力市场

相关指数 单位:%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 增长率		失业 率	非农雇员 人数环比 增加 (万人)
		环比 折年率	同比		
2013 年			0.5	7.4	219.1
	3 月	-1.8	0.0	7.5	14.1
	4 月			7.5	20.3
	5 月			7.5	19.9
	6 月	1.8	0.1	7.5	20.1
	7 月			7.3	14.9
	8 月			7.2	20.2
	9 月	3.5	0.5	7.2	16.4
	10 月			7.2	23.7
	11 月			7.0	27.4
	12 月	1.8	1.3	6.7	8.4
2014 年					
	1 月			6.6	14.4
	2 月			6.7	19.7
	3 月			6.7	19.2

注:除年度数据以外,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该月份所在季度的增长率。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

表 11 2013 年 2 月 -2014 年 2 月进出口贸易相关指数

单位:亿美元

年份	出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进口 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出口额 减进 口额
2013 年	22723.2		2.8	27438.5		-0.1	-4715.3
2 月	1868.8	0.0	2.6	2301.4	0.5	1.9	-432.6
3 月	1847.6	-1.1	-0.9	2213.2	-3.8	-5.5	-365.6
4 月	1873.1	1.4	1.7	2266.8	2.4	-1.8	-393.7
5 月	1869.1	-0.2	1.5	2305.7	1.7	0.0	-436.6
6 月	1910.6	2.2	3.2	2254.7	-2.2	-1.0	-344.1
7 月	1897.5	-0.7	3.5	2286.5	1.4	0.8	-389.0
8 月	1896.4	-0.1	4.2	2288.4	0.1	1.2	-392.1
9 月	1892.5	-0.2	1.3	2326.9	1.7	1.9	-434.3
10 月	1931.1	2.0	5.7	2328.8	0.1	3.4	-397.7
11 月	1946.4	0.8	5.1	2298.2	-1.3	-0.8	-351.7
12 月	1912.9	-1.7	1.4	2302.7	0.2	1.4	-389.8
2014 年							
1 月	1924.6	0.6	3.0	2317.4	0.6	1.2	-392.8
2 月	1904.3	-1.1	1.9	2327.3	0.4	1.1	-423.0

注:包括货物和服务贸易。因季节调整,各月合计数据不等于全年总计数据。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普查局。

表 12 2012 年 -2013 年外国直接投资相关指数

单位:亿美元

年度	季度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2 年		1605.7	3669.4	-2063.7
	1 季度	354.3	1156.5	-802.2
	2 季度	489.5	900.4	-410.9
	3 季度	408.9	973.2	-564.3
	4 季度	353.0	639.4	-286.3
2013 年		1875.3	3383.0	-1507.7
	1 季度	291.2	884.9	-593.8
	2 季度	397.4	996.2	-598.7
	3 季度	582.3	950.8	-368.4
	4 季度	604.3	551.2	53.2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三、欧元区经济

表 13 2012 年-2013 年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2012 年		-0.7	-1.4	-0.5
1 季度		-0.1	-0.3	-0.3
2 季度		-0.3	-0.5	-0.3
3 季度		-0.2	-0.1	-0.2
4 季度		-0.5	-0.5	0.0
2013 年		-0.5	-0.7	0.2
1 季度		-0.2	-0.1	0.3
2 季度		0.3	0.2	0.0
3 季度		0.1	0.1	0.4
4 季度		0.3	0.1	-0.2

表 14 2012 年-2013 年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2 年		-4.1	2.5	-0.9
1 季度		-1.1	0.8	0.0
2 季度		-1.8	0.9	-0.2
3 季度		-0.6	0.7	0.3
4 季度		-1.3	-0.6	-0.9
2013 年		-3.0	1.3	0.1
1 季度		-1.7	-0.9	-1.1
2 季度		0.2	2.3	1.7
3 季度		0.6	0.0	1.0
4 季度		1.1	1.2	0.4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13、表 14)。

表 15 2013 年 2 月-2014 年 2 月劳动力市场相关指数

单位:%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就业人数环比增加(万人)	失业率
		环比	同比		
2013 年			0.41	-125.4	12.0
2 月					12.0
3 月		0.27	-0.07	-71.2	12.0
4 月					12.0
5 月					12.0
6 月		0.36	0.43	-5.9	12.0
7 月					12.0
8 月					12.0
9 月		0.13	0.55	0.9	12.0
10 月					11.9
11 月					11.9
12 月		0.20	0.98	10.5	11.9
2014 年					
1 月					11.9
2 月					11.9

注:除年度数据以外,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该月份所在季度增长率;就业人数为该月份所在季度的环比变化。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统计月报、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 16 2012 年-2013 年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2012 年		-0.7	-1.4	-0.5
1 季度		-0.2	-1.3	-0.3
2 季度		-0.5	-1.3	-0.6
3 季度		-0.7	-1.6	-0.6
4 季度		-1.0	-1.5	-0.7
2013 年		-0.5	-0.7	0.2
1 季度		-1.2	-1.3	-0.1
2 季度		-0.6	-0.6	0.1
3 季度		-0.3	-0.3	0.7
4 季度		0.5	0.3	0.4

表 17 2012 年-2013 年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2 年		-4.1	2.5	-0.9
1 季度		-2.7	2.8	-0.7
2 季度		-3.9	3.3	-0.8
3 季度		-4.1	2.8	-1.0
4 季度		-4.8	1.9	-0.8
2013 年		-3.0	1.3	0.1
1 季度		-5.3	0.1	-1.9
2 季度		-3.4	1.5	-0.1
3 季度		-2.3	0.8	0.6
4 季度		0.1	2.6	1.9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 18 2013 年 2 月-2014 年 2 月进出口贸易相关指数

单位:亿欧元

年份	出口额	环比增长 %	同比增长 %	进口额	环比增长 %	同比增长 %	出口额减进口额
2013 年	18959		0.9	17364		-3.4	1595
2 月	1564	-1.2	-1.0	1454	-1.9	-7.1	109
3 月	1608	2.8	-0.5	1434	-1.4	-10.2	174
4 月	1601	-0.4	9.1	1452	1.2	1.6	149
5 月	1563	-2.3	-0.1	1423	-2.0	-5.8	140
6 月	1583	1.3	-2.9	1461	2.7	-5.3	122
7 月	1559	-1.5	3.2	1453	-0.5	0.3	105
8 月	1575	1.1	-5.6	1450	-0.2	-7.4	125
9 月	1588	0.8	3.1	1457	0.5	1.1	130
10 月	1585	-0.2	1.4	1451	-0.5	-3.1	135
11 月	1586	0.0	-1.9	1426	-1.7	-5.2	159
12 月	1566	-1.2	3.9	1419	-0.5	0.8	147
2014 年							
1 月	1587	1.3	0.9	1448	2.0	-2.8	139
2 月	1606	1.2	2.9	1457	0.6	0.4	150

注:欧元区绝对数指欧元区现有范围,即 18 个成员国。贸易额不包括欧元区各成员国相互之间的贸易额,为经季节调整后的数据。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 19 2013 年 2 月 -2014 年 2 月外国直接投资相关指数

单位:亿欧元

年度	月度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3 年		851	1914	-1063
	2 月	195	74	121
	3 月	45	200	-155
	4 月	163	238	-75
	5 月	566	128	437
	6 月	188	331	-143
	7 月	133	64	69
	8 月	287	291	-4
	9 月	-44	149	-193
	10 月	1788	1585	203
	11 月	46	245	-198
	12 月	-408	-311	-97
2014 年				
	1 月	160	250	-91
	2 月	-147	-466	319

注:欧元区绝对数指欧元区现有范围,即 18 个成员国。欧元区外国直接投资额不包括欧元区各成员国相互之间的直接投资额。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统计月报。

四、日本经济

表 20 2012 年 -2013 年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民间最终 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 消费支出
2012 年		1.4	2.0	1.7
	1 季度	0.9	0.4	1.3
	2 季度	-0.4	0.4	-0.5
	3 季度	-0.8	-0.5	0.5
	4 季度	0.0	0.4	0.8
2013 年		1.5	1.9	2.2
	1 季度	1.1	1.0	0.6
	2 季度	1.0	0.6	0.9
	3 季度	0.2	0.2	0.2
	4 季度	0.2	0.4	0.5

表 21 2012 年 -2013 年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 口	进 口
2012 年		3.4	-0.1	5.3
	1 季度	0.1	2.8	2.0
	2 季度	0.4	-0.5	1.4
	3 季度	-1.5	-4.0	-0.4
	4 季度	-0.2	-2.9	-1.9
2013 年		2.6	1.6	3.4
	1 季度	0.3	4.2	1.1
	2 季度	2.3	2.9	1.8
	3 季度	2.2	-0.7	2.4
	4 季度	1.6	0.4	3.5

表 22 2012 年 -2013 年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民间最终 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 消费支出
2012 年		1.4	2.0	1.7
	1 季度	3.2	3.7	2.2
	2 季度	3.2	3.0	1.3
	3 季度	-0.2	0.9	1.5
	4 季度	-0.3	0.7	1.9
2013 年		1.5	1.9	2.2
	1 季度	0.0	1.5	1.4
	2 季度	1.2	1.7	2.7
	3 季度	2.3	2.2	2.5
	4 季度	2.6	2.3	2.2

表 23 2012 年 -2013 年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 口	进 口
2012 年		3.4	-0.1	5.3
	1 季度	5.5	1.0	6.7
	2 季度	6.3	9.2	9.0
	3 季度	2.8	-4.8	5.0
	4 季度	-0.8	-5.0	1.0
2013 年		2.6	1.6	3.4
	1 季度	-1.3	-3.3	0.3
	2 季度	0.7	0.0	0.8
	3 季度	4.3	3.2	3.2
	4 季度	7.1	6.8	9.0

资料来源:日本内阁府(表 20-表 23)。

表 24 2013 年 2 月 -2014 年 2 月劳动力市场相关指数

单位:%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 同比增长率	新增就业与申请 就业人数之比	失业率
2013 年		1.1	1.46	4.0
	2 月	-6.8	1.36	4.3
	3 月	-1.6	1.39	4.1
	4 月	-1.0	1.39	4.1
	5 月	-0.8	1.42	4.1
	6 月	-2.0	1.48	3.9
	7 月	3.1	1.46	3.9
	8 月	0.3	1.48	4.1
	9 月	6.3	1.51	4.0
	10 月	6.3	1.57	4.0
	11 月	5.6	1.55	3.9
	12 月	6.9	1.61	3.7
2014 年				
	1 月	6.9	1.63	3.7
	2 月	7.1	1.67	3.6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和日本央行统计月报。

表 25 2013 年 3 月 -2014 年 3 月进出口贸易相关指数

单位: 亿日元

年份 月份	出口 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进口 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出口额 减进 口额
2013 年	697742		9.5	812425		14.9	-114684
3 月	56557	2.7	1.1	64614	-2.4	5.4	-8057
4 月	57093	0.9	3.8	64045	-0.9	9.4	-6953
5 月	58642	2.7	10.1	66340	3.6	10.0	-7698
6 月	59006	0.6	7.4	65509	-1.3	11.7	-6503
7 月	58267	-1.3	12.2	67757	3.4	19.7	-9489
8 月	59223	1.6	14.6	67999	0.4	16.2	-8776
9 月	59053	-0.3	11.4	70578	3.8	16.7	-11525
10 月	59731	1.1	18.6	71399	1.2	26.3	-11668
11 月	59731	0.0	18.4	73490	2.9	21.2	-13759
12 月	60975	2.1	15.3	73202	-0.4	24.8	-12227
2014 年							
1 月	58906	-3.4	9.5	76976	5.2	25.1	-18070
2 月	60479	2.7	9.8	72320	-6.0	9.0	-11840
3 月	58827	-2.7	1.8	75969	5.0	18.1	-17142

注: 月度贸易额为季节调整后数据。

资料来源: 日本财务省。

表 26 2013 年 2 月 -2014 年 2 月外国直接投资相关指数

单位: 亿日元

年份 月份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3 年	3624	133860	-130236
2 月	-515	3675	-4190
3 月	1109	9625	-8516
4 月	-465	13734	-14199
5 月	567	9173	-8606
6 月	997	9620	-8623
7 月	453	36886	-36433
8 月	355	5552	-5197
9 月	797	6183	-5386
10 月	-1152	7887	-9039
11 月	848	5135	-4287
12 月	489	18470	-17981
2014 年			
1 月	1042	12581	-11539
2 月	-1597	6339	-7936

资料来源: 日本财务省。

五、其他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

表 27 2012 年 -2013 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加拿大	英国	南非	巴西	印度	俄罗斯
2012 年	1.4	0.1	2.5	1.0	4.8	3.5
1 季度	0.8	0.6	2.7	0.8	6.0	4.8
2 季度	1.6	0.0	2.9	0.6	5.4	4.3
3 季度	0.8	0.2	2.2	1.0	5.2	3.0
4 季度	0.9	0.2	2.1	1.8	4.7	2.1
2013 年	2.7	1.8	1.9	2.3	4.6	1.3
1 季度	2.9	0.6	1.6	1.8	4.8	0.8
2 季度	2.2	1.8	2.3	3.3	3.2	1.0
3 季度	2.7	1.9	1.7	2.1	4.3	1.3
4 季度	2.9	2.7	2.0	1.9	4.5	2.0

注: 印度年度 GDP 增长率为财年增长率。

表 28 2012 年 -2014 年 1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韩国	墨西哥	中国 香港	中国 台湾	马来 西亚	印度尼 西亚
2012 年	2.3	3.9	1.5	1.5	5.6	6.2
1 季度	2.8	4.8	0.7	0.5	5.1	6.3
2 季度	2.4	4.4	0.9	0.1	5.6	6.4
3 季度	2.1	3.1	1.6	1.4	5.3	6.2
4 季度	2.1	3.3	2.9	3.8	6.5	6.1
2013 年	3.0	1.1	2.9	2.1	4.7	5.8
1 季度	2.1	0.6	2.9	1.4	4.1	6.1
2 季度	2.7	1.6	3.1	2.7	4.4	5.8
3 季度	3.4	1.4	2.8	1.3	5.0	5.6
4 季度	3.7	0.7	3.0	3.0	5.1	5.7
2014 年						
1 季度	3.9		3.0			

表 29 2013 年 3 月 -2014 年 3 月劳动力市场失业率
相关指数

单位: %

年份 月份	加拿大	英国	巴西	俄罗斯	南非
2013 年	7.1	7.7	5.5	5.5	
3 月	7.2	7.8	5.7	5.7	25.2
4 月	7.2	7.8	5.8	5.6	
5 月	7.1	7.8	5.8	5.2	
6 月	7.1	7.8	6.0	5.4	25.6
7 月	7.2	7.7	5.6	5.3	
8 月	7.1	7.7	5.3	5.2	
9 月	6.9	7.6	5.4	5.3	24.7
10 月	7.0	7.4	5.2	5.5	
11 月	6.9	7.1	4.6	5.4	
12 月	7.2	7.2	4.3	5.6	24.1
2014 年					
1 月	7.0	7.2	4.8	5.6	
2 月	7.0	6.9	5.1	5.6	
3 月	6.9		5.0	5.4	

表 30 2013 年 3 月 -2014 年 3 月劳动力市场失业率
相关指数

单位: %

年份 月份	韩国	墨西哥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马来西亚
2013 年	3.1	4.9	3.4	4.2	3.1
3 月	3.2	4.5	3.5	4.2	3.3
4 月	3.1	5.0	3.5	4.2	3.0
5 月	3.2	4.9	3.4	4.2	3.3
6 月	3.2	5.0	3.3	4.2	2.7
7 月	3.2	5.1	3.3	4.3	3.0
8 月	3.1	5.2	3.3	4.3	3.1
9 月	3.0	5.3	3.3	4.2	3.1
10 月	3.0	5.0	3.3	4.2	3.3
11 月	3.0	4.5	3.3	4.2	3.4
12 月	3.1	4.3	3.2	4.1	3.0
2014 年					
1 月	3.2	5.1	3.1	4.0	3.3
2 月	3.9	4.6	3.1	4.2	3.2
3 月	3.5	4.8	3.1	4.2	

注: 1. 英国和中国香港月度数据为截至当月的 3 个月移动平均失业率。2. 加拿大、英国、韩国和中国香港为经季节因素调整后的失业率。

表 31 2013 年 2 月 -2014 年 2 月进出口贸易相关指数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加 拿 大			英 国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3 年	4588.6	4618.5	-29.9	5414.8	6545.3	-1130.5
2 月	358.8	359.2	-0.4	407.9	515.2	-107.3
3 月	398.3	391.5	6.8	469.5	548.6	-79.1
4 月	390.6	401.9	-11.3	454.9	525.0	-70.1
5 月	399.3	395.5	3.8	556.1	521.6	34.5
6 月	379.0	386.3	-7.3	471.5	542.5	-71.0
7 月	359.8	376.0	-16.2	468.0	544.6	-76.6
8 月	373.9	393.2	-19.3	416.0	511.1	-95.1
9 月	387.2	390.7	-3.5	433.6	577.2	-143.6
10 月	405.8	408.6	-2.8	458.5	605.0	-146.5
11 月	379.7	384.3	-4.6	425.2	596.5	-171.3
12 月	374.1	360.1	14.0	432.3	515.6	-83.3
2014 年						
1 月	357.1	345.9	11.2	437.9	568.2	-130.3
2 月	347.6	345.8	1.8	425.8	528.0	-102.2

注:加拿大和英国数据经过季节因素调整。

表 32 2013 年 3 月 -2014 年 3 月进出口贸易相关指数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南 非			巴 西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3 年	959.9	1035.0	-75.1	2421.8	2504.5	-82.7
3 月	79.4	80.9	-1.5	193.2	200.5	-7.3
4 月	83.0	92.8	-9.8	206.3	226.1	-19.8
5 月	80.7	84.8	-4.1	218.2	220.2	-2.0
6 月	77.1	78.1	-1.0	211.3	196.8	14.5
7 月	87.7	93.3	-5.6	208.1	236.6	-28.5
8 月	80.3	90.9	-10.6	214.2	211.1	3.1
9 月	76.9	88.1	-11.2	210.0	197.0	13.0
10 月	85.0	95.2	-10.2	228.2	240.3	-12.1
11 月	84.3	84.3	0.0	208.6	200.0	8.6
12 月	74.2	72.2	2.0	208.5	190.4	18.1
2014 年						
1 月	71.4	87.0	-15.6	160.3	210.2	-49.9
2 月	76.4	74.9	1.5	159.3	188.9	-29.6
3 月				176.3	183.5	-7.2

表 33 2013 年 3 月 -2014 年 3 月进出口贸易相关指数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印 度			俄罗斯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3 年	3125.5	4658.0	-1532.5	5232.9	3429.8	1803.1
3 月	207.4	405.5	-198.1	444.6	288.0	156.6
4 月	241.9	421.0	-179.1	444.8	302.4	142.4
5 月	246.4	447.1	-200.7	409.8	265.9	143.9
6 月	237.2	258.8	-21.6	418.4	281.9	136.5
7 月	255.4	380.2	-124.8	437.1	305.5	131.6
8 月	262.5	368.5	-106.0	425.3	287.3	138.0
9 月	278.6	342.2	-63.6	448.1	289.6	158.5
10 月	272.8	379.2	-106.4	434.7	305.4	129.3
11 月	238.4	335.4	-97.0	468.8	296.6	172.2
12 月	260.3	364.6	-104.3	494.5	323.9	170.6
2014 年						
1 月	264.5	363.6	-99.1	394.6	206.1	188.5
2 月	256.9	338.2	-81.3	365.3	241.1	124.2
3 月	295.8	400.9	-105.1			

表 34 2013 年 3 月 -2014 年 3 月进出口贸易相关指数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韩 国			墨西哥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3 年	5596.3	5155.8	440.5	3801.9	3909.7	-107.8
3 月	473.1	439.8	33.3	318.8	309.0	9.8
4 月	461.6	436.5	25.1	328.6	349.4	-20.8
5 月	483.1	423.9	59.2	328.4	341.7	-13.3
6 月	466.9	407.2	59.7	310.3	309.4	0.9
7 月	458.3	433.8	24.5	322.1	345.1	-23.0
8 月	463.1	145.9	317.2	326.7	337.6	-10.9
9 月	446.5	410.6	35.9	313.9	315.1	-1.2
10 月	504.8	456.1	48.7	350.9	361.2	-10.3
11 月	479.1	431.1	48.0	317.0	321.5	-4.5
12 月	479.8	443.5	36.3	320.9	312.1	8.8
2014 年						
1 月	456.0	448.2	7.8	270.4	311.0	-40.6
2 月	429.4	420.4	9.0	305.2	303.9	1.3
3 月	497.2	455.5	41.7			

表 35 2013 年 3 月 -2014 年 3 月进出口贸易相关指数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3 年	5355.5	6222.8	-867.3	3054.4	2699.0	355.4
3 月	497.2	569.5	-72.3	272.1	240.1	32.0
4 月	444.5	504.3	-59.8	250.4	227.4	23.0
5 月	441.7	522.5	-80.8	263.0	218.7	44.3
6 月	415.3	508.8	-93.5	264.9	231.8	33.1
7 月	454.1	528.0	-73.9	253.0	220.6	32.4
8 月	461.6	573.4	-111.8	256.4	210.4	46.0
9 月	466.7	537.9	-71.2	252.4	229.0	23.4
10 月	485.0	540.4	-55.4	267.1	225.9	41.2
11 月	471.9	551.5	-79.6	257.3	213.8	43.5
12 月	455.3	535.6	-80.3	263.8	241.6	22.2
2014 年						
1 月	437.1	505.8	-68.7	242.9	213.4	29.5
2 月	328.7	414.3	-85.6	212.9	197.2	15.7
3 月				277.6	258.0	19.6

表 36 2013 年 2 月 -2014 年 2 月进出口贸易相关指数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3 年	2282.8	2060.1	222.7	1835.5	1873.7	-38.2
2 月	169.4	142.9	26.5	145.7	152.0	-6.2
3 月	193.1	177.4	15.7	153.1	151.7	1.4
4 月	183.0	179.6	3.4	149.5	162.7	-13.2
5 月	184.9	175.4	9.5	157.6	166.2	-8.6
6 月	180.2	166.5	13.7	148.5	157.8	-9.3
7 月	190.3	181.4	8.9	154.0	177.4	-23.4
8 月	191.7	170.0	21.7	135.3	132.4	2.9
9 月	194.7	168.0	26.7	152.3	154.4	-2.1
10 月	211.1	185.2	25.9	158.4	157.6	0.8
11 月	194.5	164.1	30.4	158.3	150.6	7.7
12 月	202.3	172.8	29.5	169.4	154.0	15.4
2014 年						
1 月	193.6	174.4	19.2	143.9	152.1	-8.2
2 月	178.1	146.5	31.6	147.1	139.0	8.1

资料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表 27-表 36)。

六、三大经济体指标对比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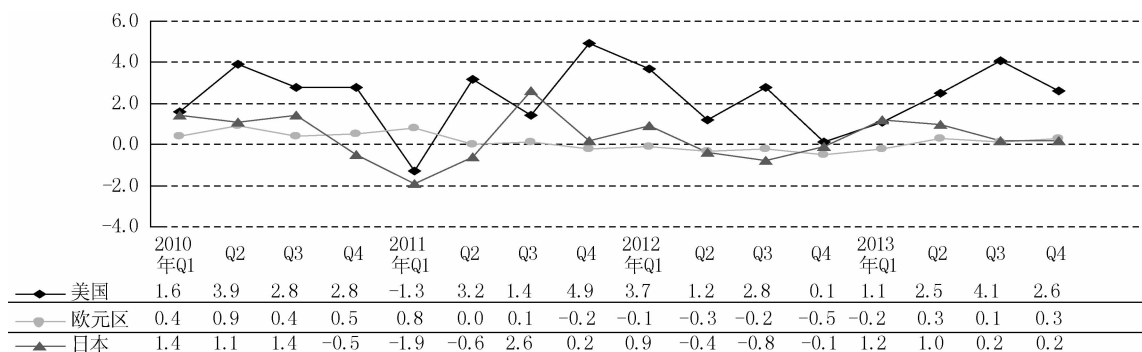


图1 2010年-2013年三大经济体GDP环比增长率(%)

注:美国为环比折年率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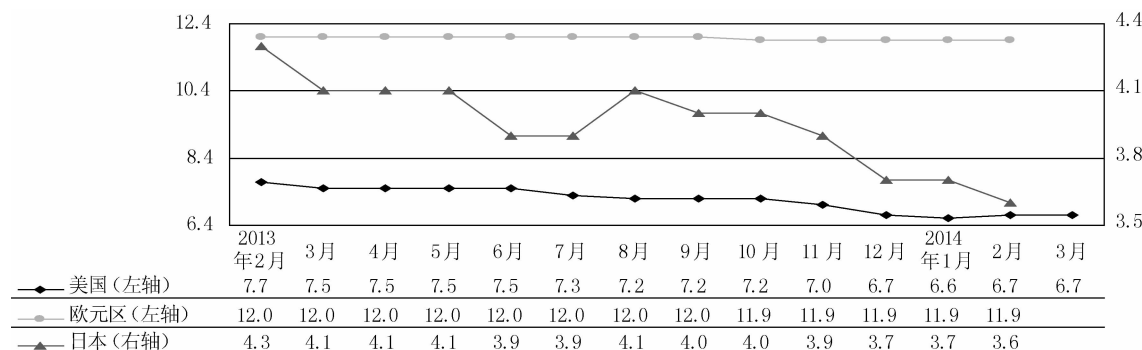


图2 2013年2月-2014年3月三大经济体失业率变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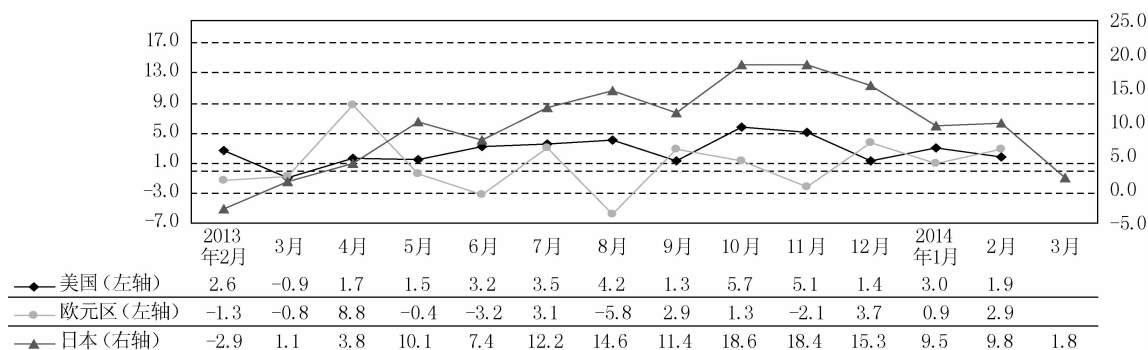


图3 2013年2月-2014年3月三大经济体出口额同比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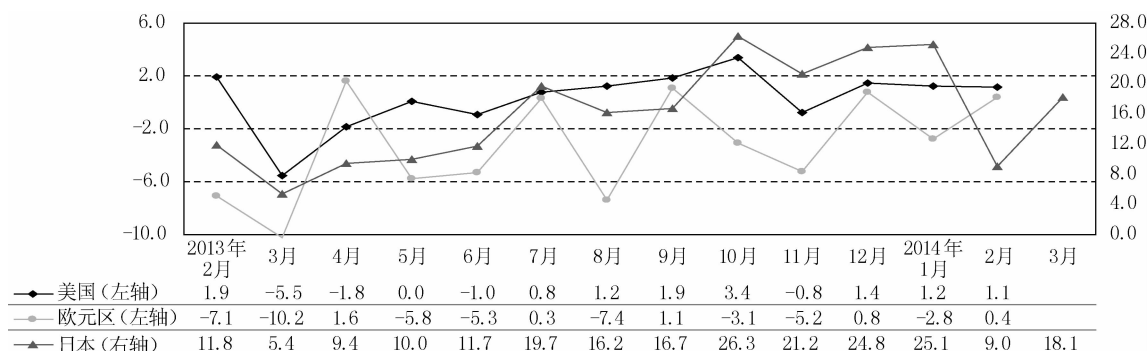


图4 2013年2月-2014年3月三大经济体进口额同比增长率(%)

数据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图1-图4)。

· 新书推介 ·

《农村中小企业转型发展论》评介

苑 鹏

近年来，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后续影响持续发酵，经济增长速度下行压力加大，发展中小企业对于我国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重要性迅速凸显。与城市中小企业相比，农村中小企业具有与生俱来的，内卷于农民市民化、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进程的独特属性。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关于农村中小企业的研究专著较为少见。姜长云、杜志雄作为长期从事农村中小企业研究的专家，集多年研究积累，推出了合著《农村中小企业转型发展论——关于政策转型和服务体系建设的研究》。该书汇集了作者们承担的历时三年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新农村建设中支持农村中小企业的政策转型和服务体系建设机理、模式及其区域比较研究”的部分成果，也凝聚了姜长云、杜志雄等主要作者从研究乡镇企业到研究农村中小企业长达 20 余年的研究积淀。通读下来，最大的体会是，他们对农村中小企业发展研究突出体现了以下三个特点。

（一）突出研究的前沿性和前瞻性

在乡镇企业作为一个群体的共性特征逐步淡化的历史发展转型中，姜长云、杜志雄是跻身于国内学界，最早一批把研究对象锁定在具有共性特征的农村中小企业的学者，他们敏锐地将研究问题聚焦在农村中小企业的转型问题，使其在农村中小企业的研究中占领了制高点，充分体现了研究的前瞻性。并且，通过系统研究农村中小企业发展中的诸多问题与困难，他们发现这些问题与困难多与外部支持政策转型和服务体系建设滞后相关。其研究成果对国内农村中小企业发展，有较高的理论和决策参考价值。

（二）突出问题导向性和现实指导性

本书力图从农村中小企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实践中提炼问题、发现规律、提出问题解决方案，努力形成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且能指导实践的理论创新和政策建议。例如，在审视农村中小企业对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作用时发现，农村中小企业的发展有利于

带动本土企业家成长，增强区域经济的本土根植性和抗风险能力；有利于丰富农村发展内涵，减缓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引发的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问题，增强农村自我发展能力，为构建新型工农关系、城乡关系提供重要载体。作者们提出，农村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需要注意与城市中小企业服务体系有序对接，与农村发展和农村中小企业特点有效对接。这与中央关于“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的要求是吻合的。

本书提出，要加快推进农村中小企业支持政策整体转型，突出支持创新创业、竞争力提升和可持续发展，实现由支持企业成长向支持企业家成长转型；突出支持小型企业、微型企业和问题区域的企业发展；重点引导创新资源向农村中小企业集聚，更加重视优化其运行环境；重点支持农村中小企业聚集发展，更加重视产业集群和产业区的发展与改造升级；重点支持农村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更加重视公共服务平台和行业协会的发展。农村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要突出融资服务体系、公共服务平台、行业协会和区域性农村中小企业综合服务体系等四大重点。这些研究结论，同近年来国家关于中小企业政策的演变趋势不谋而合。

（三）突出调研的深入性和研究的严谨性

作者们进行了大量问卷调查、企业访谈和案例研究。本书资料翔实，分析深入，行文着墨，体现了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良好的敬业精神。该课题设计的调查问卷内容丰富，值得同类研究借鉴。

本书对研究方法的选择，不盲目追求新颖或复杂，尽可能注重简单实用与有效。全书力图真正把科学的研究方法摆在“工具”而不是“花瓶”的位置，体现朴素简约但又深入浅出的研究风格，将问题导向性的应用研究贯穿始终。总之，《农村中小企业转型发展论》是近年来我国研究农村中小企业的一本力作，对于深化中小企业乃至转型经济的研究，都有较强参考价值。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李 蕊

ABSTRACTS

(1) Thinking on How to Inherit and Carry Forward Our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ulture under New Situation

Cai Wu

Chinese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ulture is the blood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common spiritual home of the Chinese people, the fertile soil that the socialist roa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akes root, a vital source that cultivates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an important carrier to improve the national cultural soft power, and a spiritual handhold that supports for realizing Chinese nation's great rejuvenation, additionally, it is also of unique value to the progr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 We should confidently cherish, inherit and carry forward the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ulture, work to achieve its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translate it into powerful positive energy for realizing the Chinese dream, and promote dialogues among various civilizations, making it develop and shine with greater brilliance.

(2) Enhance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Ability, Accelerate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Upgrading

Zheng Xinli

Our country faces the task of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upgrading currently, and the most effective way for us is to pick out a breakthrough point to take the task. In such a special stage, we especially should leave the market to play the decisive role in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nd better play the government role.

(3) An Analysis and Forecast on China's Fiscal Situation in the Future

Gao Peiyong, Yang Zhiyong, Wang Dehua, and Jiang Zhen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China's economic deepening reform and new reform stage, an analysis on the fiscal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situation in the future has been undergone with the perspectives of scale

and structure. The rapid growth will significantly slow down due to the strategy of “tax burden stabilization” and the character of economic growth stage. At the same time, expenditures on social security and health closely related to fiscal expenditure adjustment and population aging will remain at a high level. Both wings of fiscal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will be faced with some pressures in a period in the future.

(4) Actively Strengthen China’s Global Financial Governance Capability

Wang Guanqun

With the rise of emerging economies and multilateral development of global economy, the global financial governance mechanism is facing urgent adjustment and reform pressures.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China’s role in global financial governance has shifted from a marginal role to an important participant and policy maker. China should set its gradual goal in participating global financial governance; meanwhile it also should enhance its own governance ability. This paper makes some specific recommendations for improving China’s global financial governance ability.

(5) Construct a Quality Safety Economic Upgraded Version

Xu Minghuan

Right now, our country is at the crossroads of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bearing pressures from both the requirement of high growth and the effort of intensifying the restructuring. Our country needs to promote both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maintain fast yet steady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le solving the quality and safety problems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mprove the overall level of economic quality and safety. Therefore, we should follow the quality safety rules; create new ideas, new methods and new ways aiming at the realistic problems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stimulate the innov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 an upgraded version of quality safety economy, which will utilize the steady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and the quality safety.

(6) Desertification Threatens Human’s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Countries Should Work Together to Prevent and Cure Deserts Spread

Li Changjiu

Sandy desertification, desertification, and land degradation have been three major threats to human’s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A quarter of the world’s land area is affected by sandy desertification, the desertification area in the world has reached 36 million square kilometers and keeps growing, and over 20% of cultivated lands, 30% of forests, and 10% of grasslands are degrading. One UN agency forecasts that if desertifi-

cation not prevented, Africa, Asia and South America will reduce respectively 2/3, 1/2 and 1/5 of their cultivated lands till 2027, then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1/3 of the world population will be threatened. Countries' working together to prevent desertification not only benefits contemporaries but als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huma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7) World Economy Enters GVC Era, China's Opening-up Faces New Choices

Wang Zixian

As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evolves from natural division of labor to vertical integration and GVC division of labor, human society begins to enter "the era of global resources integration". It's a new wave and a new trend in opening-up that countries cultivate new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s by global resources integration. Today'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s no longer among individual enterprises but among overall supply chains and GVCs.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djust their GVCs locally to cope with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and meet demands of the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 major adjustment in world economy, meanwhile GVC enters a rapid remodeling phase, which bring China's opening-up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future, China should adopt the strategy of entering GVC in all directions and advancing our international status.

(8) BIT by BIT: A Path to Strengthen US-China Economic Relations

Daniel Price and Michael Smart

The fortunes of the US and Chinese economies are inextricably linked, yet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remains fragile because of a variety of political issues. A successful US-China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BIT) would allow the US-China economic relationship to be defined less by its disputes and more by its potential.

(9) Comparison on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of Free Trade Zones and Some Enlightenment

Shen Jiawen and Liu Zhongwei

Free Trade Zone is carrying a new platform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all-round opening-up and reform in China, and play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roles in expanding the scal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ternational logistics operation, convenient implementation of new economic policies, which will affect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regional trade pattern. This paper compares and analyzes the foreign

experienc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free trade zones and all kinds of China's traditional customs special supervision zones. This paper also draws some enlightenment for our country from advanced experiences of foreign free trade zones: we should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improve the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 in order to develop a new period of free trade zon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10) Gradually Turning from Productive to Consumptive: Review of 2013 Chin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2014 Outlook

Wang Bijun

Chinese enterprises got more diversified in overseas direct investment in 2013, they did remarkable jobs not only in traditional industries like resources and manufacturing, but also in emerging industries like finance, high-tech, real estate, and entertainment. In 2014, Chinese enterprises' overseas direct investment will keep growing rapidly and will be likely to exceed the scale of foreign investment utilization. As to the structure, we predict that China's overseas direct investment will gradually turn from productive to consumptive.

(11) An Investigation Report on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Villages

Research Group of Chin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xchanges

Regions across the country carry out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Villages in different ways combining their actual conditions and get some achievements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some problems still exist in planning formulation, long-term mechanisms, self consciousness, financial support, and infrastructure and so forth. Therefore, we should conclude experiences deeply and do the following works to adv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Villages: seek unity of thinking, plan well, build infrastructure, set up long-term mechanisms, promote local culture, and exert the role of primary party organizations and so on.

(12) XCMG Is Going Towards a World-class Enterprise

Zhang Zhiping

XCMG regards being an international world-class enterprise as a core strategy clearly. Through global distribution of the network bases, comprehensive improvement of the innovation product structure, and profound integration of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dustrialization, XCMG has enhanced its core competitiveness,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which makes XCMG go towards a world-class enterprise increasingly and steadily on the road.

Editor: Xie Yunliang

“铁的新四军”红色记忆·经典美术作品展 征稿通知

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深切缅怀新四军革命先辈在民族危亡之际砥柱中流，为夺取反法西斯战争和人民解放事业伟大胜利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同时昭展丹青名家并推书画新秀；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联合中国中共党史学会、文化部公共文化司等 8 家单位发起“铁的新四军”红色记忆·经典美术作品展活动，参展作品将在全国范围征集，经活动艺委会评选后的 320 幅优秀作品于 2015 年 5 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首展，之后在相关省市巡展并筹台海联展。同时活动中的部分甄选作品将捐由各大博物馆、纪念馆收藏，永世纪念、教育后人。我们诚邀全国画坛诸位艺术家与各界贤达加盟本次展览。

一、组织机构

（一）组委会

主 任：欧阳淞 蔡 武 陈昊苏

副主任：李忠杰 杨志今 左中一 王占生 邓淮生 薛德堂 毋瞩远 黄如军

委 员：张永新 张光东 韩铁成 桂建平 叶小楠 何光耀 乔泰阳 张淮流

刘延淮 周善平 赵黎明 邓小燕 张末生 彭 华 吴长江 赵长青

葛 华 颜 宁 张士明

（二）主办单位

中国中共党史学会 文化部公共文化司 中组部党建读物出版社

中国美术家协会 中国书法家协会 中国新四军研究会

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 中国海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三）承办单位

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四师淮北分会

中海外爱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四）协办单位

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安徽省、浙江省、河南省、湖北省、江西省、福建省、广东省、山东省、四川省、重庆市、广西壮族自治区等省（市、区）美协及新四军研究会

（五）军史专家委员会

寿小松 黄如军 耿成宽 徐维国 王传厚 张学忠 徐君华

（六）艺术委员会

名誉主任：刘大为

主 任：吴长江 **副主任：**徐 里 杜 军 **秘书长：**丁 杰

二、展出日期、地点

2015 年 5 月（拟定），中国国家博物馆

三、展出规模

本次展览展出美术、书法作品 320 余幅，其中特邀美术名家名作百余幅，全国征稿入选优秀作品 100 件，同书法作品共同展出。评选委员会由中国美术家协会聘请专家组成。

四、作者待遇

1. 该展评选出的优秀作品作者具备申请加入中国美协会员的一次条件。
2. 优秀作品 100 件（税前收藏费：中国画作品 50 件；15000 元 / 件。油画作品 50 件；25000 元 / 件）。
3. 画展将出版画册，每位参展作者均可获赠一本。
4. 组委会向参展作者颁发证书。

五、参展要求

1. 参展作者需提供送展作品照片 1 张（10 寸以上）参加初评，照片注明：姓名（以身份证为准）、标题、详细联系地址、邮编、联系电话。初评入围者接到电话通知后邮寄原作（送原件地址另行通知），同时通过邮局汇寄 150 元评选费进行终评，初评未入围作者不另行通知，照片不退。终评落选作品退件。

2. 参展作品一律为原始真实创作，如检测后发现作者使用高仿作品参评，中国美术家协会将在三年内拒绝此作者参加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任何展览活动。

3. 初评投递作品照片，相同作品照片如反复多次投递，中国美术家协会将视为无效稿件取消参评资格。

4. 送件要求：中国画幅尺寸不小于 6 尺整张，横竖不限；油画画芯尺寸：不小于 1 米×1 米。送件作品背面右下角请用铅笔写明：姓名（以身份证为准）、标题（和画面相同）、尺寸（高×宽 CM）、详细联系地址、邮编、联系电话、身份证号码，送件须妥善包装并挂号或特快专递邮寄，防止邮寄中破损遗失。

5. 收作品照片时间：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15 年 1 月 31 日止，以收到地邮戳为准。

6. 联系方式。收件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沙滩一号院 32 号楼 A 座 710，邮编：100083；收件人：张英财；联系电话：（010）59759683。画展信息可登录 www.caanet.org.cn（中国美术家协会网站）查看。

六、特别声明

1. 主办单位、承办单位对参展作品有展览、研究、摄影、录像、出版及宣传权。
2. 凡送作品参评、参展作者，应视为已确认并遵守征稿启事的各项规定。

中国美术家协会

2013 年 12 月